

学术著作推介

——《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张贯之 主编）

内容简介

本书汇集语言、文学与翻译交叉领域的原创研究，探讨数字化转型与跨文化交流不断深化时代下学科格局的演变。文集由绵阳市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与中国四川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编纂，收录国际知名学者与青年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

全书按三大主题板块架构：“语言与教学研究”板块探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以及专业场景下多语能力培养；“翻译研究”板块兼顾理论与应用视角，案例涵盖中国古典与现当代文学、叙事伦理、隐喻转换，以及高政治敏感语境下翻译的意识形态建构；“文学与文化”板块对东西方文本展开跨学科解读，聚焦身份、伦理、空间性与跨文化对话等核心议题。

本文集一大突出特色是持续聚焦数字人文与人工智能，不只是将其视作研究方法工具，更把它们视为撼动既有学术范式的认识论驱动力。多篇文章运用语料可视化、人机翻译对比分析、计算文本分析等手段，重新审视学界长期秉持的固有论断。与此同时，本书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地缘政治与文化动态，论证汉、英、西三语学术研究是促进不同文明互鉴的重要基础。

本书兼顾实证严谨性与批判性反思，是致力于推进 21 世纪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学者、教育工作者及行业从业者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主编简介

张贯之：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语言学。

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

Studies 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Asia-Pacific Publishing Group
亚太出版集团

Vol. 6, 2026

Studies 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

主 编：张贯之

ISBN 978-1-923881-10-5



9 781923 881105 >

www.appublishing.com.au

定价：A\$150

Asia-Pacific Publishing Group/亚太出版集团

Vol. 6, 2026

**Studies
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

主 编：张贯之



Asia-Pacific Publishing Group/亚太出版集团

《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2026年第6辑）

STUDIES 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Vol. 6, 2026)

学术顾问/ ACADEMIC ADVISORS

陈清贵/ CHEN QING-GUI 蒋 林/ JIANG LIN

主 编/ CHIEF EDITORS

张贯之/ ZHANG GUAN-ZHI

副主编/ VICE EDITORS

邹 微/ ZOU WE 侯光海/ HOU GUANG-HAI

编 委/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涂 超/ TU CHAO 王倩倩/ WANG QIAN-QIAN

李 杨/ LI YANG 陈紫玉/ CHEN ZI-YU

ISBN 978-1-923881-10-5 ISBN 978-1-923881-01-3 (ebook)

© (2026) Co-sponsored by Science & Technology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Mianyang, China and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Cultur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y Asia-Pacific Publishing Group in Australia on October 9, 2026.

ALL RIGHTS RESERVED.

PVP: A\$150

《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第六辑

编委会

学术顾问：陈清贵 蒋 林

主 编：张贯之

副 主 编：邹 微 侯光海

编 委：涂 超 王倩倩 李 杨 陈紫玉

序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套共同采用的沟通符号、表达方式与处理规则。“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中“五通”的重要内容之一，源自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流的基础和情感的桥梁。

文学是精神的羽翼，文学与文化构建社会价值和人类情怀的重要因素。文学作品中记载的跨越时空的先进思想，为我们提供感悟与想象的精神食粮，如同文化对人的滋养。《〈易经〉贲卦象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和传播的国家或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艺术文化、科学技术等，它是人类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感性上的知识与经验的升华。

翻译是一项内心和行为多层次的立体交叉活动；是一种或某种语际转移和跨文化交际。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研究翻译的基础。许钧认为：“翻译研究要关注历史的发展进程。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人类文化交流史。要了解翻译在人类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必须关注翻译的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要从发展的角度理解翻译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功能；从翻译活动对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着眼，理解翻译的定义、作用与定位，而不仅仅局限于翻译标准、翻

译技能的讨论。”从某种程度说，翻译史是折射人类社会交往发展史。翻译活动从古至今始终伴随人类活动，帮助并促进思想、文化和民族的相互交流和融合。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与绵阳市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绵阳市多语种教学与考试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征稿，得到了西班牙中国文化发展与推广中心、四川历史文化故事普及基地、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西班牙红点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高校优秀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积极响应，在“一带一路”“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倡议和发展战略背景下，聚焦外语界关注的语言、文化与翻译三大热点问题，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文章行文或研究语种涵盖中文、英文、西班牙文、韩文、德文、日文等多语种，有利于我国学者在国际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具有重要意义。

《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已出版五辑（2021、2022、2023、2024、2025年）。本辑继续坚持搭建学术育人平台，不断拓展作者范围和文章主题。当前，数智技术的深度融合，正驱动外语研究范式的改变。数据驱动与模型迭代不仅作为研究工具，其本身也构成了反思语言复杂性的认识论透镜，促使我们在人机协同的新视角下，重新审视语言习得、加工与演化的内在机理，我们希望这些研究能够逐步取得成果。由于本辑编辑时间紧，加之能力和水平有限，恐有不足之处，请各位专家和学者指正。



二零二六年九月于西科龙山

前言

语言为文明之载体，文学为人心之镜鉴，翻译为文化互通之桥梁。古今中外，人文薪火皆赖语言以存续、藉文学以浸润、凭翻译以传播。在全球化纵深推进、数智技术蓬勃发展的新时代，语言研究、文学阐释与翻译实践早已突破单一学科边界，形成互融互通、相辅相成的学术整体，成为中外文明对话、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核心支撑。

多年来，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深耕语言学、中外文学与翻译理论实践领域，始终秉持以语言立根基、以文学润内核、以翻译通中外的治学理念。语言是沟通的工具，更是思维的载体，其规则建构、语义内涵、语境演变，藏着人文研究的底层逻辑；文学是时代的镜像，不同国别、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承载着民族精神、审美范式与价值理念，是人文美育与思想传承的珍贵载体；而翻译绝非简单的语言转换，是跨文化的阐释、跨文明的对话，既要坚守语言的精准严谨，更要兼顾文学的审美意蕴、文化的精神内核，实现“形合、意合、神合”的统一。

当下，数智赋能重塑外语研究与教学格局，技术为语言学习、文本分析、翻译实践提供了全新路径，极大提升了学术研究的效率与广度。但技术赋能之外，人文深耕始终是学科发展的根本。脱离文学底蕴的语言研究流于空洞，缺失文化视野的翻译实践趋于刻板，摒弃思辨温度的学术探索终将浮于表面。基于此，本书整合研究者

多年教学思考、学术研究与实践积累，立足语言本体、扎根文学文本、聚焦翻译传播，系统梳理三者的内在关联与学术价值。

全书贯通理论与实践、融通传统与前沿、兼顾本土与域外。在语言研究层面，聚焦语言规律、话语分析与应用实践，夯实人文研究的语言根基；在文学研究层面，立足经典文本解读、中外文学比较，挖掘文学作品的时代价值与人文内涵；在翻译研究层面，结合翻译理论、实践技巧与传播逻辑，探讨新时代外译工作的使命与路径，着力探索中国话语对外阐释、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可行范式。

本书收录的研究成果，既是外语学人治学路上的点滴沉淀，也是对新时代语言文学与翻译学科发展的思考与探索。书稿成文，不求宏论尽善，但求务实求真，既注重学术理论的梳理建构，也兼顾教学实践的落地应用，希望为高校外语研究、文学教学、翻译实践提供有益参考，为青年学者、学子搭建学习研究的参考载体。

文以载道，译以传声。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是久久为功的人文事业，无捷径可走，需深耕细研、久久为功。本书付梓之际，愿以此书为炬，助力更多研究者深耕外语人文领域，坚守学术初心、融通中外智慧，以语言为基、以文学为魂、以翻译为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外语学科高质量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二零二六年九月

目 录

语言与教学研究

“十五五”规划背景下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培养 困境与创新研究刘晓旭, Sergio Darío Hernández Lima	2
中外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编写模式比较探究	王心悦 13
基于问题链的叙事脚手架: 英语精读文学语篇教学模式研究 ——以“A Dill Pickle”为例	禹亚君 27
人机共生与价值重塑: 人工智能赋能音乐教育 的范式转型与伦理进路武 慧, 侯星羽	38
西域和边疆: 马克林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译介研究 ——海外汉学视域下的历史、文化与话语建构	刘力瑗 51
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主语、语态与时态使用特征的对比研究袁雅菡, 兰 梅	62
汉语母语者西班牙语冠词习得的偏误分析和迁移机制研究周 怡, 李 杨	78

翻 译 研 究

基于话语标记语插入的AI对话自然度语用干预研究	靳扬帆, 侯光海 101
诺瓦利斯翻译思想探赜: 分类、本质与启示	孟 鑫 111
《尘埃落定》英译本海外接受的圈层差异研究 ——基于英美主流媒体书评与大众阅读平台评论的比较分析	吴天骄 120

语料库驱动下的李白诗歌人机译本意象翻译策略对比研究

.....付绍欣, 易紫怡, 陈清贵 132

概念隐喻视角下《德伯家的苔丝》中“fire”情感隐喻汉译浅析

.....王 欢, 张贯之 146

体认翻译学视角下许渊冲《李白诗选》隐喻英译研究 ...王 序, 邹 微 157

国内翻译伦理研究热点与演进

——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2015—2025) ...许义平, 涂 超 169

国际苏轼研究知识图谱与研究前沿

——基于Web of Science的CiteSpace文献计量综述 ...何传萌, 王倩倩 180

李白诗歌《月下独酌》在美国的译介嬗变与经典化路径

.....程智奇, 付玉群 193

象似性视角下李白《蜀道难》译本对比研究林欣茹, 邹 微 205

Mona Baker翻译叙事理论的跨界旅行

——移植、杂糅与重塑董丹萍, 韦才月 219

人物双重形象传递与文本风格再现

——以《缅怀丽娜·C·海顿》两个中译本为例冯莎芮, 赵 彤 233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下许渊冲译者惯习的研究

——以苏轼诗歌英译为例陈诗渝, 陈清贵 244

翻译传播学视域下*Red Poppies*的海外大众接受研究吴天骄 257

文化认同视角下川酒在西班牙市场的营销策略研究

——基于西班牙葡萄酒跨文化与本土营销的比较分析

.....张婧娴, 胡 纯 267

异化视角下《中国奇谭》字幕翻译研究杨雨寒, 任运忠 282

拉斯韦尔5W模式下苏轼诗歌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1956—1994)

.....邱慧琳, 王倩倩 290

国内科幻翻译研究热点与趋势(1995—2025)

——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舒嘉歆, 彭 玥 302

《二十四诗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史及其特征	庞清清, 付玉群	316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地方外宣汉英翻译研究		
——以《全景中国-四川: 天府之国》为例	王悦桦, 马继红	328
纽马克翻译理论视角 “ <i>In Memoriam: Rena C. Hayden</i> ” 两译本比较研究		
.....	沈慧敏, 付玉群	339
归化与异化视角下《哪吒之魔童降世》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		
.....	谢佳伶, 范先明	348
符际互补理论视角下《文运中国》的字幕翻译研究	史成玉, 宋一恒	360
文学与文化研究		375
融通东西的精神桥梁: 卫礼贤跨文明对话的启示		
——评谭渊新著《卫礼贤传》	朱圆圆	376
论《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异化书写	阳磊, 胡晓华	384
科技伦理视阈下《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的研究	陈露, 邱美英	397
由被述者到自述者		
——《苔丝》中的叙事维权与文学正义	陈茜, 张贯之	407
伦理场域与主体性重构: 《伪币制造者》的身份博弈研究		
.....	杨舒涵, 其美卓嘎	418
西班牙文艺复兴文学中女性主体的语言与叙事建构		
——以《两个少女的对话》为例	周嘉慧, 吴恙	430

语言与教学研究

“十五五”规划背景下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困境与创新研究

刘晓旭, Sergio Darío Hernández Lima

(1. 四川轻化工大学外语学院 四川宜宾 644000;

2. 四川轻化工大学外语学院 四川宜宾 644000)

摘要: 当前我国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培养面临着跨学科知识储备不足、实践能力与行业需求脱节、培养模式固化等多重困境, 难以满足行业对复合型人才需求。因此本文基于国家“十五五”规划导向, 结合拉美特点重新界定新形势下跨境电商语言服务人才内涵, 系统剖析拉美市场需求特征与西语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矛盾点, 宏观角度探讨跨学科转型定位、校企合作两个层面的创新路径, 微观层面探索人才培养方案调整、跨学科师资协同机制以及数字教学资源建设综合调整与构建, 为高校西班牙语专业转型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 西班牙语; 跨境电商; 人才培养; 困境; 创新路径

Analysis of the Dilemmas and Innovations in the Preparation of Spanish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15th Five-Year Plan

LIU Xiaoxu, HERNÁNDEZ LIMA Sergio Darío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Yibin 644000, Sichuan,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Yibin 644000, Sichuan, China)

Abstract: China's Spanish cross-border e-commerce talent development faces critical gaps: fragmented interdisciplinary competencies, misaligned practical training, and inflexible curricula

作者简介: 刘晓旭 (1988—), 女, 汉族, 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讲师,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外语教学法, 川酒国际传播, 拉美区域研究; Sergio Darío Hernández Lima, 1978, 男, 古巴籍,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外语教学法, 川酒国际传播, 拉美文学。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文化研究中心项目“‘一带一路’沿线西语国家川酒文化传播发展及市场开发研究 (QYYJB2408)”及四川轻化工大学教改项目“西南跨境电商综试区西班牙语直播‘三协同’育人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

that fail to produce industry-ready professionals. his study reconceptualizes the profile of e-commerce language service professionals. It identifies systemic disconnects between regional market demands and current pedagogical approaches, proposing a dual-level innovation framework from the macro-micro perspectives to advance transformational reforms in Spanish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Spanish language; cross-border e-commerce; talent cultivation; dilemmas; innovative pathways

一、引言

随着国家“十五五”规划颁布，跨境电商作为数字贸易的核心业态，成为推动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约1.3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7%。与此同时，拉美地区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互联网普及率持续提升，消费者线上消费习惯逐步养成，跨境电商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成为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出海”的重点布局区域。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全球南方力量加速重塑的背景下，2025年12月10日，我国出台《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为中拉关系未来发展锚定新坐标。拉美地区已成为我国跨境电商出口的新兴蓝海市场。然而，跨境电商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在于产品质量与供应链优势，更在于语言服务与跨文化沟通能力。西班牙语专业凭借其学科优势承担着培养兼具

西班牙语语言能力、跨境电商实操技能、跨文化沟通素养的复合型人才的重要使命。目前我国西班牙语专业人才培养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对于西班牙语专业的学生而言，精通语言并考取相关证书已是一项耗时巨大的任务，在短短四年的学习期间，要熟练掌握其他专业知识更是挑战重重^[1]。另一方面，新文科趋势下西语人才培养存在跨学科知识储备不足、实践能力薄弱、难以适应行业岗位需求等问题，形成了企业“一才难求”与毕业生“就业困难”并存的尴尬局面^[2]。这种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不仅制约了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在拉美市场的拓展步伐，也影响了“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与拉美地区数字贸易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当前，学界关于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多数研究聚焦于英语跨境电商人才，针对西班牙语等小语种跨境电商人才的研究不足，且现有研究多侧重

单一维度的探讨，缺乏对人才培养困境的系统剖析与多维度创新路径的整合研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跨境电商行业发展迅速，面对跨境电商语言服务人才的重度缺口，如何加速并创新跨境电商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模式是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之一^[3]。基于此，本文立足语言服务视角，以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其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提出创新路径。宏观层面，聚焦跨学科转型定位、校企合作路径搭建以及国际合作深化，破解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脱节的宏观瓶颈；微观层面，着力于人才培养方案调整、跨学科师资协同机制调动、教学资源构建，优化人才培养的具体流程与细节，实现西班牙语语言能力、跨境电商实操技能、跨文化沟通素养的有机融合，构建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创新框架，为高校西班牙语人才培养创新与学科转型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二、新形势下跨境电商语言服务人才内涵新定义

根据2025年《中国跨境电商B2B出口发展报告》分析，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推动行业数字化智能化、海外采购方数字化采购与线上交易需求持续高涨、各级扶持政策持续加码、国内外贸企业数字化工具普及率不断提升，数字化贯穿行业发展全过程，这也要求跨境电商外语人才培养打破单一语言教学模式，围绕数字商务实操、多语种线上营销洽谈、双语外贸政策实务、产业带数字化实训构建“外语+跨境数字B2B”复合型培养体系，全方位适配技术变革、海外市场需求、政策红利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行业用人新需求^[4]。在此趋势下，同年我国推出首部聚焦商务领域语言服务的国家标准《GB/T 30539-2025商务领域语言服务能力等级与标识》，这标志着我国商务领域语言服务正式进入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传统的跨境电商语言服务人才定义中对于完成产品描述、订单沟通、售后咨询等基础语言翻译工作的界定忽视了跨境电商行业所需的实操技能、跨文化素养、数字素养等核心能力。新形势下的跨境电商语言服务人才的内涵需要重新界定与丰富。商务部在《“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跨境电商人才培养，重点培养兼具语言能力、电商技能、跨文

化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助力跨境电商行业高质量发展,这一要求为新形势下跨境电商语言服务人才的内涵界定提供了官方导向,因此笔者指出新形势下的跨境电商语言服务人才应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母语与目标语言),熟练掌握跨境电商全流程实操技能,具备良好的跨文化沟通素养、数字素养、法律素养与创新素养,能够适应跨境电商行业多元化岗位需求,为企业跨境贸易活动提供语言服务、运营服务、跨文化沟通服务的复合型人才。

与传统语言服务人才相比,新形势下的跨境电商语言服务人才,其内涵具有以下三个核心特征:1、语言能力的专业化与场景化。语言服务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跨语言信息处理、语言技术开发应用、语言资产管理等现代服务业态。推动西部地区语言服务产业发展,对于提升区域国际竞争力、深化人文交流、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支撑作用^[5]。具体而言,一方面,需要掌握目标语言的专业词汇与表达,尤其是跨境电商相关的行业术语;另一方面,需要适应跨境电商多元化的语言应用场景,能够根据不同场景的需求,灵活运用语言技巧,实现有效沟通。

对于西班牙语跨境电商语言服务人才而言,其语言能力的专业化与场景化要求更为突出。拉美地区各国在词汇、语法、发音、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除了需要克服语言障碍外,还需要熟悉当地的语言习惯与文化特征,培养一批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跨境电商应用型人才;2、能力结构的复合型与多元化。区域语言规划需根据各地特性和发展需求,整合语言政策、人才培养、语言产业等资源,构建适配区域经济的语言服务体系^[6]。具体而言,复合型能力结构主要包括三个核心维度:语言核心能力、跨境电商实操能力以及综合素养能力。其中,跨文化沟通素养是西语跨境电商人才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拉美地区各国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消费习惯、价值观念存在较大差异,小语种跨境电商人才需要熟悉目标市场的文化特征,具备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才能有效对接市场需求^[7]。此外,其他如数字素养则是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法律素养则要求人才熟悉我国与拉美各国的跨境电商相关法律法规、关税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避免因法律风险导致的企业损失。3、人才定位的应用型与国际化。应用型定位意味

着人才培养必须立足行业岗位需求,以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国际化定位则意味着人才需要具备全球视野,了解全球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趋势、国际市场规则与不同国家的市场特征。对于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而言,其应用型与国际化定位更为具体。成都外国语学院西欧语言学院在“西语+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中,明确提出培养“懂跨境电商运营管理的西语人才”,注重实践能力培养,帮助学生积累丰富的跨境电商实践经验,为以后走上跨境电商的中高层管理岗位或自主创业打下坚实的基础^[8]。

综上,新形势下跨境电商语言服务人才的内涵,是语言能力、实操技能、综合素养的有机融合,其核心是“复合型、应用型、国际化”,这一内涵界定为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导向,也为后续分析人才培养困境、探索创新路径奠定了基础。

三、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需求与培养困境

结合拉美跨境电商市场的发展趋势与我国跨境电商企业的“出海”需求,当前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

的市场需求呈现出“数量缺口大、质量要求高、岗位多元化、区域集中化”的特征。

(一) “十五五”规划下的人才需求新常态

首先是人才数量缺口的持续扩大与需求的迅猛增速。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加速布局拉美市场,亚马逊、速卖通、SHEIN、安克创新等知名跨境电商企业纷纷开设西班牙语站点,拓展拉美市场业务。据《2024年中国跨境电商人才发展报告》显示,当前我国跨境电商行业人才缺口超过300万人,其中小语种跨境电商人才缺口占比达40%以上,西班牙语作为拉美地区的核心语言,其跨境电商人才缺口超过50万人,且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从行业实践来看,多数跨境电商企业面临着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招聘难、留人难”的问题。随着拉美跨境电商市场的持续升温,我国与拉美地区的跨境电商合作将进一步深化,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的需求缺口还将持续扩大,人才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其次,人才质量要求提升,复合型特征凸显,如前文所述,新形势下跨境电商语言服务人才的核心已经发生转变,企业对人才的质量

要求不断提升,不再局限于语言能力,而是更加注重人才的复合型能力结构,要求人才兼具语言能力、跨境电商实操技能、跨文化沟通素养与数字素养。此外企业要求熟练掌握跨境电商平台的运营技巧以及全流程实操能力;三是综合素养,除了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数字素养、法律素养与团队协作能力以外,部分大型跨境电商企业还要求人才具备一定的英语能力与国际贸易知识,以便更好地对接全球供应链体系与国际市场规则。

再次,岗位需求多元化,覆盖跨境电商全流程。随着跨境电商行业的转型升级,外语跨境电商人才的岗位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翻译岗位,而是覆盖了跨境电商全流程的各个环节,形成了多元化的岗位体系。以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西班牙语专业为例,研究发现跨境电商小语种人才的岗位需求已涵盖运营、翻译、营销、客服等多个领域,覆盖跨境电商全流程^[2]。不同岗位对人才的能力要求有所侧重,但均强调复合型能力。区域需求集中化,聚焦沿海与跨境电商核心城市。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我国沿海地区与跨境电商核心城市。这些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发达,企业

数量多、规模大,布局拉美市场的意愿强烈,对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随着内陆地区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重庆、成都等内陆城市对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加,但整体需求规模仍低于沿海地区与核心城市。

(二) 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困境

尽管我国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的市场需求旺盛,但当前人才培养工作却面临着诸多困境,这些困境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涉及培养定位、课程体系、实践教学、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六个方面,导致人才培养质量难以满足行业需求,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具体如下:

1. 培养定位模糊,缺乏跨学科转型意识:当前,我国多数高校本科的西班牙语专业缺乏对跨境电商行业需求的主动深入调研,缺乏跨学科转型意识,导致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缺乏相关支撑。多数高校将西班牙语专业的培养目标飘忽不定,在“守正”与“创新”中缺乏对复合型、应用型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导向与积极尝试。

2. 课程体系固化,跨学科融合不足:当前跨境电商语言服务人才

培养的课程体系存在“重语言、轻商务、缺实践”的问题。部分高校只是开设了少量相关的选修课程，但缺乏系统性的跨学科转型规划，没有将其与语言教学、实践教学深度融合，也没有配套相关的实操课程与跨文化课程，导致学生难以形成系统的跨境电商知识体系与实操能力，盲目跟风开设相关课程，导致培养出的人才缺乏特色，难以适应不同区域、不同企业的岗位需求。另一方面为课程内容滞后，与行业发展脱节。跨境电商行业发展迅速，平台规则、运营模式、营销方法等不断更新，而高校西班牙语专业的课程内容却较为滞后，难以跟上行业发展步伐。

3. 实践教学薄弱，产教融合深度不足：外语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主要集中在语言实践，跨境电商实践环节多以课堂模拟、案例分析为主，缺乏真实的行业实践场景与实操机会。实践教学环节多集中在高年级，且持续时间短，难以让学生系统掌握跨境电商全流程的实操技能。在产教融合方面，校企合作流于形式，缺乏对本地企业的开发与合作，没有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缺乏对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实践教学的共同参与，部分企

业因担心技术泄露、培养成本过高等问题，不愿意深度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工作，导致产教融合难以推进。此外，实践教学资源匮乏，缺乏专业的实训平台。一方面，高校自身的实训平台建设滞后，也没有引入拉美本土跨境电商平台的实训资源；另一方面，校外实训基地数量不足，且分布不均衡。此外，实践教学师资缺乏行业经验，难以有效指导学生开展跨境电商实践，也制约了实践教学质量的提升。

4. 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跨学科师资短缺：师资素质难以满足复合型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需求，是人才培养面临的重要瓶颈。研究发现，跨境电商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的师资队伍存在语言类教师不具备电商知识，电商类教师缺乏相关小语种语言能力的问题，跨学科师资短缺现象突出，多数高校难以招聘到既具备扎实的西班牙语语言能力，又具备丰富的跨境电商行业经验与专业知识的教师。一方面，高校招聘教师时，多注重语言能力与学历背景，对跨境电商相关专业背景与行业经验的要求较低；另一方面，跨境电商行业发展迅速，具备跨学科背景的人才多选择进入企业工作，导致高校难以吸引到优质

的跨学科师资。部分高校西语专业需要通过校企合作引进企业专家补充师资。此外,现有教师的跨学科培训不足,多数高校没有为西班牙语教师提供系统的跨境电商相关培训,且师资实践经验不足,与行业发展脱节。多数西班牙语专业教师长期从事理论教学工作,缺乏跨境电商行业实践经验,不熟悉行业发展趋势、平台规则与岗位需求,难以将行业实践内容融入教学过程,教师与行业企业的交流合作不足,缺乏深入企业调研、实践的机会。

5. 教学资源匮乏,难以支撑复合型人才培养:当前,我国市面上针对西班牙语跨境电商的教材数量有限,内容更新滞后,难以跟上跨境电商行业与拉美市场的发展步伐。教学平台资源不足,缺乏专业的实训与教学平台。如前文所述,多数高校教学平台资源开发不足,缺乏西班牙语跨境电商相关的在线课程、教学视频、行业数据库等资源,教师难以开展多元化的教学活动,学生也难以利用课余时间补充相关知识与技能。此外,部分高校的教学设备落后,没有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跨境电商实训软件等,也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升。教学案例与行业资源匮乏,缺乏真实的行业支撑。

高校与企业的合作不够深入,难以获得企业的真实运营案例、数据资源等;另一方面,我国与拉美地区跨境电商合作的相关研究成果与行业报告较少,高校难以获取充足的行业资源用于教学。

6. 国际合作不足,缺乏国际化人才培养渠道: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的国际化定位,要求人才具备全球视野与跨文化沟通能力,而国际合作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渠道。多数高校的西语专业国际合作多停留在学生交换、短期交流等浅层层面,缺乏针对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深度合作,缺乏教师交流、科研合作、企业合作等多元化的合作形式,难以实现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目标。当前,我国高校与拉美地区企业的合作极为有限,难以引入拉美企业的资源用于人才培养,学生难以获得真实的国际化实践机会,难以了解拉美市场的商业惯例、运营模式与客户需求,跨文化沟通能力与国际化视野难以得到提升。

四、西班牙语人才培养创新路径

针对当前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培养面临的诸多困境,结合新形势下跨境电商语言服务人才的内涵要求、市场需求特征,本文从宏观

与微观两个层面,探索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创新路径。具体如下:

(一) 跨学科转型定位

面向外贸数字化发展趋势,地方高校应重构语言人才培养框架,以外语能力为根基,叠加跨境商务、数字营销等交叉内容,解决传统外语人才仅具备语言能力、缺乏行业实操素养的痛点^[9]。目前来讲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达到培养定位的创新,需要打破传统的语言人才培养定位,高校应深入调研拉美跨境电商市场需求与企业岗位需求,结合高校当地与拉美区域间合作的人才需求导向,明确西班牙语跨境电商明确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的复合型培养目标:培养具备扎实的西班牙语语言能力、熟练的跨境电商全流程实操技能、良好的跨文化沟通素养、数字素养与法律素养,能够适应拉美跨境电商市场需求,从事跨境电商运营、营销、翻译、客服、市场调研等工作的新型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

(二) 立足区域产业需求,突出人才培养特色

不同区域的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水平、企业需求存在差异,高校应立足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突出西班牙

语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特色,实现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发展的深度对接^[10]。沿海地区与跨境电商核心城市的高校,应聚焦当地跨境电商产业发达、企业布局拉美市场意愿强烈的优势,重点培养具备跨境电商实操技能、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突出“实操型、国际化”特色,对接当地企业的岗位需求;内陆地区的高校,应结合当地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现状与特色产业,重点培养具备拉美市场调研、跨境电商营销、物流对接能力的人才,突出“针对性、应用型”特色,实现区域间合作,个性化培养,助力当地企业拓展拉美市场。

(三) 树立国际化培养理念,强化全球视野培育

结合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的国际化定位,一方面,在课程教学、实践教学中融入全球跨境电商行业发展趋势、国际市场规则、拉美各国市场特征等内容,让学生了解全球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动态,树立全球视野;另一方面,深入介绍拉美各国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消费习惯、商业惯例等内容,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与沟通能力,避免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运营失误与沟通冲突。

此外,高校还应注重国际通用能力的培养,如英语能力、国际贸易知识、国际法律知识等,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对接国际市场规则与全球供应链体系,适应企业“出海”发展的需求。例如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在多语种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中,注重国际化视野培育,通过开设国际商务相关课程、开展国际交流活动等方式,提升学生的国际化素养。同时,应引导学生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与拉美地区的跨境电商合作政策,了解我国的外贸政策与拉美各国的投资政策,增强学生的政策意识与国际合作意识,培养能够参与国际跨境贸易合作的复合型人才。此外,构建“精细化、深度化、长期化”的校企合作机制,将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岗位需求的精准对接。例如,成都外国语学院西欧语言学院与尤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杭州全欧跨境电商电子商务等企业合作,共同开设《跨境电商概论》《网络营销策划与管理》《亚马逊运营专题》等课程,将企业的实操经验融入课程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与企业合作,共同开发跨境电商相关课程,引入企业的真实运营案例,让学生了解行业实操

技巧。

在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方面。具体可以通过三个路径,一是共建校内实训基地,高校提供场地与教学设备,企业提供实训软件、运营账号、实训资源等,搭建模拟跨境电商运营、营销推广、客户沟通的实训平台,引入拉美本土跨境电商平台(如美客多Mercado Libre)的实训资源,让学生进行真实的运营模拟训练;二是共建校外实训基地,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岗位,安排企业导师指导学生进行实习,让学生接触到真实的订单处理、客户沟通、售后维权等工作,积累行业实践经验;三是共建创新创业平台,鼓励学生参与跨境电商创新创业项目,企业提供资金、技术、资源等支持,高校提供教学指导与场地支持,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五、结语

在“十五五”开年之局,西班牙语作为连接我国与拉美跨境贸易的核心桥梁,其跨境电商人才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其培养质量直接决定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在拉美市场的竞争力,也影响着中拉数字贸易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本文以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为核心,依托

新文科教育、产教融合以及区域国别研究等相关理论,重新界定了跨境电商语言服务人才“复合型、应用型、国际化”的核心内涵,系统剖析了人才市场需求特征与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定位模糊、课程固化、实践薄弱等多重困境,最终从跨学科定位、校企合作等五个维度,提出针对性创新路径,旨在破解人才供需脱节的结构性矛盾,培育符合拉美市场需求的复合型人才。为未来开展量化实证研究提供研究基础。展望未来,随着中拉数字贸易合作深化,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需求将持续攀升。

参考文献

- [1] 沙晶晶,曹赢丹,白倩萌,等.墨西哥市场崛起下的中国西班牙语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探究[J].中国市场,2025(33):105-108.
- [2] 刘太伟.小语种跨境电商人才“四位一体”培养模式研究——以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西班牙语专业为例[J].高教学刊,2020(24):134-137.
- [3] 张玉洁,马刚.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跨境电商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4,32(2):123-128.
- [4]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跨境电商B2B出口发展报告[R].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5:18-26.
- [5] 王立非,周芷伊,颜文瑾.西部地区语言服务发展:现状、挑战与建议[J].外语教学,2025.46(06):1-7.
- [6] 李琳.区域经济发展与语言能力建设[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104-111.
- [7] 刘太伟.小语种跨境电商人才“四位一体”培养模式研究——以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西班牙语专业为例[J].高教学刊,2020(24):134-137.
- [8] 马郁.新文科时代外语学科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路径探索[J].科教文汇,2024(8):121-123.
- [9] 王晓燕.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地方高校融合型语言人才培养研究[J].
- [10] 傅恒.跨境电商语言服务人才“语言+商务+技能”复合型培养模式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21(5):78-83.

中外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编写模式比较探究

王心悦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外语学院 上海 201418)

摘要: 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 包括西班牙语在内的传统外语专业教育已开始追求跨学科专业的知识整合, 发展起了“外语+”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为满足教学需要, 近年来国内出版了多部由高校一线教师编著的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本研究将以这些教材为研究对象, 分析教材中的教学单元组织方式、语言知识与专业知识的呈现方式以及习题类型, 旨在深入了解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的编写模式, 并与西班牙出版社出版的同类教材 *TURISMO* 进行比较, 为今后相关教材的编写与修订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专门用途西班牙语; 教材; 中国; 中外比较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ompilation Models for Textbooks of Span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in China and Spain

WANG Xinyue

(School of Tourism in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Institute of Tourism, Shanghai 201418,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traditional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Spanish major, has begun to pursue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integration, giving rise to the “foreign language +” model for cultivating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In this regard, several textbooks of Span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have been published to promote teaching activities in recent years. Taking the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teaching units, the presentation of linguistic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he types of exercises in these textbooks, while also comparing them with *TURISMO*, a counterpart published by a Spanish publisher, in order to approach the compilation model of China’s textbooks of Span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textbook writing and revision activities.

Keywords: Span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textbook; China; comparative study

作者简介: 王心悦, 1996—, 男, 汉族, 上海人, 讲师,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西班牙语语言学、教学法。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4年上海市晨光计划项目“三一语法视域下高职院校西班牙语专业教学语法体系建构”(24CGB10)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自2017年“新文科”这一概念在美国提出^[1]以来,国内学界也开始思考和研究传统的人文学科在新时代面临的挑战和需求。教育部于2020年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2]中明确提出,“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奔腾而至,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化复杂化,应对新变化、解决复杂问题亟需跨学科专业的知识整合,推动融合发展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

为主动迎接新文科建设所要求的专业变革,外语专业主要有两条跨学科道路^[3]:一是“外语+”复合型人才培育,即在原来外语学习的基础上再学一个专业,比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就有“西班牙语+企业管理”这一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的复合型专业^[4];二是专门用途外语教学,即面向某一职业领域或学科的外语教学,其目的是满足专业化的交流^[5],如商务西班牙语、经贸西班牙语、跨境电商西班牙语等。以这些名称命名的课程在国内高校西班牙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其实并不罕见,近年来也陆续出版了多部教材以满足教学需要。本文正是以国内出版的多部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为研

究对象,分析这些教材的教学单元组织方式、语言知识与专业知识的呈现方式以及习题类型,旨在深入了解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的概况与全貌,并与国外同类教材进行比较,取长补短,为今后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的编写与修订提供参考。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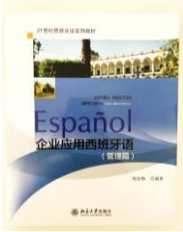
(一) 研究对象

为了掌握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的总体情况,避免有所疏漏,使研究更有说服力,本研究通过网络搜索并咨询了出版社编辑与高校一线教师,选取了9部由国内作者编著并由国内出版社出版的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作为研究对象。需要说明的是,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不包含以下类型:(1)由西班牙语国家引进并进行编译的教材,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商务西班牙语》;(2)尚未正式出版的讲义及特定领域的词汇或句型手册,如旅游教育出版社《出国旅游西班牙语应急说》;(3)特定领域的西班牙语阅读材料汇编,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旅游与文化教程(西班牙语版)》。为方便后文的分析与讨论,本研究将这9部教材编码为

M1至M9。下表呈现了这些教材的目标使用者及其封面：基本信息，包括书名、出版时间、

表1 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概览

编 码	书名	出版时间	目标使用者	封面
M1	《西班牙语涉外秘书》 ^[6]	2022年3月	西班牙语专业本科（三年级下学期）或高职学生，西班牙语爱好者、准备或者已经从事与西班牙语相关的秘书类工作的人士	
M2	《经贸西班牙语教程》 ^[7]	2023年3月	西班牙语专业本科四年级学生、研究生，或就职于同西班牙语国家保持商业关系的企业的人士	
M3	《跨境电商实用西班牙语》 ^[8]	2022年2月	高校西班牙语专业二年级学生，或具备一定西班牙语基础（A2等级及以上）的学习者	
M4	《外贸西班牙语函电》 ^[9]	2023年1月	以西班牙语作为工作语言的外贸从业者、经贸领域的翻译工作者和高等院校学习外贸西班牙语课程的学生，或具备B1以上水平的西语爱好者	

M5	《民航服务实用西班牙语》 ^[10]	2022年7月	有初级西班牙语基础，学习空中乘务、民航服务等相关专业方向的学生或有志于从事民航相关职业的学习者	
M6	《军事西班牙语（初级）》 ^[11]	2020年6月	具有一定西班牙语语言基础且对军事感兴趣或直接在相关军事领域从业的人员	
M7	《跨境电商西班牙语》 ^[12]	2021年8月	各类高等院校高职高专、本科和社会培训学校电子商务相关专业学生，或不同层次的跨境电商相关从业人员	
M8	《西班牙语国际贸易实务》 ^[13]	2024年7月	高校应用型西班牙语专业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的学生，或有志于开发拉美西班牙语国家市场的外贸公司业务员或者管理人员	
M9	《企业应用西班牙语（管理篇）》 ^[14]	2012年11月	用西、汉两种语言的企业工作者，应用型西语人才的在校生，或有一定西语基础的人士	

通过书名可以看出,在9部教材中有5部面向的是贸易和商业领域,无论是传统形式的贸易(M2、M4和M8)还是近年来流行的跨境电子商务(M3和M7),另有2部教材适用于企业管理(M1和M8),剩下的2部则分别属于军事领域(M6)和民航领域(M5)。从题材上看,在社会活动中还有许多行业仍有待补充,例如工程、医药、法律、旅游等。此外,通过教材的出版时间可以发现,绝大部分教材都是在近六年内出版的,仍旧比较新,只有1部教材(M9)出版了十年以上。从目标使用者看,这些教材都要求学习者有一定的西班牙语基础,说明我国的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学对通用西班牙语教学仍有比较强的依赖性。这些情况都表明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建设仍处在起步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 研究方法

尽管评价通用外语教材的理论并不少,但是由于专门用途外语教学在方法论上的不同,这些理论恐怕并不适合评价一部专门用途外语教材。鉴于此,本研究将采用李汶璟^[15]提出的专门用途英语教材评价体系来评价我国的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这套评价体系由需求分析、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专业素养四个一级指标和若干二级指标构成,详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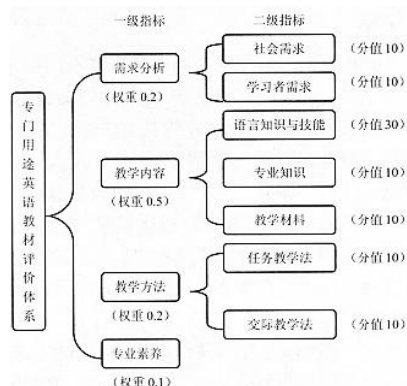


图1 专门用途英语教材评价体系

本研究定位于教学层面的分析,因此对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的评价将聚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个一级指标。具体来说,本研究将采用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研究方法,重点分析教材在教学单元组织方式、语言知识与专业知识的呈现方式以及习题类型三个方面的特征,并与西班牙SGEL出版社的TURISMO教材进行比较,分析中外教材在上述方面的异同,取长补短,以期为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的编写与修订提供有益参考。

三、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的编写模式

(一) 教学单元组织方式

我国的9部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

材体现了两种教学单元组织方式。一种是M2到M7这6部教材中的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最传统，也就是大部分通用西班牙语教材的组织方式。在这种组织方式下，每一个教学单元都以课文为核心内容，占据教学单元最前部的位置，其次呈现由课文中的生词构成的词汇表，然后是与课文内容相关的习题，而各教学单元之间则是以专业知识为序，所有教学单元构成了所涉行业或领域的专业知识的完整体系。以M5《民航服务实用西班牙语》这部教材为例，这部教材由“航班手续服务”“出入境服务”“机上服务”“意外情况服务”和“飞机到达服务”5个单元组成，恰好构成了空乘和地勤人员从乘客到达机场办理票务手续到抵达目的地提取行李离开机场这一全过程应当掌握的专业知识，而每个单元中又详细描述了空乘和地勤人员提供这些服务应当具备的西班牙语语言知识。

另一种是M1、M8和M9这3部教材的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并非以课文为核心内容，相较于传统的外语教科书，这3部教材更像是行动指南，也就是说，这些教材中仅仅呈现相关领域从业人员可能面对的工作任务的范例和实例。例如，M9

《企业应用西班牙语（管理篇）》这部教材的第一单元“企业行文格式”由9个模块组成：“企业内部行文格式范例”“企业内部行文实例”“信函格式范例”“信函格式实例”“传真格式范例”“函件开头实例”“函件结尾实例”“日期缩写”以及“时间和日期的表述”。在这些模块中既没有词汇表也没有任何形式的习题，相关从业人员可以直接查询这部教材来撰写工作文件。在这种组织方式下，各教学单元并不是以专业知识而是以可能面对的工作任务为序。M9《企业应用西班牙语（管理篇）》这部教材的8个单元分别是“企业行文格式”“人事管理”“走访事宜”“庆典事宜”“丧事处理”“招待宴请”“用西语打电话”和“计算机用语”，每个单元都着眼于从业人员在不同的工作任务中会说和会写的西班牙语。

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的教学单元组织方式可以总结为下表：

表2 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的教学单元组织方式

教材编码	单元内部组织方式	单元间组织方式
M2, M3, M4, M5, M6, M7	课文中心型	专业知识为序
M1, M8, M9	任务-范例型	工作任务为序

（二）语言知识与专业知识的呈现方式

本节将分析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中语言知识与专业知识的呈现方式，但分析对象仅限于M2到M7这6部教材，其原因在于M1、M8和M9这3部教材的教学单元内部以工作任务与范例为组织方式，在这些教材中仅仅是用西班牙语呈现了专业知识，未设特定模块对语言知识进行描述，教材使用者仅靠参照与模仿就能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

语言知识可以分为语音知识、词汇知识和语法知识，在6部教材中只有M5《民航服务实用西班牙语》这部教材在正文开始前介绍了西班牙语的语音知识。从前文对教材的目标使用者的描述中可知，这是因为M5《民航服务实用西班牙语》这部教材可供初学者使用，而其他教材则对使用者的语言水平有一定要求，使用者若有能力学习这些教材，必定已经掌握了西班牙语的语音系统，因此无须再在教材中呈现语音知识。

在语言知识中，词汇知识是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最为重视的知识类型。每一部教材在课文后都附有独立的词汇表，囊括了课文中出现的生词及其词性和中文释义。

在这方面，M2《经贸西班牙语教程》这部教材有些特殊，因为这部教材是唯一完全用西班牙语编著的，因此词汇表中仅罗列了生词而没有词性和中文释义等信息。词汇知识的重要地位不仅表现在独立成块的词汇表上，也体现在相应的习题数量上。在词汇表后便是单元中的习题部分，针对词汇知识的习题占据着非常大的比重，配对、翻译、填空、造句等各种形式的练习考察的都是学习者对词汇的意义和用法的掌握程度。例如，M7《跨境电商西班牙语》这部教材第一课中一共有多项选择、配对、填空和句子翻译四道练习，而配对、填空和句子翻译所考察的都是这一课课文中出现的生词。又如，M5《民航服务实用西班牙语》这部教材第一课的四道练习分别是单词释义、造句、填空和句子翻译，前三道练习也都是为训练学生对词汇的熟悉程度而设计的。

和词汇知识相比，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对语法知识的关注程度非常有限，只有M5《民航服务实用西班牙语》一部教材设有单独的语法模块。和语音知识一样，这也是因为这部教材相较于其他教材对学习者的语言水平要求不高，其他教材的使用者应当具备一定程度

的语法知识才能顺利开展学习，便也不再将语法作为单独的模块进行专门的教学。尽管如此，在这些教材的习题中偶尔还是会有一些语法练习，比如M3《跨境电商实用西班牙语》这部教材的第一课中就有一道练习要求学习者将动词变位为简单条件式填入句子空白处。不过毫无疑问，语法练习的数量是远少于词汇练习的。

专业知识在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中主要通过情景导入、课文、补充阅读等形式呈现。以M7《跨境电商西班牙语》这部教材的第四单元“网店设计与产品描述”中的第一课“网店视觉设计特点”为例：首先，“情景导入”模块通过文字叙述的形式将实体店与网店的产 品呈现方式进行比较，强调了网店视觉设计的重要性，从而引入主题；接着，“学习内容”模块一一介绍了网店视觉设计的特点，部分特点后配有图片作为例子进行说明，图文并茂；最后，“延伸阅读”模块进一步探讨了运营网店的其他注意事项，因为视觉设计并不是影响运营效果的唯一因素，从而引起学习者的深入思考。如此，从事网店视觉设计工作的人士或有志于此的学生了解了网店运营的基本原则和理

念，专业知识得到了提升。

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语言知识与专业知识的呈现方式可以总结为下表：

表3 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语言知识与专业知识的呈现方式

知识类型	呈现方式	教材编码
语音 语 言 知 识	教材正文 开始前	M5
	独立的词汇模 块与词汇相关 练习	M2, M3, M4, M5, M6, M7
	独立的语法模 块或语法相关 练习	M2, M5
	情景导入、课 文、延伸阅读 等模块	M2, M3, M4, M5, M6, M7
专业知识		

（三）习题类型

本节将以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中的练习部分为研究对象，判断习题属于开放式问题、半开放式问题还是封闭式问题，并分析习题针对的语言知识或语言技能。本节将先考察M2到M7这6部以传统方式组织教学单元的教材，再单独分析M8这部以工作任务与范例为教学单元组织方式的教材，而M1和M9这两部教材因未设习题，故不纳入分析。

由于M2到M7这6部教材每个单

元的习题数量和类型基本一致，因此本研究仅以这些教材中的第一单元或第一课中的所有练习为样本以观全貌。这6部教材中的第一单元或第一课中一共有40道习题，其类型和所针对的语言知识或语言技能分别在图2和图3中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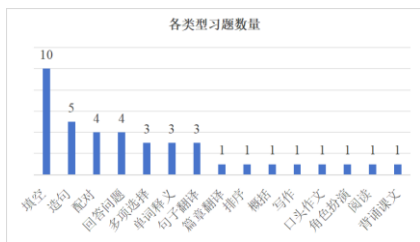


图2 各类型习题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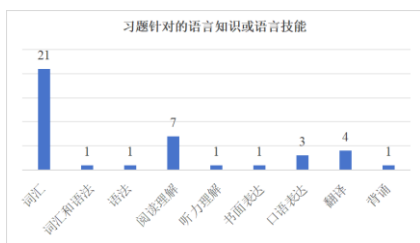


图3 习题针对的语言知识或语言技能

通过以上两张图表可以发现，这些教材中一半以上的习题针对的都是语言知识（23/40），尤以词汇知识为重（22/23），语法知识在部分教材中完全被忽略。在所有针对词汇知识的习题中，填空是最常见的练习形式（8/22），说明教材编著者希望学习者知道如何在具体的工作情境中使用专业词汇。

和语言知识相比，对语言技能

的训练在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中居次要位置（16/40），其中阅读理解是练习得最多的语言技能（7/16），其次是翻译（4/16）和口语表达（3/16），听力理解和书面表达是最受忽视的语言技能（均为1/16）。从练习形式角度看，回答问题（3/7）和多项选择（2/7）是针对阅读理解的习题中最普遍的形式，体现了对学习者的阅读专业材料时把握细节的能力的重视。

从习题类型上看，可以发现绝大多数习题属于封闭式问题（31/40），半开放式问题和开放式问题数量较少（分别为5/40和3/40）。鉴于所有针对词汇知识和阅读理解的习题均为封闭式问题，可以说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呈现出对传统教学方法的明显偏好。

最后，本节特别关注M8《西班牙语国际贸易实务》这部以工作任务与范例为教学单元组织方式的教材中的练习题。与M2到M7这6部教材不同，M8《西班牙语国际贸易实务》这部教材中的所有习题均为开放式的思考题，以概念辨析、举例说明和案例分析为主要形式。例如，该教材第一单元“国际贸易导论”中的第一课“国际贸易基本概念”的三道课后练习分别是：

1. comercio exterior (对外贸易) 与 comercio internacional (国际贸易) 有何区别? 请举例说明。

2. 区域一体化的形式有哪些? 请按一体化程度从高到低排列并举例说明。

3. 2018年9月, 美国政府宣布对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10%关税, 这给美国进口商和中国出口商分别带来了怎么样的影响?

可以发现, 这些习题已经跳出了外语学习的范畴, 希望学生通过思辨掌握国际贸易领域的关键概念, 懂得举一反三, 并用所学知识分析真实存在的问题, 这体现了真正的专业学习。从这个意义上说, 学习者通过对该教材的学习能快速提升国际贸易领域的知识储备, 做好进入相关领域工作的准备。

四、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的中外比较

为了更好地探究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的编写模式, 并借鉴国外同类教材的经验, 本研究还选取了西班牙SGEL出版社出版的旅游西班牙语教材*TURISMO*作为比较对象。该套教材以旅游行业学生与从业人员为目标人群, 适用于西班牙语初学者, 采用交际教学法, 帮助学生掌握在旅行、酒店、餐饮、商务等工作情境中的语言运用能力。

全套教材共两册, 第一册^[16]对应《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A1-A2级别, 第二册^[17]对应B1级别。除学生用书外, 每册均配套教师用书和练习册。

(一) 教学单元组织方式

在教学单元组织方面, 该套教材的单元内部组织方式既不属于课文中心型也不属于任务-范例型, 而是贯彻交际教学法, 围绕单元主题内容设计了丰富的活动, 通过活动教授语言知识、锻炼语言技能。每一单元包含5大模块: *Empezamos*模块借助富有启发性的活动来呈现单元主题内容和生词; *Practicamos*模块通过课文与活动引导学生思考、练习和巩固单元中新的交际功能与语言结构; *Hacemos*模块要求学生完成一项与单元主题相关的综合性任务, 以融会贯通所学内容; *Ampliamos*模块呈现与旅游行业及职场关系相关的文化内容; *Gramática y comunicación*模块对单元所学语言知识进行总结。

以该套教材第一册第四单元“在酒店中”为例: 首先, *Empezamos*模块呈现了一幅电脑上的酒店预订界面, 通过不同风格的酒店照片激活学生以往的酒店预订经验, 自然地将学习内容与生活实际相联系, 在

介绍学习目标的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Practicamos模块围绕酒店的网页介绍、用户点评、房间描述、娱乐设施和前台接待等交际场景，引出动词querer的用法、家具名词、描述房间的形容词、形容词的性、动词gustar的用法以及非重读物主形容词等语言知识；再次，Hacemos模块要求学生分组扮演酒店前台和客人，运用所学语言知识完成酒店预订任务；随后，Ampliamos模块通过两篇短文介绍了西班牙与墨西哥的特色住宿类型；最后，Gramática y comunicación模块总结归纳了本课的语言知识。

该套教材的单元间组织方式也不以专业知识或工作任务为序，而是以交际场景或话题为序。以第二册为例，第二册共12课，分别以“国家公园”“旅行故事”“酒店行业”“休闲表演”“饮食”“朝圣之路”“旅游线路”“酒店”“节日庆典”“旅游营销”“都市旅游”和“未来展望”为主题，涵盖了旅游行业的基本交际场景与核心话题，使学生在真实的语境中逐步掌握语言技能，同时拓展对旅游领域多元议题的理解。

（二）语言知识与专业知识的呈现方式

在语言知识的呈现上，该套教

材与绝大多数通用西班牙语教材一样，采取语法与词汇并重的策略，并未像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那样表现出对词汇知识的明显偏重和对语法知识的相对忽视。这是因为该套教材并不要求学习者具备西班牙语基础，而是可以从零基础开始学习，只不过语法和词汇的教学依托于旅游业这一特定领域的材料。

语法和词汇知识在该套教材中有两种呈现方式：其一，以正文旁注的形式呈现，正文呈现活动内容，旁注则呈现该活动所涉及的语言知识，例如第一册第四单元“在酒店中”有一项描述房间的活动，旁注部分便列出了一些常用的形容词，如cómoda/incómoda、grande/pequeña、bonita/fea等；其二，通过每单元最后的Gramática y comunicación模块，以要点小结的形式对单元所学语言知识进行归纳总结。

在专业知识的呈现上，该套教材主要通过Ampliamos模块介绍与旅游行业及职场关系相关的文化内容。例如，第一册第四单元“在酒店中”通过两篇短文介绍了西班牙与墨西哥的特色住宿类型，第二册第三单元“酒店行业”则以一篇短小的说明文阐释了西班牙语的命令式与礼貌表达之间的关联，文化内容与单

元主题联系紧密。总体而言,该套教材专门用于专业知识的篇幅十分有限,相关内容更多是融入各项活动的交际场景之中。

(三) 习题类型

在习题类型方面,本节以该套教材第一册第四单元的所有练习为研究对象,判断习题性质及其针对的语言知识或语言技能。不计 Gramática y comunicación 模块,该单元包含9项活动,共计24道习题:填空10题,讨论3题,配对、回答问题、多项选择和写作各2题,判断、角色扮演和阅读各1题。可以发现,封闭式问题占比超过半数(15/24),其中填空是最常见的习题形式(10/24),但整体来看封闭式问题所占比例仍低于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的水平(31/40)。

而从习题针对的语言知识或语言技能的角度看,该套教材与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呈现出明显差异,其习题更侧重于语言技能的训练,而非机械性的词汇语法练习。在24道习题中,仅有2道配对题和2道填空题属于单纯的语言形式练习,其余练习虽也涉及词汇语法内容,但都以语言技能训练为载体,即将目标词汇与语法知识置于特定语境中进行练习,更注重其功能性而非

形式本身。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练习并未像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那样采用长篇阅读或听力材料,而是选用短小精悍、真实度更高的语言素材。例如,一道以练习酒店餐饮服务相关词汇为目标的听力练习,其材料即为一张真实的酒店预订单,要求学生根据听力对话内容完成填空。这类题目固然可以设计为听力考试中最多见的多项选择题,但显然,在现实的交际场景中,填表才是更具真实性的交际任务。

五、结语

本文以国内出版的多部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些教材的教学单元组织方式、语言知识与专业知识的呈现方式以及习题类型,对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的编写模式有了一定的认识。根据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在教学单元组织方面,大部分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和通用西班牙语教材一样以课文为每一个教学单元的核心部分,单元间以专业知识为序,也有少部分教材直接呈现工作任务与范例,单元间以工作任务为序;在语言知识与专业知识的呈现方面,我国的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非常

强调词汇知识的教学, 不仅体现为独立成块的词汇表, 也表现在数量众多、形式丰富的针对词汇知识的习题上, 而专业知识主要通过单元各模块中的文字信息传递; 在习题类型方面, 半数以上的习题针对的是词汇知识的操练, 填空是最常用的练习形式, 阅读理解则是操练得最多的语言技能, 总体上看, 我国的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表现出了对封闭式问题的偏好。

结合有限的教材数量与题材、较近的出版时间以及对教材目标使用者的描述, 并以西班牙同类教材为参照, 本研究认为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建设仍处在起步阶段,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 鉴于当前教材对词汇知识的关注, 本研究建议在语言知识教学与专业知识教学之间以及语言知识教学与语言技能训练之间保持相对平衡, 不可偏废; 其次, 考虑到教材中的大部分习题为封闭式问题, 而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封闭式问题的情况相对较少, 因此本研究建议在教学过程中增加开放式的问题和互动性更强的学习任务, 并结合真实交际场景中的语言素材, 提高学生用所学语言与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最后, 当前的教材对难度和建议学

时的标注并不全面, 也没有配套的教师用书或练习册, 教材之间也缺少关联性和梯度性, 并且对通用西班牙语教学仍有比较强的依赖性, 如果今后能在这些方面有所改变, 相信我国专门用途西班牙语教材体系会建设得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 [1] Varlotta L.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Systemic Academic Change: Hiram College's Model for the New Liberal Arts [J]. *Planning for Higher Education*, 2018, (1):1-20.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新文科建设宣言[EB/OL]. (2020-11-03)[2026-03-26].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11/t20201103_498067.html.
- [3] 蔡基刚. 危机中的英语专业出路: “外语+”复合型还是专门用途英语? [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227-232.
- [4] Li G, Wang X. Español + Ciencias Económicas y Empresariales: modelo interdisciplinario de la enseñanza de ELE en China [J]. *SinoELE*, 2023, (1): 61-71.
- [5] Anthony L. 专门用途英语导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2.
- [6] 陈泉. 西班牙语涉外秘书[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2.
- [7] 董杨, 张笑寒. 经贸西班牙语教程[M].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23.
- [8] 黄欣. 跨境电商实用西班牙语[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2.
- [9] 姜云龙, 岳琳, 王润泽. 外贸西班牙语函电[M].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23.

- [10] 王傲. 民航服务实用西班牙语[M].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22.
- [11] 吴正瀚, 张力. 军事西班牙语(初级) [M]. 北京: 中国宇航出版社, 2020.
- [12] 岳惠琴. 跨境电商西班牙语[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1.
- [13] 查东, 陈泉. 西班牙语国际贸易实务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4.
- [14] 周亚榕. 企业应用西班牙语(管理篇)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15] 李汶璟. 高校专门用途英语教材评价体系构建研究[J]. 科技与出版, 2015, (10):110-112.
- [16] Blanco A I, Jiménez E, Valero M P, Villar D. *TURISMO 1 (Libro del alumno)* [M]. Madrid: SGEL, 2018.
- [17] Xicota N, Sanz C. *TURISMO 2 (Libro del alumno)* [M]. Madrid: SGEL, 2019.

基于问题链的叙事脚手架：英语精读文学语篇教学模式研究——以“A Dill Pickle”为例

禹亚君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

摘要：当前英语精读课中，文学语篇的教学价值常被低估，教学实践往往停留在表层信息的理解，忽视文本深层含义的挖掘。本研究构建“叙事脚手架”教学模式，将抽象的叙事学概念转化为一系列问题，通过问题驱动引导学生理解、识别并运用叙事学工具分析文本的叙事策略以及其对人物塑造和主题表达的作用。在以“A Dill Pickle”为教学案例的实践表明，叙事脚手架模式能有效促进学生从文本表层理解走向深层含义解读，提升其对叙事策略与文本意义建构的认知。研究进一步表明：当叙事学转化为一种教学策略，既为文学语篇的教学提供了新路径，也为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提供了有益支持。

关键词：叙事学；脚手架；问题链；课堂实践；A Dill Pickle

A Question-Chain-Based Narrative Scaffolding Model: Teaching Literary Texts in Intensive Reading—A Case Study of “A Dill Pickle”

YU Ya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Sichuan, China)

Abstract: In current intensive reading courses, the pedagogical value of literary texts is often underestimated, with classroom practice largely confined to surface-level comprehension while neglecting the deeper textual mean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a Narrative Scaffolding Model, which transforms abstract narratological concepts into a series of questions. Through a question-driven approach, students are guided to understand, identify, and apply narratological tools to analyze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their roles in characterization and thematic development. Based on a

作者简介：禹亚君，1988—，女，汉族，新疆奎屯人，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语教学。

项目基金：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2023年立项资助项目“逃离与回归：《家》的隐性叙事进程研究”（项目编号：SCWY23-02）

teaching case of “*A Dill Pickl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Narrative Scaffolding Model effectively facilitates students’ transition from surface-level comprehension to deeper interpretation, enhancing their awareness of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xtual meaning. Furthermore,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when narratology is used as a pedagogical strategy, it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to the teaching of literary texts but also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literary competence and critical thinking.

Keywords: narratology; scaffolding; question-chain; classroom practice; *A Dill Pickle*

一、引言

提及精读课，不少读者往往首先联想到词汇讲解和句法结构分析。然而，精读教学除承担基本语言技能训练的功能外，更应引导学生关注、欣赏、思考、评论和批评社会各类重要议题^{[1]92}。精读这种特殊的阅读方式对于培养学生“从阅读中真正学到各种知识”，“了解并吸收人类文明的结晶”，“熟悉各种发人深省思想和理念”，“培养分析批判的能力”有重要意义。只有“读得深一点、细一些、全面一些”，才能真正“读通”、“读懂”作者想说的什么。^{[2]3}

英语精读教材的语篇选择通常较为广泛，目的是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拓宽文化视野^{[3]15}。以《现代大学英语（第三版）精读3》的十二个语篇为例，文学作品五篇，非文学作品七篇，涵盖随笔、议论文、学术性论文、说明文、戏剧、短篇小说等多种类型。非文学语篇有助

于培养逻辑和思辨能力，文学语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共情和审美能力，但在精读教学中，文学语篇的价值常被低估。文学作品在语言上有无法替代的优点，更在“社会、历史、人性、哲理”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4}文学类语篇的词汇相对论文简单，且有故事情节，学生普遍认为“看懂”故事，就理解了文学作品本身。这很容易忽略文学作品背后作者的深层意图，比如人物视角的转换，环境要素的设计、隐喻、象征、讽刺等修辞手法的使用，这些精巧的设计可能隐藏着作者引导读者理解人性、人类困境或社会冲突的“秘钥”。文学语篇的价值在英语精读课堂被低估的困境，需要一种促进深度阅读的方法来应对。

叙事学与传统的文学批评不同，它将叙事视为一个可以科学分析的“对象”，更专注于研究叙事本身的结构、规律和机制，通过叙述视角、叙述声音、隐含叙事等系统工具多

维度分析,以揭示文本更深层次的结构和意识形态。^{[4]3-5}本研究将叙事学融于英语精读的语篇教学,搭建叙事学的认知脚手架,通过问题驱动的方式,引导学生看到情节之外文本背后的深意,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学赏析和思辨能力。

二、脚手架理论与基本叙事策略

(一) 脚手架理论

脚手架(Scaffolding)的概念起源于早期的社会文化学习理论,由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ev Vygotsky)提出的“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发展而来。维果茨基认为,最近发展区是“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actual developmental level as determined by independent problem solving and the level of potential development as determined through problem solving under adult guidance or in collaboration with more capable peers”^{[5]261},即学习是发生在学习者独立完成任务能力与在他人帮助下能够完成任务能力之间的区域,学习者在“更有能力者”(如教师或同伴)的支持下,可以逐步掌握新的知识与技能。^{[6]13}

在此基础上,心理学家Jerome Bruner与David Wood和Gail Ross于

1976年在研究儿童问题解决过程时正式提出“脚手架”这一概念。他们在论文“The Role of Tutoring in Problem Solving”中指出,教师在学习过程中提供的支持类似于建筑中的脚手架的功能(scaffolding functions):它帮助学习者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任务,并在学习者能力提升后逐渐撤去这些支持。^{[7]98}

随后,脚手架理论逐渐成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社会文化学习理论的重要内容,广泛运用于语言教学、阅读教学、合作学习等领域,并被认为是培养学生高阶思维能力^{[8]48-53}的重要手段。

(二) 基本叙事策略

1966年,巴黎《交际》杂志推出第八期,这期杂志通过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了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这标志着叙事学的诞生,并引起了学者们高度关注。20世纪70年代,叙事学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为文本分析提供了模式和方法。这一时期的叙事学,也被称为结构主义叙事学或经典叙事学,研究重点在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述视角、叙述声音和叙事节奏等内容。从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这一时期的叙事学则被称为后经典叙事学,除原结构主义叙事研究角

度外, 后经典叙事关注读者、语境和文化等因素, 可以进一步探索叙事对读者的情感影响和读者反应。为学生理解文本提供叙事脚手架支持, 本研究主要引入三个叙事学概念: 叙述声音、叙述视角和隐性叙事进程。

叙述声音, 热奈特在《叙述话语》中认为是“who speaks”^{[9]186}的问题。他将叙述声音分为四类: 故事外-异故事(叙述者在故事之外, 且不参与故事)、故事外-同故事(叙述者在故事之外, 但曾参与故事)、故事内-异故事(故事中的人物讲述另一个故事(不涉及自己)和故事内-同故事(故事中的人物讲述自己的经历))。^{[9]176}叙述声音不仅谁在讲述故事的问题, 更涉及权力和话语控制。在“A Dill Pickle”中男性的叙述始终作为主导, 而女性角色的声音则被压制和边缘化。

叙述视角, 热奈特称之为“focalisation”(聚焦), 他认为是理解文本“Who sees”^{[9]186}的问题。他将叙述视角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10]129-133}。随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叙述视角的分类也更加全面。国内学者申丹和王丽亚在《西方叙事学: 经典与后经典》中梳理了叙述视角的分类, 将外视角分为五类, 内视

角分为四类。^{[4]95-96}叙述视角会引导读者判断人物, 因为其本质可以控制信息流动和限制读者的认知范围。

“A Dill Pickle”中, 女性叙述视角的观察较男性视角更多, 所以可以认为在“视角”层面, 文本重新分配了认知权力。

隐性叙事进程是由北京大学申丹教授在2012年首次提出的概念, 是指虚构叙事作品情节发展背后, 存在的一股“叙事暗流”。这股暗流构成另外一种进程与情节发展并行, 但呈现不同或相反的走向。申丹教授认为, 这两种叙事运动“在主题意义、人物塑造和审美价值上均形成对照补充或对立颠覆的关系”。^{[11]3}

“A Dill Pickle”故事情节展现男性的自私和自负, 可在显性情节下, 隐藏着一条讽刺女性角色自私的叙事进程。

叙事学为分析文学语篇提供了系统框架, 但它多被视为分析工具而非教学手段。在课堂教学实践中, 仅介绍这些术语并不能让学生理解文本, 只有把这些抽象术语转化为学生可理解的学习工具, 才能实现叙事学的脚手架功能。因此, 教师将这些叙事学概念转变为一系列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链, 以问题形式驱动学生解读文本, 通过逐

步深入的问题,鼓励学生与文本互动,教师提供支持,帮助学生从表层的情节理解过渡到更深层次的解读。这种转变为本研究提出叙事脚手架模式奠定了基础。

三、叙事脚手架模式

“叙事脚手架”教学模式将叙事学概念融入英语精读的语篇教学,并通过问题驱动学习的方式组织课堂活动。整个教学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文本初读、叙事问题引入、协作探究以及意义建构。

文本初读阶段,通过课前阅读预习结合课堂情节梳理的方式,使学生了解故事发生背景、人物关系和主要情节,为后续文本分析奠定基础。

叙事问题引入阶段,教师需提前发给学生“问题清单”,引入与叙事相关的问题,如“谁在讲述故事?”

“故事从谁的视角展开?”“人物的叙述是否可靠?”等。这些问题对应着叙事学中叙述声音、叙述视角、叙事判断等具体概念。通过这些问题引导,学生开始意识到情节之外,文本还包含复杂的叙事策略。

协作探究阶段,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和翻转课堂的方式,对清单上的叙事问题进行逐一探讨。教师并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鼓励学生寻

找文本线索以支持自己的观点。例如,在分析对同一事件,男女主人公不同的记忆时,学生需找到具体细节来判断叙事的可靠或者不可靠性。通过这样的探究,学生逐渐学会在叙事学观察工具的支持下分析文学文本。

意义建构阶段,在完成上述叙事结构和人物分析后,引导学生对文本隐含的意义进行深层次思考。如,叙述声音转换如何反映权力结构变化?叙述视角转移怎样塑造人物性格?在这一阶段,学生实现从理解表层的情节到文本深层内容的跨越,还能对作品的主题和价值进行批评和反思。

该教学模式通过将叙事学概念转化为层层递进的叙事问题,用问题构建叙事脚手架,引导学生进行叙事分析,最终完成对文本的深层解读。这种从“理解——分析——解读——评价”的学习思路,为英语精读课文学语篇的教学提供了将语言学习与文本分析结合的有效路径。在语篇教学中引入叙事学概念,有助于学生逐渐形成文学阅读的分析思路和框架,从而促进语言能力和思辨能力的共同发展。

四、教学实践

（一）基本学情

本次教学实践研究是在大二年级英语专业学生的精读课开展，学生共76人，英语水平B2左右。班级学生有较扎实的词汇和语法基础，理解文本情节没有困难，但理解常停留在表层，极少学生能分析文学文本的叙事手法或者挖掘文本更深层次的意图。

本次教学素材选取《现代大学英语（第三版）精读3》第三单元“A Dill Pickle”，这篇小说是Katherine Mansfield的代表作，以其精巧的叙事结构和细微的人物刻画而著称。课程设计为两节课，每节课45分钟，旨在将叙事学概念融入语篇教学和学生阅读之中。

教学目标共三层。在语言层面，期望学生理解故事情节和掌握关键表述。在分析层面，指导学生识别叙述声音、叙述视角等叙事策略，并理解这些策略在叙事进程的作用。在评价层面，引导学生解读人物关系，探讨语言背后的权力关系等深层含义。

（二）教学过程

1. 文本初读

文本初读阶段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课前阅读预习。学生应阅读文本，识别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角色、场景设定及主要事件等基本故事要素。第二部分在课堂前10分钟，教师通过故事错位拼图或一句话概括故事的方式了解学生对情节的掌握情况，并补充和讲解学生遗漏的信息。

这一阶段的教学重点并不是文本分析，而是构建对文本的整体理解，为后续各阶段的深入讨论打基础，确保学生熟悉文本内容，从而进行有效的深入讨论。

2. 叙事问题引入

在这一阶段，叙事学的概念以引导性问题清单的方式提供给学生，教师并不直接解释相关理论术语，而是通过一系列叙事策略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时间约10分钟。问题清单（部分）如下。这一过程将叙事学的概念转变为指导学生阅读的工具。

层级 类型	具体问题	教学目标
理解 情节	1. What happens when the two characters meet again after several years?	理解 文本情节
	2. How do the man and the woman remember their past relationship differently?	
	3. What stories does the man tell about his travels and achievements?	
分析 叙事	4. Who dominates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story?	理解 叙事策略
	5. Do you think the man's narration of his past experiences is reliable? Why?	
	6. How does the narrator describe the woman's reactions to the man's stories?	
解读 人物	7. What details in the text suggest a gap between the man's self-image and reality?	分析 人物关系
	8. Why does the woman gradually become silent during the conversation?	
	9. What does the man's way of speaking reveal about his personality?	
评价 主题	10. How does the conversation reflect gender dynamics in the story?	建构 文本意义
	11. Why does the woman finally decide to leave?	
	12. What might the title "A Dill Pickle" symbolize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ory?	

3. 协作探究

学生根据教师提供的问题清单，以四人/组的方式开展讨论，时间约25分钟。每个小组聚焦于叙事的某一个方面，并用文本证据来支撑各自的解读。再用翻转课堂的形式汇报小组讨论的成果，同时再次鼓励其他小组补充或反驳，但都需要给出文本证据，用时约30分钟。通过这些问题，学生逐渐区分叙述声音（谁在叙述）和叙述视角（谁在看）之间的差异。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引导者的角色而非知识传授者的角色，可根据课堂具体情况给予知识补充或叙事策略拓展。

4. 意义建构

在这一阶段，教师引导学生结合观察和讨论，对文本进行更深入的挖掘，用时约15分钟。从叙事策略和人物塑造，转向主题意义的解读，尤其侧重男女角色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一过程让学生从文本分析转向批判性反思，培养学生解读文学作品意义的能力。

（三）课堂讨论节选

1. 对叙述声音的讨论

为引导学生关注叙述声音，教师设计问题4. Who dominates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story? 在讨论的初始阶段，学生会迅速锁定男性角色在主导两人对话，他的表达频率更高，

叙述更长,并且男性角色掌握两人对话的走向,无论是谈到去俄罗斯的经历,还是分手信等情节,都由男性角色控制对话的进程。即使女性角色偶尔表达,男性也会将话题转到自己的经历上。因而学生得出结论:男性角色在谈话中处于主导地位。

经过进一步讨论,一些学生开始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男性主导地位以及背后的原因。学生认为,男性角色频繁打断女性角色的话语,显示出他以自我为中心;他的叙述常与女性角色的回应脱节,也表露出他对女性角色的冷漠和无视。因而可以发现,谁主宰对话这一表面现象,转变为叙述声音可以展示话语权力场域。

教师继续追问“*What kind of stories does the man tell, and what is his role in those stories?*”

学生讨论中发现,男性角色讲述的都是他过去的经历,他是这些故事的主人公。这一观察引出了进一步区分,在整个故事框架中,男性和女性角色都是参与者,是由一个故事外-异故事的声音在讲述两人的重逢。而在男性角色的讲述中,叙述声音从故事外-异故事的声音,转变为故事内-同故事的叙述声音。

这种嵌套的叙述声音往往会塑造一个特定的“自我形象”,因为是故事内-同故事的叙述者,通过语言“构建自我”。从另外一个层面讲,这一个自我构建的形象,又存在不可靠叙述的解读可能性。这回应到教师设计的第5个问题:5. *Do you think the man's narration of his past experiences is reliable? Why?*

学生从开始只确定男性主导对话,是一个自私的角色到开始怀疑男性角色说的是真的吗?随着讨论深入,学生发现,男性角色常夸大自己的经历,且他的叙述部分与女性角色的回忆性叙述存在不一致之处。这样的差异促使学生更加深入观察男性角色的叙述,不再仅将他视为一个成功但自大的男性。

2. 对叙述视角的讨论

为引入叙述视角的讨论,教师设计问题6. *How does the narrator describe the woman's reactions to the man's stories?* 起初,学生关注的是女性角色有限的口头回应,学生普遍认为女性角色多在倾听,发言较少,反映出她较为内敛的个性。随着对文本的细致阅读,学生发现叙述者虽然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引语的方式让女性角色“发声”,但有大篇幅的表情、动作尤其是思想和

情感的描述。这时部分学生开始有了疑问：整个故事的视角，像是由空间里架起的摄像头在观察，那么为什么会写到女性角色的情感和思想呢？这种情感的表露和思想的动态似乎只有深入女性角色内心才能知晓。

这种疑惑让学生逐渐意识到，不仅叙述声音会转变，叙述视角也会发生变化。虽然叙述声音仍然是故事外-异故事的外在叙述，但视角从外部的全知视角转入女性角色的内心，是从女性角色的内视角聚焦对她的思想和感情进行描述。这种外在的“沉默”通过视角转化，弥补了女性角色在话语层面的缺失。不仅如此，在阅读过程中，学生普遍反馈自己会顺着女性角色的思路看这场重逢的故事，也归功于有限的内视角的作用。

3. 对隐性进程的讨论

为加深学生对于文本隐含意义的挖掘，教师设计问题11. Why does the woman finally decide to leave? 学生几乎异口同声地回应，受不了这个自私自大的男性角色。教师继续追问，“Is the woman entirely justified in her judgment of the man, or might her perspective also be limited in some way?” 同时引导学生关注文中两段

回忆的描写，为什么男女主的记忆完全不同。

讨论初期，学生大多同情女性角色，一味谴责男性角色的自我中心。这种效果正是叙述视角和叙述声音的转变带来的。读者同情女性角色，是因为叙述的聚焦点从外部转移到女性角色，更详尽展露她的思想动态和情感变化，引起读者共情。而男性故事内-同故事的叙述声音会给人一种过度的自我叙述，让读者产生不信任的感觉。

然而随着讨论深入，学生发现男女主人公对两段恋爱时期的回忆截然不同，男性角色的记忆里，两段经历都是美好的；而女性角色想到这两段回忆，充斥着对男性角色的挑剔和批判。这一观察让学生开始意识到，男性角色的叙述声音不可靠，女性角色的叙述视角也并不客观。引导学生关注这些细微线索，发现情节之下塑造女性角色这条隐性的叙事进程，让故事更丰满，人物塑造更立体。

五、教学效果

在英语精读课采用叙事脚手架模式后，学生的阅读实践有了显著变化。过去，学生注重语篇的生词、短语、长难句等表层信息，认为理

解情节即读懂文本。教师通过结构化问题搭建叙事脚手架,让学生开始关注文本的叙述声音、叙述视角等叙事策略。

问题驱动的方式,不仅激发了学生大胆怀疑,积极思考,在小组讨论过程中,学生们寻找文本细节佐证自己的观点,锻炼了分析和表达能力。翻转课堂的组织形式,给予学生充分的表达空间,畅谈自己的观点,与同学碰撞出思维的火花。

精读课的讨论,让学生们不再满足于接受一个扁平的“自私自大的男性角色”或“沉默内敛的女性角色”,而开始质疑叙述的可靠性,辨别叙述声音背后的权力关系,发现叙述聚焦转变后产生的隐性叙事进程。这些变化都表明,叙事脚手架模式能有效帮助学生从文本表层理解走向深层含义解读,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发展。

六、结语

本研究将叙事学知识融入英语精读课的文学语篇并开展教学实践。通过叙事脚手架模式,将抽象的叙事学概念转化为一系列问题,以问题驱动的方式,引导学生从文本表层理解转向深入解读。研究表明,叙事脚手架模式能有效提高学生课

堂参与度;通过结构化提问,学生能识别叙述声音、叙述视角、隐性叙事等特征,并逐步分析和评估每种叙事策略对人物塑造和主题表达起到的效果,完成对文本的深入挖掘。更重要的是,当叙事学转化为一种教学手段,能够弥补教学与文学文本解读的鸿沟。叙事脚手架模式把抽象的文学理论转变为学生可以运用并能为学生理解文本提供支持的工具,这既为文学语篇的教学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又为培养学生的文学赏析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提供了新的可能。

参考文献

- [1] 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S].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90-95.
- [2] 杨立民. 现代大学英语(第三版)精读3[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2:3.
- [3] 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S].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15.
- [4] 申丹, 王丽亚. 西方叙事学: 经典与后经典[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3-5,94-98.
- [5] Vygotsky, L. S.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ambridge[M].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261.
- [6] Gibbons, Pauline. *Scaffolding Language, Scaffolding Learning: Teaching English*

- Language Learners in the Mainstream Classroom (Second Edition)[M]*. Portsmouth: Heinemann, 2015:14.
- [7] Wood, D., Bruner, J. S., & Ross, G. The Role of Tutoring in Problem Solving[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976:90.
- [8] 安德森.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 分类学视野下的学与教及其测评(完整版)[M]. 蒋小平等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48-53.
- [9] Genette, Gérard.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M]*. Trans. Jane E. Lewi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186.
- [10] 热奈特.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 王文融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129-133.
- [11] 申丹. 双重叙事进程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3.

人机共生与价值重塑：人工智能赋能音乐教育的范式转型与伦理进路

武 慧，侯星羽

(1.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四川绵阳 621010;

2. 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四川成都 610101)

摘 要：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推动音乐教育从传统的“口传心授”走向人机协同的全新范式。本研究系统梳理了AI在音乐教学模式重构、个性化学习、智能评价及创作表演等核心场景的应用实践，揭示了教育目标从技能导向向审美创造并重、教学重心从教师主导向学生主体回归的价值转向。然而，技术理性与艺术感性的深层冲突、人机协同中主体性消解的隐忧、数据壁垒与生成式AI带来的伦理风险，构成了融合进程中的现实困境。本研究提出，未来音乐教育应重塑教师角色，构建技术与艺术协同的框架，确立“以人为本”的伦理准则，从而在技术赋能中坚守教育本质，推动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的音乐教育生态形成。

关键词：人工智能；音乐教育；人机共生；范式转型；教育伦理

Human-Machine Symbiosis and Value Reshaping: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and Ethical Pat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ed Music Education

WU Hui, HOU Xingyu

(1.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Sichuan, China; 2. Music Colleg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1,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propelling music education to evolve from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oral instruction and intuitive mentorship** into a new paradigm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作者简介：武慧，1978—，女，汉族，青海乐都人，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音乐学；侯星羽，2006—，女，汉族，四川绵阳人，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本科，研究方向：音乐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南科技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立德树人视域下‘雅歌、古谱诗词’课堂教学的创新实践与守正探索”（项目编号：22xn0076）资助成果。

of AI in core scenarios includ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music teaching models, personalized learning, intelligent assessment, as well as music creation and performance. It reveals the value transition of music education: educational objectives have shifted from skill-oriented training to balanced emphasis on aesthetic cultivation and creative ability, while the teaching focus has returned from teacher dominance to student subjectivity.

Nevertheless, profound conflicts between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artistic sensibility, potential risks of subjectivity dissipation i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together with ethical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ata barriers and generative AI, have formed practical dilemmas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uture music education should reshape teachers' professional roles, construct a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integrating technology and art, and establish the people-centered ethical principle. It aims to uphold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ami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facilitate the formation of a diversified and sustainably developed music education ecosystem.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usic Education; Human-Machine Symbiosis;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Educational Ethics

一、引言

2024年至2025年，以Suno、Udio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音乐工具迅速崛起，用户只需输入简单的风格提示词，即可在数十秒内生成结构完整、音质逼真的歌曲。与此同时，智能陪练系统、AI声乐评估平台已在国内多所音乐院校投入日常教学。这些现象标志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人工智能不再仅是实验室中的技术设想，而是正在实质性地介入音乐创作与教育的核心环节。然而，技术进步也引发了深层隐忧：当机器能够创作出令人惊叹的音乐作品时，人类的学习与创作还有何独特价值？当智能系统能够精准评判演奏的音准与节奏时，教师的角

色将被如何重新定义？

这种张力并非偶然。音乐教育的核心是审美体验与情感交流，依赖于师生在音响材料中的反复琢磨、身体律动中的默契配合以及对作品意蕴的共同领悟。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1958）在其经典著作《个人知识》中指出，人类知识中存在大量“默会的维度”（tacit dimension）——那些我们知道但难以言说的东西。音乐教育中的“口传心授”正是默会知识的典型实践：教师通过示范、比喻、肢体语言传递的不仅是技术规范，更是一种无法被完全编码的艺术感觉。这种默会知识，恰是当前人工智能难以完全模拟的。与此同时，技术的引入确实提升了教学效率、扩展了资源获取渠道、增强

了评价的客观性。在技术狂飙与人文反思交织的语境下，厘清人工智能赋能音乐教育的应用逻辑、价值转向与潜在风险，已成为推动该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

近二十年相关研究的争论焦点已发生明显转移。早期研究（如舒泽池，2000；谷勇，2007）主要探讨电脑音乐系统能否进入课堂、是否会削弱教师权威，核心问题是“是否引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以及何劲豪与任恺（2024）、刘兵与刘咏莲（2024）等学者对AI伦理风险的系统分析，加之胡辰飞（2025）关于人工智能驱动音乐教育变革中教育公平问题的探讨，焦点已转向“如何深度融合”——如何在技术理性与艺术感性、效率提升与情感传承、算法推荐与主体选择之间寻求平衡。这意味着我们不再为技术应用的合法性辩护，而需深入思考，人工智能在何种条件下能真正服务于音乐教育的育人目标，哪些环节适合交给算法，哪些必须保留教师的在场，当机器能生成高水准音乐时，学生的创作能力培养应如何定位，这些问题已触及音乐教育的本体论与价值论。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音乐教育的核心议题。具

体而言：第一，梳理AI在音乐教学模式、资源环境、评价体系及创作表演等领域的具体应用，揭示其推动教育范式转型的内在逻辑；第二，剖析技术融合过程中暴露的现实困境，包括传统教学体系的技术排斥、主体性消隐、数据壁垒以及师生情感连接的挑战；第三，提出构建“以人为本”的智能化音乐教育新生态的应对策略，涵盖教师角色重塑、技术与艺术协同框架的建立以及伦理准则的确立。通过这一“赋能—转型—困境—进路”的分析框架，本文旨在为人工智能时代音乐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二、赋能与转型：人工智能重塑音乐教育的核心路径

（一）教学模式的智能化重构

传统音乐教育的核心模式是“口传心授”——教师通过示范演奏或演唱，学生通过模仿与反复练习来掌握技能。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传递那些难以言表的音乐感觉与身体记忆，其局限则在于高度依赖教师的个人经验与有限的时间精力，难以实现大规模的个性化教学。人工智能的介入正在改变这一格局。谷勇（2007）较早指出，高

智能化音乐软件为互动式交流开辟了新天地，使网络教学成为可能，预示了技术对教学关系结构的重塑。随后，李伟（2019）提出构建基于神经网络的交互式音乐智能系统，该系统能够感知、分析学生的演奏并给出反馈，标志着教学从单向传授转向人机双向互动的全新模式。进入2020年代，应用场景不断丰富：高颀、吴振陆（2021）在声乐教学领域指出，人工智能推动教学设备智能化、档案化及训练人性化；孟卓（2021）从美育范式角度探讨了声乐网课的建构，认为智能技术丰富了教育资源；黄少婷（2026）通过案例研究证实智能声乐评估与虚拟情景训练能有效提升教学效率并优化学习体验。

值得深入分析的是，人机协同并非简单的“机器替代人”，而是一种新型教学关系的生成。教师仍然负责教学目标的设定、情感的激发与价值的引导，而机器则承担数据采集、即时反馈、个性化推荐等功能。赵扬（2026）基于活态教学研究指出，AI通过多模态数据处理和虚拟实践场景构建，能突破时空限制，激活教学过程的动态交互性。这种协同关系的关键在于“分工”而非“替代”——让机器做机器擅

长的事（数据处理、模式识别、即时反馈），让人做人擅长的事（情感交流、价值判断、创造性启发）。

在个性化学习方面，传统音乐教育长期存在“一刀切”的痛点。人工智能通过数据分析与算法模型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技术支撑。谷勇（2007）指出电脑音乐系统使课堂教学能够产生互动式交流，为个性化教学奠定了技术基础。白小墨（2020）强调，人工智能有利于记录学习档案并为后续教学提供依据。陈思宇、王家馨（2024）深入分析了AI根据学生兴趣和学习风格量身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的能力。在实际应用中，个性化学习系统通常包含学习者画像构建、内容推荐算法和动态调整机制三个模块。陈世哲（2024）结合大模型特点，指出其在提升个性化学习体验方面的积极影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个性化教学技术在特殊音乐教育领域展现出独特价值。陆艳彦（2024）提出应深度挖掘个性化教学技术以服务于特殊音乐教育领域，例如为视力障碍学生提供语音交互和触觉反馈支持，为听力障碍学生通过视觉化呈现音乐参数辅助理解。孙若水、许可（2026）从评价范式变革的角度，指出AI能服务于个性化发

展识别,实现教学反馈的精准化。当然,个性化学习也面临算法推荐可能形成“信息茧房”的挑战,如何在个性化与多样性之间取得平衡,是技术设计者与教育者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二) 资源环境与评价体系的数字化升级

音乐教学对空间与环境有特殊要求,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这一空间形态,催生出智慧教室与虚拟情景训练等新型教学环境。智慧教室的核心特征是“感知—分析—反馈”的闭环:通过部署传感器、摄像头、麦克风等设备,实时采集学生的演奏或演唱数据,AI系统分析后即时生成反馈信息。黄少婷(2026)重点指出“虚拟情景训练”在提升教学效率与优化学习体验方面的巨大潜力,学生可通过VR设备置身于虚拟音乐厅或录音棚中进行表演练习。赵扬(2026)强调,人工智能通过构建虚拟实践场景,能够突破传统音乐教育的时空限制,激活教学过程的动态交互性。冉童欣(2024)以中北大学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智慧教室与虚拟训练场景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度,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

在硬件载体方面,音乐机器人、智能乐器及在线教学平台等新型工具正在拓展教学互动与资源获取的方式。李伟(2019)提出具备神经网络的音乐机器人不仅能听懂和分析音乐,还能进行创作,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交互式教学智能系统。赵宇(2020)的研究关注智能电声乐器、智能教学系统及音乐教学APP在音乐培训中的应用,认为这些设备有效提升了教学质量。智能钢琴、智能吉他等设备通过LED指示灯、传感器检测等功能,使初学者能够更快获得正向反馈,降低学习门槛。在线平台方面,孟卓(2021)探讨了声乐网课如何丰富教育资源、实现教育全民化;刘兰兰(2024)列举了将人工智能技术移入乐器形成智能乐器的应用;陆艳彦(2024)深度剖析了在线课堂等数字技术平台在智能音乐分析与个性化教学方面的贡献。

教学评价体系的智能化变革是另一重要维度。传统音乐教育评价高度依赖教师的主观判断,难以实现对学习过程的持续追踪。魏崇(1986)早期强调音乐教育对智力开发的促进作用,为引入智能评价奠定了理论基础。舒泽池(2000)初步涉及了技术辅助下的音乐教学

新形态。李伟（2019）提出构建交互式教学音乐智能系统，能够对学生的音乐感知与创作能力进行更全面的评估。白小墨（2020）指出，人工智能有利于记录档案，呈现学生在音准、节奏、表现力等不同维度的变化曲线。陈思宇、王家馨（2024）明确提出建立智能化评价体系，使评价更加客观。孙若水、许可（2026）深入探讨了AI驱动下的教学评价范式变革，明确提出AI能够实现“过程监管实时化”与“个性化发展识别”，使评价不再是期末的一次考试，而是贯穿整个学习过程的持续对话。当然，智能化评价也面临挑战：技术指标的客观性不等于艺术判断的全面性，如何在量化指标与艺术表现之间建立合理的权重关系，是评价系统设计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

（三）音乐创作表演的技术革新与价值延伸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标志着机器从辅助工具向创作主体的深刻转变。早期探索主要集中于软件辅助层面：谷勇（2007）指出高智能化音乐软件为新的教学思想和互动式交流开辟了广阔天地；韩梅等（2022）分析了音乐编程等产物在音乐创编领域的具体应用；刘鼻智、

韩宝强（2020）通过AI创作交响奏曲的案例，肯定了AI在音乐创作中的潜力。随着技术演进，生成式AI的能力大幅提升。陈世哲（2024）分析了大模型在音乐创编教学中的特点，指出其能激发教学模式创新并促进跨学科融合。何劲豪、任恺（2024）探讨了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提升学生学习策略选择能动性方面的潜能。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可以使用AI工具快速生成旋律片段、和声进行或伴奏音型，降低创作门槛。

然而，生成式AI的应用也引发了深层争议。裴龙（2026）从艺术人类学视角审视了AI“制造”智能音乐的现象，指出其虽能降低创作门槛，但也潜藏着消解人类创作劳动实践价值的深层隐忧。这种隐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工具依赖可能导致学生创作能力的萎缩；二是创作主体的消解——当机器能够生成与人类作品难以区分的音乐时，“作者”的身份与“原创性”的价值如何界定？音乐教育必须在拥抱新技术的同时，保持对核心价值的清醒认知。AI可以成为创作的“催化剂”和“协作者”，但不应成为创造力的“替代品”。

在影视与舞台音乐领域，人工

智能的应用同样引人注目。曾文幸、孙愈中（2026）梳理了人工智能在国内外电影配乐中的实际应用，发现AI能够根据电影的主题、情节及情感需求生成高度个性化的背景音乐，并模拟多种风格。在音乐剧领域，王美淋（2026）指出人工智能已改写音乐剧的生成逻辑与表演秩序，构建了“工具—文本—场域—课程”四维坐标系，提出了“弱作者中心”等分析范畴。研究认为，作品边界正转向生成域，审美判断扩展至协同与流程质量，从而倒逼课程设计的模块化改革。这意味着，未来的音乐剧创作不再是单一作者的产物，而是人类艺术家与AI系统协同工作的结果，要求培养既懂艺术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三、冲突与困境：技术理性与艺术感性的张力

（一）传统教学体系的技术排异与主体性消隐

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并非一帆风顺。毕莹（2026）在研究高校声乐教学时明确发现，传统教学体系对技术革新存在显著的“排异”反应。这种排异源于艺术感性传承与技术理性逻辑之间的深层张力。传统音乐教学的核心是“口传心授”，其

有效性建立在师生之间的长期互动与默契之上。教师通过示范、比喻、肢体语言等方式，帮助学生理解和感受音乐的微妙之处，这种方式难以被完全数据化或算法化。当AI系统试图用精确的参数来规范表达时，传统教师会感到自己的专业判断被技术逻辑所取代，从而产生抵触情绪。此外，何劲豪、任恺（2024）指出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导致师生情感联系淡化，这种对人文情感缺失的担忧构成了传统教育伦理对技术介入的隐性排斥。刘家琿（2026）强调，技术提供的间接经验和建构的学习框架可能异化师生关系，导致传统教育者对技术浪潮产生警惕，形成对技术全面渗透的防御机制。这种防御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价值的——它提醒技术开发者与教育政策制定者，不能以效率为名牺牲艺术教育的独特价值。

更为根本的担忧在于，人机协同可能导致师生主体地位的边缘化。文汇（2021）较早指出，技术可能导致音乐教师特殊定位的模糊及师生关系的异化。在传统教学中，教师不仅是技能的传授者，更是艺术理想的激发者、审美品位的塑造者、情感支持的提供者。如果这些功能逐渐被机器取代，教师的价值将如

何体现,何劲豪、任恺(2024)警示技术可能加剧学生对主体的依赖、淡化师生间情感联系。毕莹(2026)聚焦高校声乐教学,揭示了人机协同中主体性消解的困境:声乐教学依赖师生之间的听觉互动与身体感知,如果这些过程被AI的声学分析所替代,师生之间的艺术对话就可能退化为冷冰冰的数据交换。裴龙(2026)从艺术人类学视野出发,担忧海量智能音乐的涌现可能消解人类在音乐创作劳动实践中积累的具身经验与主体价值。当机器能够模仿甚至超越人类在特定技能上的表现时,人类的艺术实践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艺术作为人类情感表达与意义建构的独特功能,正是音乐教育需要坚守的核心。

(二) 数据壁垒、生成式 AI 风险与情感连接的挑战

在技术落地层面,数据壁垒与教学场景的适配难题突出。毕莹(2026)指出,在高校声乐教学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中,面临着“数据壁垒与教学场景的适配”等多重困境。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标准不统一、互操作性差,导致“数据孤岛”现象。更根本的问题在于,通用智能模型难以精准对接音乐学科特有的感性化、个性化训练场景。田清、向

婷(2026)认为当前音乐教育智能化转型受限于技术应用与教学场景的脱节。例如,一个在语音识别领域表现出色的模型,在处理歌唱声音时可能效果不佳;为钢琴练习设计的智能陪练系统,很难直接应用于小提琴或声乐教学。孙若水、许可(2026)也暗示了现有评价数据难以实现智能化升级和动态发展,反映了数据标准与评价场景适配的滞后性。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技术开发者与音乐教育者之间的深度合作,而非单纯的技术移植。

生成式AI在提升创作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何劲豪、任恺(2024)指出,生成式AI存在提供不实素材、加剧主体依赖以及淡化师生情感联系等显著风险。不实素材的问题尤为突出——AI生成的音乐分析、历史背景或技术说明可能存在事实错误,而学生难以辨别。教师在使用AI工具时需保持警惕并进行内容审核。依赖风险则更为隐蔽:当学生习惯于使用AI生成旋律、和声或歌词时,他们的创作能力可能逐渐萎缩。刘家琿(2026)强调技术提供的间接经验可能影响师生关系的构建,主张确立教师作为教育本质“最终守护者”的地位。裴龙(2026)分析了海量智能音乐涌

现背后潜藏的深层隐忧，认为这可能消解人类在音乐创作劳动实践中积累的具身经验。

音乐教育本就依赖情感互动与具身体验，而算法中介可能削弱这种直接性。何劲豪、任恺（2024）明确警示技术存在淡化师生情感联系的隐患。刘家琿（2026）呼吁在技术浪潮中守护师生间的情感纽带。学生在演奏或演唱时的紧张、兴奋、挫败、喜悦，都需要教师的敏锐察觉和适时回应。如果这些互动被AI系统所替代，音乐教育就可能失去其灵魂。当然，技术对情感连接的影响并非全然负面——合理的应用可以增强师生互动，例如AI系统帮助教师更早发现学生的情绪变化或学习困难。关键在于，技术应该服务于情感连接，而不是取代它。

四、共生与进路：构建人机协同的伦理框架与教育新生态

（一）教师角色的重塑与AI素养的构建

应对上述困境，教师角色的转型首当其冲。陈胜国、孔家星（2020）明确提出，应对智能化挑战的首要策略即是重塑音乐教师的教育观念。教师不再仅仅是技能的传授者，更应成为技术赋能的引导者、情感连

接的守护者。这种观念更新的核心是从“技术恐惧”走向“技术自觉”：教师需要认识到，AI不是来取代他们，而是来解放他们——将教师从繁重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那些机器无法替代的工作中：激发学生的艺术热情、引导审美判断、提供情感支持。刘家琿（2026）强调，教师应作为教育本质的“最终守护者”，积极倡导价值理性，建立风险评判体系。孔德文（2026）提出教师需从“教师主导”转向“学生主体”，提升自身的AI素养和人机协同教学能力，以适应从“技能导向”向“审美和创造并重”的价值取向转变。

高校音乐师范生作为未来的音乐教师，其AI素养的构建尤为关键。章崇彬（2025）系统构建了包含技术认知、实践操作、批判性思维与创造力四个维度的素养框架，并指出当前师范生存在科技知识匮乏、跨学科意识不足及伦理认识薄弱等问题。解决方案在于课程体系的改革，通过开设“音乐科技应用”等课程加强培养，内容不仅包括技术操作培训，更应涵盖AI伦理、人机关系、技术与艺术融合等问题的深入探讨。朱鑫磊（2025）提出了包含AI音乐工具应用能力、跨学科知识

融合能力、伦理意识与社会责任及审美能力与文化自信的素养培养目标。韩娜、赵扬（2026）基于协同教育理论，提出构建覆盖“教—学—练—评”全流程的协同培养机制，以培养既能驾驭AI技术又坚守教育本质的新型音乐教师。

（二）技术与艺术协同框架的建立

创新人机协同教学模式是核心抓手。毕莹（2026）提出需创新人机教学模式以构建技术与艺术协同框架。关键在于找到人机分工的最佳平衡点：基础技能训练中的音准、节奏等可量化指标的即时反馈，乐理知识、音乐史等事实性内容的个性化推送，学习档案的记录与可视化呈现，简单编曲任务的快速生成与修改等任务可以更多地交由AI承担；而对演奏中艺术表现力的指导、音乐作品深层意蕴的阐释、学生创作作品的审美评价、学习情感状态的关注与疏导等任务，则应保留人类教师的主导。任文杰、邓威（2026）强调应遵循“融合创新的人文主体性”原则，通过审美认知工具的智能化革新与审美体验场景的沉浸式营造，实现技术理性与艺术感性的深度融合。王美淋（2026）构建的“工具—文本—场域—课程”四维坐标系，为重塑创作与表演秩

序提供了理论参照：在创作教学中，AI可以作为“协同创作者”提供多种可能性，学生则作为“最终决策者”运用审美判断进行筛选和整合。

优化音乐教育智能化的发展环境同样不可或缺。在政策层面，陈胜国、孔家星（2020）主张国家层面应建立健全保障体系并加大资金扶持，包括制定技术标准与数据规范、设立专项经费、建立质量监控与评估机制。在基础设施层面，刘兰兰（2024）强调需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并组织教师培训，硬件建设必须与软件服务、人员培训同步推进。在合作机制层面，胡辰飞（2025）呼吁在创造新机会的同时关注教育公平，构建包容性的智能化教育环境，关注农村、边远地区和特殊教育学校的智能化需求，通过校企合作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

（三）“以人为本”的伦理准则与可持续发展机制

确立“以人为本”的伦理准则是所有努力的最终依归。刘兵、刘咏莲（2024）系统论证了“以人为本”应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伦理准则，确保技术服务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在引入任何AI技术之前，都需要追问：这项技术是否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否有助于音乐教

育育人目标的实现?建立风险评判体系是制度保障。何劲豪、任恺(2024)提出了抑制唯技术论、防范人际关系消沉等具体规范路径,可转化为可操作的评价指标,用于审核和评估进入课堂的AI产品与服务。刘家琚(2026)主张摒弃二元对立思维,建立系统的风险评判体系,在具体使用场景中评估技术的利弊。孔德文(2026)指出,在AI推动音乐美育从“技能导向”向“审美和创造并重”转型的过程中,必须通过提升教师素养和营造良好生态来坚守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的理念需要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准则。在课程设计层面,AI辅助教学的内容和方式应服务于学生的兴趣激发与能力发展,而不是单纯追求效率最大化。在评价体系层面,量化指标不能取代教师的艺术判断,AI评价结果应作为参考而非替代。在师生关系层面,技术应该增强而非削弱师生之间的情感连接,AI系统应设计为“增强教师能力”的工具而非“替代教师”的方案。任文杰、邓威(2026)强调,音乐审美教育应遵循“融合创新的人文主体性”原则,坚定聚焦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一核心目标,在技术应用过程中始终保持对

“人”的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审美趣味、创造潜能、价值观念,而不是仅仅关注技术指标是否达标。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系统梳理了人工智能赋能音乐教育的多维图景,从教学模式的智能化重构、资源环境的数字化升级到教育价值范式的根本转向,揭示了技术驱动下音乐教育从“技能传授”向“审美创造”与“主体回归”转型的必然趋势。研究表明,AI技术为突破传统音乐教育的局限、实现个性化与规模化教学提供了强大动力,推动教育目标从技能导向向审美创造并重、教学重心从教师主导向学生主体回归。

然而,研究亦表明,技术理性与艺术感性的深层冲突、数据壁垒带来的适配难题以及师生情感连接可能面临的异化风险,构成了当前融合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现实困境。传统教学体系对技术革新的排异反应、人机协同中主体性消解的隐忧、生成式AI带来的不实素材与依赖风险,都在提醒我们:技术赋能不能以牺牲人文温度为代价。

未来,构建人机共生的音乐教育生态,需要在以下方向持续探索:一是重塑教师角色,提升师生AI素

养,使教师成为技术赋能的引导者
与人文价值的守护者;二是构建技
术与艺术协同的框架,创新人机协
同教学模式,优化智能化发展环境;
三是确立“以人为本”的伦理准则,
建立风险评判体系,确保技术服务
于人的全面发展。

后续研究还应进一步聚焦于以
下方向:本土音乐文化在智能环境
下的数字化传承路径——如何利用
AI技术记录、分析和传播传统音乐
遗产,同时避免文化本真性的流失;
特殊群体音乐教育的精准化支持体
系——如何针对视力障碍、听力障
碍、自闭症等不同特殊需求开发定
制化的AI辅助教学工具;动态可解
释的智能化教学评价模型的开发——
如何让AI的评价过程更加透明、
可理解,从而增强教师和学生评价
结果的信任。

人工智能并非要取代传统音乐
教育,而是通过人机协同推动教育
生态的深层变革。在技术浪潮中坚
守教育本质,在效率追求中守护人
文价值,这才是音乐教育走向未来
的正确姿态。我们需要的不是对技
术的盲目崇拜或本能排斥,而是在
深刻理解技术逻辑与艺术规律的基
础上,审慎地、创造性地将两者融
合,最终服务于一个根本目标——

培养能够感受美、创造美、传播美
的全面发展的人。

参考文献

- [1] 谷勇. 现代音乐教育与现代AI/IT技术[J]. 音乐探索, 2007(02).
- [2] 李伟. 音乐人工智能在音乐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及研究[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2019(03).
- [3] 白小墨. 人工智能技术在音乐教学中的应用[J]. 四川戏剧, 2020(09).
- [4] 陈胜国, 孔家星. 智能化时代音乐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 艺术评鉴, 2020(15).
- [5] 高鲲, 吴振陆. 人工智能视野下高校声乐教学展望[J]. 艺术教育, 2021(06).
- [6] 孟卓. 声乐网课的建构及其美育范式[J]. 当代音乐, 2021(02).
- [7] 文汇. 对人工智能技术与音乐教育交互的思考[J]. 四川戏剧, 2021(09).
- [8] 韩梅, 李茜蒙, 姚德鹏, 李聪. 人工智能与音乐教育发展探究[J]. 亚太教育, 2022(02).
- [9] 王欣. 人工智能驱动音乐教育变革之思[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2022(06).
- [10] 陈思宇, 王家馨. 人工智能在专业音乐教学中的应用与展望[J]. 黄河之声, 2024(12).
- [11] 陈世哲. 人工智能在音乐教育及创编教学中的应用[J].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2024(04).
- [12] 何劲豪, 任恺.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领域的潜能、风险及规范路径——以音乐教育为例[J]. 中国音乐教育, 2024(01).
- [13] 刘兵, 刘咏莲. 人工智能时代“以人为本”的音乐教育应然走向探究[J]. 中国音乐教育, 2024(01).
- [14] 陆艳彦. 音乐教育创新与人工智能的

- 深度融合——本土音乐文化传承与特殊音乐教育的前瞻性发展[J]. 当代音乐, 2024(04).
- [15] 刘兰兰. 浅谈智能化时代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J]. 戏剧之家, 2024(06).
- [16] 冉童欣. 人工智能技术在音乐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中北大学为例[J]. 当代音乐, 2024(01).
- [17] 章崇彬. 音乐专业大学生人工智能素养的构建与实践[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2025(01).
- [18] 胡辰飞. 人工智能驱动新时代音乐教育变革之思[J]. 当代音乐, 2025(08).
- [19] 朱鑫磊. 面向未来的高校音乐教育: 人工智能素养培养与提升[J]. 艺海, 2025(09).
- [20] 吴晓芳. 人工智能时代音乐教育课程改革路径与策略探究[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5(S1).
- [21] 毕莹. 高校声乐教学中人工智能与传统教学融合的困境与突破路径[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6(03).
- [22] 黄少婷.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声乐教育教学创新提质的实践路径探究[J]. 黄河之声, 2026(04).
- [23] 孙若水, 许可. 基于人工智能驱动的高职音乐教学评价范式变革研究[J]. 黄河之声, 2026(04).
- [24] 王美淋. 人工智能介入的音乐剧创作与表演: 从音乐教育技术到艺术哲学的三重转向[J]. 中国音乐剧, 2026(01).
- [25] 刘家琿. 人工智能技术浪潮中的教育本质守护——以音乐学科为例[J]. 音乐教育与创作, 2026(02).
- [26] 任文杰, 邓威·聚焦·融创·重塑: 人工智能时代音乐审美教育的三重向度[J]. 黄河之声, 2026(01).
- [27] 孔德文. 论人工智能影响下音乐美育课程的价值取向发展路径[J]. 中国音乐剧, 2026(01).
- [28] 赵扬. AI技术驱动与范式革新下高校音乐教育专业活态教学研究[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26(01).
- [29] 韩娜, 赵扬. AI技术助力高校音乐师范生创意实践能力的协同培养机制研究[J]. 艺术教育, 2026(02).
- [30] 田清, 向婷. AI视域下音乐教育的智能化转型——从核心要素、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三维度分析[J]. 乐器, 2026(03).
- [31] 曾文幸, 孙愈中. 人工智能在电影音乐创作中的技术变革与艺术重构[J]. 视听理论与实践, 2026(02).
- [32] 裴龙. AI“制造”: 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智能音乐[J]. 民族学刊, 2026(03).

西域和边疆：马克林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译介研究 ——海外汉学视域下的历史、文化与话语建构

刘力媛

(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9)

摘要：本文以马克林（Colin Mackerras, 1939—）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与译介为核心个案，在海外汉学视域下考察“西域”与“边疆”如何被转化为可理解的历史与文化叙述。文章首先梳理中国边疆从古代“西域”到现代多民族国家叙事的历史演变，指出其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话语建构的重要场域。在此基础上，结合Orientalism与翻译研究中的“改写”理论，分析马克林在著述与译介过程中如何通过选材、叙述策略与文化解释，对中国少数民族形象进行重构。研究发现，其译介既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东方主义的刻板再现，呈现出多元与动态的民族图景，但同时仍受到西方学术话语与认知框架的制约。文章认为，海外汉学中的中国边疆形象，是历史事实、翻译实践与跨文化话语互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该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中国边疆叙事国际传播机制的理解，并为中国形象的跨文化建构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西域；边疆；少数民族；译介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Frontier: Colin Mackerras's Mediation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 History, Culture, and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seas Sinology

LIU Liy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work of Colin Mackerras on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s a central case to examine how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frontier”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intelligibl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narratives within overseas Sinology. It first traces the evolution

作者简介：刘力媛，1994—，女，汉族，湖北荆门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典籍英译；海外汉学。

基金项目：本研究成果由四川省国际科技合作（澳新）研究院课题“他者之镜：马克林汉学译介中的中国形象重构”（项目编号：AXYJ(WH)-2025-16）资助。

of China's frontier from the ancient concept of the Western Regions to the modern discourse of a multiethnic nation-state, arguing that it constitutes not merely a geographical space but also a crucial site of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Drawing on Orientalism and the "rewriting" paradigm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paper analyzes how Mackerras reconstructs images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through selection of materials,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n his scholarly writings and translat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while his work partially transcends stereotypical Orientalist representations and presents a more dynamic and pluralistic picture, it remains shaped by Western academic frameworks and epistemological assumptions. It concludes that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frontier in overseas Sinology emerge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historical realities,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cross-cultural discourses.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frontier narratives and offers new insights into the cross-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mage.

Keywords: Western Regions; Frontier; Ethnic Minorities; Cultural Translation

一、引言

“如何诠释中国边疆融入中国历史的过程，既是当今历史学界遇到的巨大难题，更是中国边疆学也要解决的基本问题。”^{[1]358}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研究，使“西域”与“边疆”逐渐凸显为理解中国历史整体性的重要空间，同时也成为国际汉学讨论中国多民族国家结构、文化多样性及其历史互动的重要切入点。从唐代的回鹘、吐蕃到近现代的新疆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相关研究不仅涉及历史事实的重构，也深刻牵涉文化再现与话语建构的问题。在西方学界，对中国边疆与少数民族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史料翻译、民族志书写与学术译介的中介作用。在这一背景下，海

外汉学家通过翻译与研究所建构的“中国边疆形象”，不仅是学术问题，也具有跨文化传播与公共话语层面的影响。

然而，在跨文化传播层面，海外学界对中国边疆与少数民族的认知并非直接来自历史现实，而是高度依赖于译介。史料如何被翻译、民族文化如何被阐释、研究者如何在学术与公共话语之间定位自身，这些问题共同决定了“中国边疆”在西方世界中的呈现方式。

本文所使用的“译介”概念，并不限于狭义意义上的文本翻译，而是取其广义内涵，指通过翻译、研究、阐释与传播等多种形式，使特定文化与知识体系得以进入并重构于另一学术语境之中的过程。这一理解借鉴了勒菲弗尔关于翻译作

为“改写”（rewriting）的理论阐述，即翻译并非中性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深度嵌入意识形态、学术规范与文化机制之中的中介性实践。^[2]在海外汉学语境中，译介始终兼具三重属性：第一，学术属性：史料译注、研究写作；第二，文化属性：民族形象与文化意义的建构；第三，话语属性：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安排。因此，对海外汉学家的研究不应停留在“他们写了什么”，而应进一步追问“他们如何书写”、“为何如此书写”。

马克林是当代英语世界重要的汉学研究者之一。与以政治制度或思想史见长的汉学家不同，马克林的研究路径呈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征：他既长期深耕中国古代戏曲与文学，又在历史研究中持续关注边疆民族、区域互动与文化接触问题。其关于唐代回鹘、维吾尔族历史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如白族）的研究与译介，在西方学界产生了持续影响。相较于以现代政治或思想史为中心的汉学研究路径，马克林更关注历史叙事、文化实践与空间结构的关系。他的研究，恰好提供了一个观察海外汉学如何通过译介塑造中国边疆形象的典型个案。

因此，本文拟从译介学与话语

研究的角度，系统考察马克林如何在历史研究与文化阐释中建构中国少数民族形象，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马克林如何通过译介与研究呈现中国西域与边疆少数民族？其学术译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理解？这些译介实践在跨文化传播中建构了何种“边疆想象”？

二、马克林与西域研究的学术起点：从文学研究到边疆书写

在英语世界的中国研究中，边疆与少数民族问题长期处于两种相对分离的学术传统之中：一是以政治史与制度史为主导的研究路径（Barfield 1989^[3]；Di Cosmo 2002^[4]；Perdue 2005^[5]；Lewis 2006^[6]），二是以人类学与民族志为核心的方法范式。前者通常以中原王朝或帝国国家的治理逻辑为分析中心，将边疆纳入国家扩张与制度整合的宏观叙事之中（Lewis 2009^[7]）；后者则侧重地方社会与文化实践的微观考察，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历史纵深与整体结构的分析（Gladney 1991^[8]；Schein 2000^[9]）。在这一研究格局下，能够在同一分析框架内同时整合历史文本、文化实践与空间结构的综合性研究仍属少数（Millward 2007^[10]）。

马克林的学术路径恰恰处于这两种传统的交汇处。他并非以“边疆史专家”身份进入该领域，而是从中国文学，尤其是戏剧文学的研究出发，逐步将关注点延伸至历史书写中的空间与族群问题。这一背景决定了其西域研究并非单纯的事实重构，而更强调边疆如何在历史文本中被理解、被叙述与被定位。从海外汉学史的角度看，马克林代表了一种从“中心文本”反观“边缘空间”的研究取向，其学术意义不仅在于补充了西域史料的英文研究，更在于为理解中国结构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

马克林早期关于中国文学与戏剧文化的研究，尤其关注文本在程式化与象征体系中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与表演性文本如何通过特定的文化实践参与社会秩序与权威结构的建构。^[1]这一研究路径使其较早地意识到文本并非被动反映社会现实的媒介，而是嵌入权力关系与象征系统之中的文化实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林逐渐形成了将文本视为社会秩序生产机制加以分析的研究取向，这一方法论经验也深刻影响了其后来的历史研究。

在其学术视野中，历史并非由客观事实线性累积而成的透明记录，

而是通过叙事形式、修辞策略与文本结构不断被建构和重组的文化产物，这一点在方法论上与叙事史学和文化史的相关理论形成了内在呼应。^{[12]7-11}当马克林将研究重心转向唐代史书及其对西域民族的书写时，这一“叙事—文化”取向的优势尤为凸显。他并未将史书简单视为可直接提取“事实”的历史材料，而是将其理解作为一种具有明确意识形态功能与政治指向的文本形态，通过分析史书的叙述结构、修辞策略与空间表述方式，揭示帝国权力如何在历史书写中被合法化与自然化。

此外，马克林在西域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理论贡献，在于将“空间”确立为理解中国边疆历史的核心分析范畴。在其研究视野中，西域并非一个在地理意义上预先存在、边界清晰且恒定不变的区域，而是一个随着帝国政治格局、军事联盟关系及跨文化互动不断被重新界定的历史空间。这一空间并不单纯由自然地理决定，而是通过史学书写、制度安排与话语实践被持续生产和重塑，其边界与内涵具有显著的历史流动性。

通过对唐代回鹘相关史料的译介与分析，马克林进一步指出，正史文本中的“西域”并非单一、同

质化的他者空间，而是一个在帝国秩序之内被分层理解和差异化书写的复合区域。一方面，回鹘等政权在政治与军事上对唐王朝具有重要影响，其地位无法被简单归入传统史学中“化外之地”的范畴；另一方面，史书叙事又必须在结构上维持中原王朝的中心位置，从而通过话语调适将这一强势边疆政权纳入可被理解和管理的天下秩序之中。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西域”被建构为一个既可被整合、又始终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弹性空间。

这一分析路径突破了以往将边疆问题简化为“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凸显了中国边疆在历史进程中的动态性与关系性特征。西域并非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而是在不同时期通过外交、军事与文化互动，对帝国秩序的运行方式产生实际影响。马克林通过对史书叙事层面的细致考察，揭示了边疆空间如何在官方史学中被不断重新定义，从而为理解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空间逻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从译介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研究转向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翻译在此不再仅被理解为语言层面的意义转换，而是涉及对历

史叙事结构与解释框架的再阐释过程。马克林对西域相关史料的译介实践，实质上体现了一种“带有解释立场的学术翻译”，即通过译文重构历史叙事的意义重心，使特定历史经验得以在新的学术语境中被理解和讨论。

三、维吾尔族与新疆：历史译介、文化阐释与当代话语的交汇

“古维吾尔族为袁纥、韦纥、乌护、乌纥、回纥、回鹘、畏兀儿，都是由‘Uyghur’这一名称或与Uyghur同源的一个字转来的。它的意思是联合、协助，或归依者”。^[13]所以，在中国西域研究中，“回鹘—维吾尔”的历史连续性始终是一个高度复杂且容易被简化的问题。无论是在中国学界还是西方研究中，这一连续性往往被赋予强烈的现实意义，进而影响对现代新疆问题的理解。因此，海外汉学家如何在历史译介中处理这一问题，本身就构成一种重要的话语实践。

马克林在相关研究中采取了一种相对克制而审慎的译介立场。他承认唐代回鹘与现代维吾尔族之间在语言、文化与族群记忆层面存在历史联系，但同时强调二者并非可以简单等同的“同一民族”。这种处

理方式在方法论上体现了其一贯的历史主义立场：民族并非跨越时空保持不变的实体，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断重构的社会共同体。从译介学角度看，这种立场避免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将历史民族直接投射为现代民族的“倒置民族主义”解释；二是彻底否认历史连续性、将民族认同视为现代建构的激进建构主义。马克林的译介实践，正是在这两者之间维持一种张力平衡。

这种阐释方式在西方学界具有重要意义。早期英语世界关于维吾尔族的研究，往往受制于“伊斯兰—非伊斯兰”“东方—西方”等二元对立框架，容易将维吾尔族文化简化为中亚伊斯兰文明的一部分。马克林通过历史译介指出，维吾尔族文化既深受伊斯兰文明影响，也长期与汉地政治制度、书写传统和经济体系保持互动。从话语分析角度看，这种多源性叙述有助于削弱单一文明叙事的解释霸权，使维吾尔族历史呈现为一个开放、动态的过程，而非固定不变的文化实体。

在涉及新疆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林反复强调应将新疆理解为一个具有内在历史动力的“历史空间”，而非静态、被动的“边缘地带”。^[14]在其理论视野中，新疆并不只是中

原王朝权力辐射的末端，也不是单向度接受政治与文化影响的对象，而是长期嵌入欧亚大陆多重互动网络之中的关键节点。这一空间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政治博弈、经济交换与文化交流，与中原王朝、中亚草原以及更广泛的欧亚世界形成复杂而动态的联系。

这一历史空间观直接挑战了传统史学及部分西方叙事中将新疆视为“封闭边疆”或“文明边缘”的认知模式。马克林指出，新疆的历史意义无法通过单一文明中心的视角加以解释，而必须放置于跨区域互动的结构之中加以理解。^[15]无论是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交通体系，还是回鹘等政权在唐代国际格局中的角色，新疆始终处于多种政治与文化力量的交汇之处，其历史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关系性与开放性特征。这种理解路径与将历史空间视为社会关系产物的理论取向高度契合。^[16]

这一空间观在马克林的译介与论述策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翻译中国史籍及相关研究成果时，他并未将新疆简化为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中的“边远地区”，而是有意识地强调交通路线、贸易网络以及跨区域政治联盟在历史叙事中的结构性作用。^[17]通过在译文中保留原文

对空间流动、区域联系与权力互动的细致区分，他有效避免了将前现代新疆经验投射为现代地缘政治问题的简化处理。

在当代新疆议题高度政治化的国际语境中，马克林的相关研究呈现出一种较为鲜明的学术克制特征。与部分西方研究直接介入现实政策评判或道德指控不同，马克林更倾向于通过历史脉络梳理与结构性分析，为当代问题提供解释性背景，而非即时性的价值判断。在其论述中，新疆问题并未被简化为单一政治议题，而是被置于更长时段的历史进程、族群关系演变以及国家治理结构之中加以理解。

这种写作策略在当前西方学术研究与公共话语高度交织的环境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方面，当代新疆问题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政策文件与公共舆论中，学术研究很容易被纳入意识形态对立的框架之内；另一方面，学者的分析又不可避免地期待对现实立场作出回应。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林选择通过历史分析与概念澄清来回应现实议题，体现出一种对学术角色边界的自觉认知。^[18]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采取了相对克制的学术立场，马克林的研究

仍不可避免地被纳入西方关于新疆的公共话语体系之中。一旦研究成果进入英语世界，其阐释框架便可能被不同立场的读者重新解读，甚至被选择性引用，以服务于特定的话语需求。这恰恰揭示了翻译与译介在当代知识生产中的结构性处境：学术研究既试图保持解释的独立性，又无法完全脱离现实政治语境。

四、白族与西南边疆：文化连续性的译介与“非政治化”话语建构

“昆明部族，与汉晋以来迁入的汉族移民相融合，隋至初唐时期形成了众多部落，通称为‘白蛮’和‘乌蛮’”。^{[19]759}白族正是在这一学术传统中被认识与书写的。由于其历史上与中原王朝保持较为稳定的政治关系，且宗教实践呈现出明显的多元融合特征，白族文化较少被纳入“冲突—对立”的叙事框架之中。这一结构性背景，决定了马克林对白族的研究与译介，在话语环境与接受方式上明显不同于其关于维吾尔族的研究。从译介研究角度看，这种差异并非研究对象“本身”的属性，而是不同边疆区域在全球知识体系中所处位置的结果。

在对白族的研究中，马克林尤为关注宗教仪式、节庆活动及地方

信仰体系，并将这些文化实践置于历史记忆、社会结构与地方认同的网络之中进行分析。他并未将这些文化元素视为民俗材料的简单罗列或“异域趣味”的展示，而是强调其与地方政治、经济、宗族关系及社会分层的密切联系，从而揭示白族文化实践背后的社会功能和历史连续性。

进一步来看，这种译介实践也体现了海外汉学在面对地方宗教和民间信仰时的一种典型取向——通过强调文化逻辑的内在一致性，使其成为“可以理解的他者”，而非不可通约的异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和研究者不仅承担了知识传递的功能，也在跨文化语境中参与了文化认知的重构。通过对宗教仪式和节庆活动的解释性呈现，海外读者得以从内部逻辑理解白族社会，而不是仅仅作为外部观察者去解读表象或象征意义。

此外，在白族研究中，《白族文化的变与不变》是马克林研究白族的重要成果之一，其核心理论框架在于“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20]这一框架与当代文化研究中关于“传统再生产”和文化持续性的理论形成呼应。^[21]马克林认为，白族文化并非在现代化、旅游开发

或社会转型的浪潮中被动消解，而是在社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以及跨文化接触中，通过对传统元素的选择性保留、重新组合与再诠释，获得新的社会意义和实践形式。

具体而言，他强调白族节庆、宗教仪式、手工艺、建筑风格等文化元素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连续性与适应性。这种分析不仅揭示了文化实践内部的逻辑稳定性，也指出文化变迁并非简单的消失或替代，而是一种具有社会嵌入性和历史记忆维度的动态过程。在此意义上，马克林的研究挑战了将现代化与文化同质化、传统消解简单等同的线性叙事模式，为理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全球化与现代性语境下的复杂演变提供了重要理论启示。^[22]

值得注意的是，与维吾尔族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族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几乎不被政治化。马克林对白族的研究因此更容易被接受为“纯学术”或“文化研究”，其译介成果也较少引发意识形态争议。在西方学术界和公众话语中，白族文化通常被呈现为地方性、多样性与传统连续性的象征，而非具有即时政治敏感性的议题。这种“平静”使得白族成为海外汉学关注少数民族文化时的典型案例，其研究和译

介的学术影响相对集中在文化分析与历史阐释层面，而非政策评价或民族政治讨论。

从话语研究与译介研究的角度看，这种“非政治化”并非价值中立，而是特定知识结构和国际话语权力分布的产物。白族作为研究对象，恰好位于国际话语敏感性较低的区域，其文化在全球知识体系中容易被转化为“文化多样性”的象征。这意味着，学术选择与译介策略不仅受研究兴趣驱动，也受到全球知识政治、受众期望以及跨文化可接受性的深层制约。马克林在译介中通过强调文化连续性、地方实践与社会嵌入性，有意识地构建了一种“可理解、可欣赏”的文化形象，使海外读者能够在理解文化逻辑的同时，避免将边疆文化政治化或道德化。

五、比较与反思：区域差异与研究边界

通过对前文第二章（维吾尔族与新疆）和第三章（白族与西南边疆）的分析可以发现，马克林对中国边疆的译介并非采用单一模式，而是随着研究对象与区域特征的不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路径。这种差异并非个人偏好所致，而是深

刻植根于不同边疆区域在历史结构、文化形态与全球话语体系中的位置。

首先，在宗教结构上，西域地区以伊斯兰传统为核心，其宗教身份天然地嵌入全球政治与文明叙事之中；而白族宗教则呈现出佛教、道教与地方信仰高度融合的特征，更容易被理解为“地方文化实践”。这一差异直接影响了译介的语调与重点：前者更强调历史脉络与结构解释，后者则更侧重文化描写与象征阐释。

其次，在语言与跨区域联系方面，维吾尔族语言与中亚语系的关联，使其历史天然具有跨国性；而白族语言与汉语长期共存，其文化叙事更易被纳入“中国内部多样性”的框架之中。马克林在译介中对这种差异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敏感性，也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叙述重心。

最后，在全球化与现实政治路径上，新疆问题高度政治化，使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现实话语漩涡；而西南边疆则更多以旅游、文化遗产与地方现代性为议题。由此，译介在不同区域中承担的功能也明显不同：在西域，它更偏向解释与澄清；在西南，它更偏向展示与理解。

在整体评估马克林的学术贡献

时,应将其置于海外汉学与边疆研究的长期发展脉络之中,而非仅从单一议题或立场加以判断。首先,在研究视野层面,马克林显著拓展了英语世界汉学研究的空间维度。通过将西域与西南边疆纳入核心讨论,他突破了以中原政治与思想史为中心的传统汉学范式,使“中国”得以作为一个多区域、多族群互动的整体被重新理解。其次,在方法论层面,其研究体现出强烈的跨学科特征。他将史学、文化研究与译介实践结合起来,使边疆研究不再只是材料积累,而成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讨论。这种方法对于海外汉学中长期存在的“材料多、理论弱”问题具有一定矫正作用。最后,在译介实践层面,马克林通过高质量的史料译注与文化阐释,为西方学界提供了可靠的研究基础。他的工作使得唐代回鹘史料、白族文化实践等原本相对边缘的研究对象,获得了进入国际学术讨论的可能。

六. 结语

本文以澳大利亚汉学家马克林对中国西域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译介研究为中心,系统考察了其学术实践在历史、文化与话语三个层面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唐代回鹘史料、

维吾尔族与新疆问题以及白族文化的分析,本文指出:海外汉学中关于中国边疆的知识,并非直接来自历史现实,而是在译介过程中被不断筛选、重组与再现的结果。马克林的研究展示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译介路径:通过严谨的史料译注与解释性研究,使原本局限于中文学术语境的边疆知识进入英语世界的学术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译介不仅承担了信息传递的功能,更深度参与了中国边疆与少数民族形象的建构。

基于本文的研究,可以对未来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与译介提出若干展望。首先,在研究对象上,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关注更多在国际学术话语中相对“缺席”的民族与区域,以打破研究议题的结构性不平衡。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应更加自觉地引入译介学、话语分析与后殖民理论,以增强研究的理论深度。再次,在实践层面,中国学界与海外学者之间应加强对话与合作,共同参与少数民族知识的跨文化生产,推动更加多元、平衡的国际认知。

总而言之,马克林对中国西域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译介研究,既是个人学术路径的体现,也是海外汉学知识生产机制的缩影。通过对其

研究的系统考察, 本文试图揭示译介在塑造中国边疆国际形象中的关键作用, 并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参考文献

- [1] 李大龙. 中国边疆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古代中国为中心[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24.
- [2] Lefever, André. *Translating,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3] Barfield, Thomas J.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M].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9.
- [4] Cosmo, Nicola Di.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5] Perdue, Peter C.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6] Lewis, Mark Ed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in Early China*[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 [7] Lewis, Mark Edward. *China's Cosmopolitan Empire: The Tang Dynasty*[M].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8] Gladney, Dr. C.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M].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9] Schein, Louisa. *Minority Rules: The Miao and the Feminine in China's Cultural Politics*[M].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0] Millward, James A.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M]. London: Hust & Company, 2007.
- [11] Mackerras, Colin. *Peking Oper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2] [美] 爱德华·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 [13] 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 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1.
- [14] Mackerras, Colin. *The Uighur Empire: According to the T'ang Dynastic Histories*[M].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2.
- [15] Mackerras, Colin. *China's Minority Cultures: Identities and Integration Since 1912*[M]. Sydney: Longman Australia Pty Ltd, 1995.
- [16]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 [17] Mackerras, Colin. *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8] Baker, Mona.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 London: Routledge, 2006.
- [19] 汪受宽.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 (上下)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20.
- [20] Mackerras, Colin. Aspects of Bai Culture: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 Yunnan Nationality[J]. *Modern China*, 1988, 14(1): 51-84.
- [21] Hobsbawm, Eric,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22] Frank, Andre Gunder.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主语、语态与时态 使用特征的对比研究

袁雅菡, 兰 梅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

摘 要: 在学术成果的国际化传播与行业认可度构建中, 英文摘要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对于地质领域的学术交流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为探究中外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的语言特征差异, 本文建立小型语料库, 选取中外地质领域各5种权威期刊, 从各期刊2025年第1期中随机抽取20篇学术论文摘要。从作者主体性建构、文章客观性及时态的逻辑顺序三个维度出发, 对比分析第一人称代词“we”、被动语态及动词时态的使用特征。研究发现: 国外期刊使用“we”频率高于国内期刊; 国内期刊使用被动语态频率(33.65%)约为国外期刊(16.68%)两倍; 时态使用总体趋势一致, 但在研究目的、内容及发现等关键语步上存在差异: 国外多用一般现在时, 国内多用一般过去时。基于此, 建议国内期刊撰写英文摘要时, 可根据具体地质探测内容和研究方法描述, 适当增加主动语态和“we”的使用; 在表述研究目的与结论等语步逐步使用一般现在时, 契合自然科学的自然规律表达原则, 有效提升学术成果的可持续国际传播力。

关键词: 中外地质期刊; 英文摘要; 人称代词“we”; 语态; 时态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Use of Subject, Voice and Tense in English Abstracts of Geology Journals

YUAN Yahan, LAN M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Sichuan, China)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s stress the import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disciplinary recognition, which holds irreplaceable significance for academic exchange in the field of geology.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linguistic

作者简介: 袁雅菡, 2003—, 女, 汉族, 四川达州人, 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 英语口语译、国防科技翻译; 兰梅, 1983—, 女, 汉族, 四川内江人, 特聘副教授, 哲学博士, 研究方向: 语言哲学, 英语口语译。

基金项目: 西南科技大学校级博士基金“约翰·塞尔生物自然主义的社会实在建构论的研究”(项目编号: 23xs7112); 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跨越太平洋的双子星——以西南科技大学钙华与阿根廷高校钙华研究关键词分析为例”(项目编号: 25ycx1151)。

features of English abstracts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geology journal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small-scale corpus by selecting 5 journals from each of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fields, with 20 academic paper abstracts randomly sampled from the first issue of each journal in 2025. The study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se of the first-person pronoun “we”, passive voice, and verb tense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author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textual objectivity and tense usag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international journals exhibit a higher frequency of first-person pronoun “we” than domestic journals, while the frequency of passive voice in domestic journals (33.65%) is approximately twice that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16.68%); the overall tense usage is consistent, but differences exist in key rhetorical moves such as research purpose, content, and findings: international journals predominantly employ the simple present tense, whereas domestic journals prefer the simple past tense.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domestic journals appropriately increase the use of active voice and the first-person pronoun “we” in describing specific geological survey content and research methods; additionally, employing the simple present tense in purpose statements and conclusions aligns with principles of expressing natural laws in the sciences to sustainably advance academic communication in written forms internationally.

Keywords: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geology journals; English abstract; Personal pronoun “we”; Voice; Tense

一、引言

英文摘要是学术论文国际传播的关键媒介，其撰写质量影响研究成果的学术影响力。地质学作为一门研究地球演化、资源分布与生态环境的基础学科，研究成果关乎能源开发等国家战略需求。随着学术成果的国际化传播，越来越多的国内地质学研究成果需要借助英文摘要登上国际学术舞台，以展示我国在该领域的科研实力与成果。然而，国内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的撰写特点与国际主流期刊相比仍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地质学研究成果的有效传播。

因此，探究国内外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的语言特征差异，对于提升国内期刊英文摘要质量、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具有现实意义。

国内外现有研究从多个维度揭示了学术论文摘要的语言特征及其学科差异，但聚焦地质学领域、系统对比中外权威期刊学术论文英文摘要特征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探究。国内现有研究表明，英文研究论文摘要的语言特征呈现显著的学科差异，集中体现于多个功能维度，反映不同学科论文摘要的话语焦点、论述策略与交际意图^[1]。在作者身份构建方面，学者通过自建语料库

考察了1976—2023年作者自我呈现的历时性变化,发现作者通过显隐性词汇语法资源构建了研究者、写作者、推销者和争论者四种身份^[2];另有研究表明,人称代词we在构建研究者学术身份、加强与读者互动、突出创新价值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人际意义^[3]。在语态使用方面,有研究对比中外科技期刊发现,国内期刊总体上偏好被动语态,国外期刊则倾向于主动语态,国内期刊存在过度使用被动语态问题,未跟上国际文体变化新趋势^[4]。在时态与语篇结构方面,对国际岩矿类期刊的体裁分析表明,摘要具备比较完整的“四语步”结构,岩矿科研的学科特点决定摘要写作范式^[5];针对工程地质类期刊的研究则发现,摘要基本遵循IMRC逻辑顺序,引言以一般现在时和主动语态为主,方法以一般过去时加被动语态为主,结论以一般现在时和主动语态为主^[6]。从外壳名词角度的研究则发现,中国作者在外壳名词的使用频率及立场表达上与国外作者存在差距^[7]。国外学者围绕地质学及相关领域的语言特征与语料库构建开展了多维度研究。有学者聚焦石油科学论文标题的语言特征,发现其平均长度为15词,98%为名词性结构,地理

名称约占标题长度的30%^[8]。基于元话语理论,有研究对比发现语言学摘要中模糊限制语和态度标记语使用频率显著高于计算机工程摘要^[9]。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为人称代词、语态、时态等维度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专门聚焦地质学领域、系统对比中外权威期刊在上述维度上使用特征的研究尚不多见。

关于科技期刊英文摘要中被动语态、第一人称代词以及时态使用问题,国内外学者已在多个学科领域开展了对比研究。有学者对岩土类期刊英文摘要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国内期刊英文摘要中存在被动语态的过度使用现象,且第一人称代词鲜见使用,而国外期刊则偏爱主动语态,且大量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复数主格“we”^[10]。针对通信类英文摘要的研究也表明,中国作者撰写的文摘中存在着被动语态的过度使用现象,且主语为第一人称代词的主动句使用不足^[11]。在交通领域,中外期刊英文摘要的对比分析同样发现,国内期刊英文摘要句式单一刻板,建议积极使用主动语态^[12]。从历时视角来看,有学者对应用语言学领域1990年至2019年间发表的2707篇摘要进行追踪分析,考察被动语态及其与第一人称代词引导的

主动语态的关系,为印证学术写作中被动语态使用呈下降趋势提供了历时证据^[13]。对《科学》(Science)杂志近五年Research Articles栏目摘要的分析也发现,该刊摘要以主动语态为主,且第一人称代词“we”被广泛使用^[14]。在航空航天领域,国内外期刊英文摘要的对比分析显示,国内外期刊摘要均存在过度使用一般现在时的状况,且大部分作者倾向于使用被动语态来表述研究内容,但也有极少部分作者已开始尝试以主动语态和第一人称的写作方式撰写英文摘要^[15]。另有学者从语体、语篇角度探讨摘要中人称及语态的编辑处理原则,认为中英文摘要写作应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既要注意英语与汉语的差异性,又要注意语言表达的可接受性、得体性和准确性^[16]。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在多个学科领域证实了国内外期刊英文摘要在人称代词、语态和时态等语言特征上存在差异,国内期刊普遍存在被动语态过度使用、第一人称代词使用不足等问题。然而,专门聚焦于地质学领域、系统对比国内外权威期刊在上述维度上使用特征的研究有待深入。

基于此,本研究自建小型语料库,选取中外地质学权威期刊各5种,

从每种期刊2025年第1期中随机抽取20篇论文摘要,对比分析第一人称代词“we”、被动语态及动词时态的使用特征,以期为我国地质学科研究成果的国际化传播及学术英语写作教学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目标与研究步骤

本研究聚焦于国内和国外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剖析其语言特点,具体涵盖人称代词“we”、被动语态以及时态的使用情况。同时,进一步探究国内和国外地质学期刊在人称代词“we”、被动语态和时态使用方面存在的差异,为地质学领域的学术写作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参考与指导,促进国内外地质学学术交流中语言表达的规范性与有效性。

本研究分为两个主要阶段:语料库收集与数据分析。第一阶段,随机抽取国内外地质学期刊的论文英文摘要,完成语料的采集与整理;第二阶段,对采集的文本进行句子数量统计与词性赋码标注,将处理后的语料导入检索软件,为后续的语言特征分析奠定数据基础。

(二) 语料收集

本研究参考《2024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自然科学卷》选取国

内地质学期刊。该目录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广泛认可度，所收录的地质领域期刊能够代表国内地质学研究的较高水平与主流方向，为所选取期刊的代表性与典型性提供了可靠依据，从而保障了研究基础的科学性。从上述目录中抽取地质领域的五本期刊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分别为《中国地质》《地球科学》《地质学报》《沉积学报》《岩石学报》（表1）。在选取过程中，考虑到期刊的学科覆盖范围、影响力以及发表论文的质量等因素，以保证样本的全面性和科学性。每本期刊均抽取其2025年第1期的研究型论文20篇作为基本语料。研究型论文通常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性，其英文摘要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地质学研究的成果和特点。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发现个别期刊2025年第1期的研究型论文数量不足20篇。在初步筛选基础上，针对部分期刊语料数量不足的问题，从同期刊的第2期中增补相应数量的研究论文，以确保每本期刊的样本量均衡。最终累计获得100篇国内地质领域代表性期刊的英文摘要，并据此构建了国内地质领域英文摘要语料库（以下简称CC）。

表1国内地质期刊基本信息表

序号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1	中国地质	5.241
2	地球科学	4.582
3	地质学报	3.483
4	沉积学报	3.457
5	岩石学报	3.348

注：国内期刊（序号 1-5）的影响因子来源于 2024 年中国知网。

利用学术检索平台Web of Science（WOS）检索国外地质领域核心期刊。WOS拥有庞大的学术资源数据库，涵盖了全球范围内众多高质量的学术期刊，能够为研究提供全面的期刊信息。在选取国外地质领域核心期刊时，遵循随机抽取的原则，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和客观性。从随机抽取的五本国外地质领域核心期刊中，同样抽取各期刊2025年第1期的研究型论文20篇作为基本语料，五本期刊分别为*Nature Geoscience*、*Earth-Science Reviews*、*Engineering Geology*、*Geology*、*Tectonophysics*（表2）。与国内语料库构建过程类似，若某本期刊2025年第1期的研究型论文数量不足20篇，则从后续期数中递补，以保证每本期刊的语料数量达到要求。最终构建国外地质领域英文摘要语料库（FC），包含100篇国外地质领域期刊论文的英文摘要。

通过上述方法,本研究共获得国内国外各100篇、共计200篇期刊论文英文摘要,构建国内外两个语料库。两个语料库在构建过程中采用统一取样规则,每种期刊20篇,不足则从后续期数递补,在期刊数量、每本期刊论文篇数保持一致,保证了对比分析的可靠性。在后续研究中,将运用计量统计和案例分析方法对两个语料库进行详细分析,以揭示国内外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语言特点的异同,为地质学领域的学术写作和国际交流提供参考。

表2 国外地质期刊基本信息表

序号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1	Nature Geoscience	16.1
2	Earth-Science Reviews	10
3	Engineering Geology	8.4
4	Geology	4.6
5	Tectonophysics	2.6

注:国外期刊(序号6-10)影响因子来源于WOS。

(三) 数据分析

基于自建国内外语料库,研究第二阶段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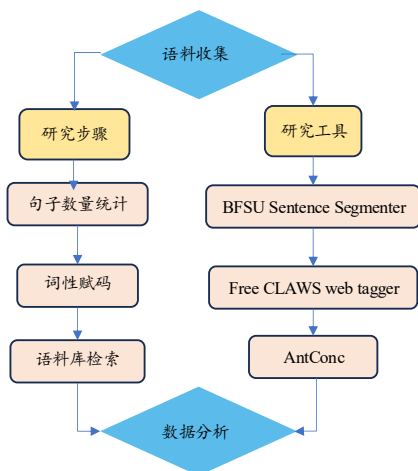


图1数据处理与分析流程图

第一步,利用北京外国语大学研制的文本处理工具BFSU Sentence Segmenter对语料句子数量进行统计;第二步,使用Free CLAWS web tagger对语料文本进行词性赋码,方便下一步用于语料库检索;第三步,借助语料库检索软件AntConc,检索人称代词“we”,用CLAWS赋码表达式对赋码语料的时态、语态进行检索、筛选、统计;第四步,分析所得数据,进而了解国内外地质期刊论文英文中摘要人称代词“we”、被动语态和时态的使用情况,以及两者间的使用差异。

三、结果与分析

为揭示国内外地质领域期刊英文摘要的语言特征,为后续人称代词、语态及时态的分析提供数据基

础，研究首先对语料库的句子数量与词汇使用情况进行统计与对比。

语料库基本信息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国内外语料库语句数量分别为1257和1325，表明国内与国外期刊英文摘要在语句数量上基本相当，均控制在较为精炼的篇幅范围内，符合学术英文摘要简洁凝练的写作要求。语料库形符指文中所有出现的词总数量，类符指的是文中的词排除重复出现的情况，只算做一次^[17]。形符数分别为33330和34105，类符数分别为8109和7992。类符/形符比是不同的词语与全文词汇总量的比值，可以用来测量特定语料库的用词范围和多样性^[18]。类符/形符比值与词汇使用情况的丰富和多样成正比，即比值越大说明文章用词越丰富，比值越小说明词汇范围小，变化少。两者的类符/形符比分别为0.2433和0.2343，国内期刊英文摘要的词汇丰富度略高于国外期刊，但整体差异不大。这表明，国内外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在词汇使用上均倾向于采用相对集中的学术词汇进行表达，与学术英文摘要注重信息传递效率、避免过多词汇冗余的语言特点相符。总体而言，国内期刊英文摘要在语句数量和词汇使用丰富度上已与国际期刊基本接轨，具

备良好的语言基础。

表3 国内外地质期刊英文摘要
语料库基本信息表

语料库	语句 数量	类符 数	形符 数	类符/ 形符
国内英 文摘要 语料库 (CC)	1257	8109	33330	0.2433
国外英 文摘要 语料库 (FC)	1325	7992	34105	0.2343

(一) 人称代词“we”的使用情况

在完成语料库基本数据统计后，本研究进一步从人称代词“we”、被动语态和时态三个维度对国内外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的语言特征进行深入分析。

国内外地质期刊英文摘要中第一人称代词“we”的使用存在显著差异。表4数据显示，国内英文摘要语料库(CC)中包含第一人称代词“we”句子共计53句，国外英文摘要语料库(FC)中包含“we”的句子共计132句，占各自语料库比例分别为4.22%和9.66%。国内期刊摘要中使用“we”的频率明显低于国外期刊，这一差异反映了中外学者在作者身份建构上的不同取向。在学术语篇中，第一人称代词“we”属于自我提及语，其功能不仅在于表

明作者和研究团队的贡献, 还在于与读者建立互动关系, 争取学术认可^[19]。同时, 在学术写作中, 作者在特定语用环境下利用自我指称构建学术立场是作者与读者进行有效互动、获得读者与学术社区认可的重要策略^[20]。从具体使用情况来看, 国外英文摘要语料库(FC)中以“we”作主语的句子均为主动句, 这体现了国外学者强调研究是团队多人参与的共同结果, 同时展现了与读者互动以及对研究结论的信心^[21]。相比之下, 国内英文摘要语料库(CC)中以“we”作主语的情况相对较少,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学术弱化个人价值的思维方式。

表4 国内外语料库人称代词
“we”的使用情况

语料库	语句 数量	包含we的 语句数	占比
国内英文 摘要语料 库(CC)	1257	53	4.22%
国外英文 摘要语料 库(FC)	1325	132	9.96%

上述差异表明, 国内期刊英文摘要在作者主体性表达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为更好地适应国际学术写作规范, 国内学者在撰写英文摘要时, 可适当借鉴国际期刊的写作惯

例, 在研究方法、研究过程及结果等语步中适度使用第一人称代词“we”, 以增强作者主体性表达, 提升摘要的学术说服力。

(二) 被动语态

国内外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被动语态使用情况如图表5所示, 表中各期刊按照被动句与选取语料句子总量比值由大到小进行排序, 最后两行分别为作者建立的国内外语料库中被动语态使用情况。根据表中数据可得: (1) 排名前五期刊被动语态使用量均超过各自期刊语料的25%, 其中排名第一的期刊《沉积学报》被动语态占比为49.32%, 接近该期刊语料一半。另外排名前四期刊均为国内期刊, *Earth-Science*是唯一一本被动语态使用量超过25%国外期刊。(2) 唯一一本被动语态占比未超过25%的国内期刊是《地质学报》, 排名第7, 比值为21.86%, 但其比值远高于排名末尾的三本国外期刊, 三本期刊分别为*Nature Geoscience*, *Geology*和*Engineering Geology*, 比值分别为13.61%、12.33%、11.40%。(3) 国内期刊《沉积学报》被动语态使用占比(49.32%), 达到国外期刊*Engineering Geology*被动语态占比(11.40%)的4倍以上。(4) 国内、国外期刊英文摘要合并统计

被动句使用情况，国内被动共计423句被动句，总句数为1257，比值为33.65%；国外期刊共计221句被动句，总句数为1325，比值为16.68%。通过以上数据对比，可直观得出国内外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的被动语态使用情况有明显差异，绝大多数国内期刊英文摘要使用被动语态远远超过国外期刊。

表5 国内外各期刊/语料库被动语态使用情况统计

期刊/语料库	总句数	被动句	占比
沉积学报	296	146	49.32%
地球科学	186	72	38.71%
中国地质	238	72	30.25%
岩石学报	258	72	27.91%
Earth-Science	248	66	26.61%
Tectonophysics	205	51	24.88%
地质学报	279	61	21.86%
Nature Geoscience	147	20	13.61%
Geology	146	18	12.33%
Engineering Geology	579	66	11.40%
国内期刊	1257	423	33.65%
国外期刊	1325	221	16.68%

国内学者在学术论文英文摘要中频繁使用被动语态，这一特征与中文语言特点密切相关。中文科技论文中常见无主句，即省略主语的表达方式，此类句子在英译时，往

往将谓语动词处理为被动形式，以构成符合英文科技文体规范的被动句，从而体现科技文本的客观性特征。具体示例如下：

例1：

中：系统地分析了温度作用对砂岩的力学性质、破坏模式、声发射活动、应变能演化过程及脆性状态的影响规律，发现存在明显的温度阈值使砂岩的各类行为在阈值前后产生较为明显的转变。（《地球科学》）

英：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failure mode, acoustic emission activity, strain energy evolution process and brittle state of sandstone i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分析：以《地球科学》期刊中一篇论文的中英文摘要为例，中文原文为单句，省略了主语，属典型的中文无主句表达。在英文摘要中，作者将“分析了”处理为被动结构“i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将“发现”处理为“It is found that...”，从而将原中文中隐含的行为主体进一步隐去。这一处理方式正是国内期刊英文摘要中被动语态频繁出现的典型体现，中文无主句的表达习惯在英译时往往转化为被动结构，使得被动语态在国内期刊摘要中占据较高比例。

例2:

中: ……; 然后采用机器学习方法建立判别模型, 最终获得了基于元素特征的玄武岩地幔端元类型逻辑回归模型。
(《岩石学报》)

英: ……; then the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is used** to establish the discriminant model, and finally the endmember type logic regression model of the basalt mantle based on element characteristics **is obtained**.

分析: 摘要原文省略主语, “采用……建立……获得……”连动结构属典型的中文无主句表达。英译时, “采用”与“获得”的处理方式与例1相同, 均译为被动语态。由此可见, 国内期刊英文摘要中被动语态的高频使用, 与中文无主句在英译时被动化处理的翻译策略密切相关。

上述国内英文摘要例子中, 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均处理为被动语态。与国内期刊的处理方式不同, 国外期刊英文摘要则更倾向于使用第一人称和主动语态, 例如:

例3: **Using** multichannel seismic reflection data, **we found that** the incoming plate in both regions exhibits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along the segment, suggesting that its properties do not account for the varying megathrust behavior and forearc deformation. (*Geology*)

例4: **We refined** the automatic picks, based on crosscorrelation and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and **we relocated** the hypocenters

with the double-difference technique in 3D velocity models optimized for the area. (*Tectonophysics*)

分析: 例3中, 作者使用“Using..., we found...”的主动结构, 将研究方法和研究发现一并呈现, 第一人称“we”的介入使研究过程清晰可循。例4同样采用主动语态, “we refined... and we relocated...”连续两个主动句, 明确表达了作者在研究中所做的具体工作。与国内期刊摘要的被动化处理形成鲜明对比, 国外期刊更倾向于借助第一人称和主动语态, 凸显作者在研究中的参与和贡献。

综上, 国内外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在被动语态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国内期刊被动语态占比(33.65%)约为国外期刊(16.68%)的两倍。这一差异与中文无主句的表达习惯密切相关, 中文原文省略主语的句式在英译时往往被动化处理, 而国外期刊则更倾向于使用第一人称和主动语态。建议国内学者在撰写英文摘要时, 根据语步功能合理选择语态, 适当引入主动语态, 以更好地与国际学术写作规范接轨。

(三) 时态

本文从语料库中选取一般过去时、一般现在时和完成时三种时态进行统计讨论。为实现语料统计的

统一性，更直观地呈现国内外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的时态使用情况，本研究仅统计主句第一个谓语动词的时态，由that、which、while等引导的从句以及由and、but等连接的复合句时态不列入统计范围。由于将来时和进行时在语料中出现频率较低，故不纳入本次分析。

国内外语料库三种时态使用情况如表6所示，具体发现如下：（1）国内外语料库在时态使用上呈现相似的整体趋势：一般现在时占比最高，一般过去时次之，其次是完成时。

（2）国内语料库中一般现在时占比为54.89%，超过半数语句采用该时态；而国外语料库中一般现在时占比为43.55%，低于50%，国内期刊英文摘要使用一般现在时的倾向高于国外期刊。（3）国内期刊英文摘要中一般过去时占比为20.45%，约为国外期刊（10.72%）的两倍。（4）完成时在国内外期刊摘要中均有使用，国内期刊占比为4.77%，国外期刊占比为5.21%，二者占比数值较为接近。

表6国内外语料库时态使用情况

语料库	句子总数	一般现在时	一般过去时	完成时
CC	1257	690 (54.89%)	257 (20.45%)	60 (4.77%)
FC	1325	577 (43.55%)	14 (10.72%)	69 (5.21%)

上述统计数据显示，国内外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在时态使用上既存在共性，也呈现出明显差异。为更直观地展示这些异同，以下结合具体实例，分别对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和完成时三种时态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

1. 一般现在时

在学术摘要中，一般现在时主要用于陈述研究背景、普遍事实、研究意义以及研究结论。由于这些语步需要体现内容的现时性、客观性和普遍性，国内外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在这些语步中均较多使用一般现在时。

例5: Investigation of source-to-sink relationships using the detrital record is frequently reliant on zircon and thus biased toward high-temperature magmatic processes. (Geology)

例6: This study presents an integrated field-based structural analysis, microscopic structural analysis, finite strain measurements, and geological chronology in the Qixingtai region. (《岩石学报》)

上述两个例句分别选自国外期刊Geology和国内期刊《岩石学报》。例5中，“is frequently reliant”陈述的是依赖锆石分析碎屑物研究的普遍现象，这一陈述不指向某一具体研究行为，而是对学科领域内公认事

实的概括。例6在介绍研究目的，“presents”介绍论文的分析框架与研究内容，同样使用一般现在时。上述两例表明，无论陈述研究背景还是介绍研究内容，国内外期刊均倾向于使用一般现在时，这反映了学术摘要写作中时态使用的共性规律。

2. 一般过去时

国内外地质期刊均使用一般过去时用于阐述实验方法、数据收集和处理等已经发生的研究过程。Hyland指出，过去时态的选择并非单纯的语法问题，而是作者在呈现研究发现时所作的修辞考量，旨在使研究主张更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更具可信度和说服力。这种时态选择能够引导读者理解研究活动与研究主张之间的关系，并把握论证的重点^[22]。以下结合国内外地质领域英文摘要中的具体实例来进一步说明：

例7：To test this hypothesis, we analyzed detrital zircon REE data from the Tibetan Gangdese Mountains. (《地质学报》)

例8：Here we incubated a very deep sediment core (20 m) to constrain the potential productivity of thawed Yedoma and underlying Quaternary sand and gravel deposits. (Nature Geoscience)

上述两个例句分别选自国内期刊《地质学报》和国外期刊*Nature Geoscience*，均使用一般过去时

(*analyzed*、*incubated*)描述研究行为。从Hyland的观点来看，这种时态选择不仅如实反映了研究操作的时间属性，更是将研究活动定位到过去，回顾研究过程，更加具体，从而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进一步观察发现，例7和例8都采用了主动语态和第一人称代词“we”。尽管国内期刊整体上第一人称“we”使用较少，但在具体的方法描述中，仍有部分国内期刊采用了主动语态与一般过去时结合的表达方式，与国际期刊的写作风格趋于一致。这表明国内期刊在时态使用上已开始借鉴国际规范，但在整体使用频率上仍有提升空间。

3. 完成时

在学术摘要中，完成时通常用于描述过去发生的研究行为对当前认知或研究结论所产生的持续影响。研究行为往往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完成时能够清晰地表明这一过程已经结束，同时强调其结果在当前依然具有重要价值。以下通过国内外地质领域英文摘要中的具体实例来进一步阐释：

例9：Based on studies involving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rc volcanic rocks... and high-pressure to ultrahigh-pressure (UHP) metamorphic rocks, we have gained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geochemical behaviors of slab fluids. (《岩石学报》)

例10: In this context,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data extracted from this set of tools (drilling, gravity and aeromagnetic data) **have allowed**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ubsurface geometry of this basin...of its tectonic framework. (Tectonophysics)

例9选自国内期刊《岩石学报》，使用现在完成时“have gained”来表明过去对弧火山岩地球化学特征、高压—超高压变质岩等的研究，构成当前研究的基础。例10选自国外期刊，同样使用现在完成时“have allowed”，强调研究通过多种技术所获取的数据分析，至今仍在为该盆地的地下几何形态及构造框架重建提供支撑。两个例子表明，完成时在摘要中的核心功能都是将过去的研究行为或数据积累与当前的认知成果联系起来。这种时态选择有助于构建研究的逻辑链条，使读者理解已有工作与当前结论之间的逻辑联系。

4. 时态使用差异

除已探讨的国内外地质期刊在时态使用上的诸多共性特征外，二者之间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介绍研究内容、阐述研究目的以及呈现研究发现等语步上。本文将

继续剖析在上述三个环节中，国内外地质期刊时态使用的具体差异。

以下两个例子分别选自国外期刊*Engineering Geology*和国内期刊《中国地质》。国外期刊采用一般现在时，“investigates”将研究表述为当前行为，强调研究本身的现时性和持续性。这种用现在时介绍研究内容在国外期刊中十分普遍，例如“This study addresses/ investigates/ contributes to/ introduces/ highlights...”，使读者认识到研究问题与结论的即时相关性。国内期刊则采用一般过去时，“investigated”将研究内容定位为过去行为，强调研究操作的完成性和时间边界。这种用过去时介绍研究内容在国内期刊中较为常见，反映了作者倾向于将研究过程与研究发现定位在过去。这一差异反映出国内外学者在描述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时，在时间选择上不同，国外期刊注重研究客观描述和与读者当下关联，国内期刊则更强调研究行为的完成性。

例11: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subgrade cross-section configurations on the thermal-hydraulic-mechanical stability of anti-frost heave subgrade structures... (*Engineering Geology*)

例12: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ontent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heavy metals in surface soils in Yuanzhou District... (《中国地质》)

前文已分别探讨了国内外地质期刊在描述研究内容和阐述研究目的的时的时态选择差异。除此之外，二者在呈现研究发现这一关键语步上的时态使用也存在不同。

例13: A total of 29 species in 15 genera **were identified** and 10 conodont zones **were recognized**, namely *Neospathodus dieneri* Zone... *Nicoraella germanica* Zone in ascending order. (地球科学)

例14: Key findings **reveal** that: (a) cross-section configuration strongly influences thermal state and water distribution within the subgrade. (*Engineering Geology*)

例13选自国内期刊《地球科学》，谓语采用一般过去时和被动语态“were identified”和“were recognized”，将研究发现定位到过去，强调结果的得出过程，突出操作的客观性。例14来源于国外期刊*Engineering Geology*，谓语采用一般现在时的主动语态“Key findings reveal that...”，“reveal”将研究发现直接呈现为当前结论，语言简洁有力，强调结论的现时性和普遍意义。由此可见，国内外地质期刊在研究发现语步上的时态使用存在区别，国内期刊倾向于将研究发现视为过去的动作或

结果，国外期刊则习惯将研究发现直接作为当前事实。这一差异会影响读者对研究结论时效性和确定性的感知，值得在写作与阅读中加以关注。

综上所述，国内外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在时态使用上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总体而言，国内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在时态使用上已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国际规范，但在整体频率和典型语步的时态选择上仍与国际主流存在差距。认清这些共性与差异，有助于国内研究者在撰写英文摘要时更有意识地选择时态，以契合国际地质期刊的写作惯例，提升学术交流的有效性。

四、结语

本研究通过自建语料库，选取国内外地质学权威期刊各5种，从每种期刊2025年第1期（不足部分从第2期递补）中随机抽取20篇研究型论文英文摘要，共获得200篇摘要，形成国内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语料库（CC）和国外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语料库（FC）两个子库。在数据处理阶段，首先利用BFSU Sentence Segmenter对语料进行句子数量统计，随后借助Free CLAWS web tagger对语料进行词性赋码，最后通过AntConc

语料库检索软件对第一人称代词“we”、被动语态及动词时态进行检索与统计,以数据形式呈现了国内外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的语言特征。

研究发现,国内语料库中第一人称代词“we”的使用频率(4.22%)显著低于国外语料库(9.66%)。人称代词“we”作为自我提及语,能够增进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展现团队合作,同时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国内期刊应顺应国际学术写作趋势,在未来的英文摘要中适当增加其使用。第二,国内语料库中被动语态占比(33.65%)约为国外语料库(16.68%)的两倍。这一差异与中文无主句的表达习惯密切相关,在英译时往往被动化处理。建议国内学者在撰写英文摘要时,根据语步功能合理选择语态,在研究方法等需要强调客观性的部分适度使用被动语态,在研究目的、结论等需要凸显作者贡献的部分尝试引入主动语态,并与第一人称代词“we”结合使用。第三,在时态使用方面,国内语料库中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使用频率高于国外,完成时使用频率低于国外。时态的选择反映了作者对研究行为与研究发现的不同定位,建议国内学者在摘要的研究目的和结论部分,适当从一般过

去时向一般现在时过渡,以凸显研究发现的普适性和理论贡献,更好地与国际学术写作规范接轨。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样本选取上,仅从国内外地质学权威期刊中分别随机抽取5种期刊,每种期刊选取20篇论文摘要构建语料库,样本数量相对有限,语料库规模较小。其次,在语料处理过程中,人工标注环节难以完全排除主观性因素的影响。最后,在数据分析环节,个人判断可能对结果产生一定影响。鉴于上述局限,本研究结果虽无法全面、精准地反映国内外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的语言特征全貌,但仍可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针对国内外地质学期刊英文摘要的语言特点提出相应建议,为地质学研究成果的语言表达实现国际接轨、促进学术交流提供参考。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容量,深入探讨摘要语步与时态使用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 闫鹏飞. 英文研究论文摘要特征学科差异的多维分析[J]. 外语学刊, 2025(02):43-53.
- [2] 杨林秀, 韩晋. 基于历时语料库的语言学学术论文摘要中的作者自我呈现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4,

- 32(02):7-12.
- [3] 曾祥宏, 邹建玲. 科技论文英文摘要的人际意义提升——以人称代词we为例[J]. 中国科技翻译, 2022, 35(03):49-52+55.
- [4] 邓联健, 张媛媛. 中文科技期刊英文摘要中被动语态的使用调查与分析[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3, 34(04):439-445.
- [5] 陶惟, 李培, 严瑾. 国际岩矿类权威期刊论文英文摘要的体裁分析[J]. 中国地质教育, 2022, 31(02):83-88.
- [6] 郭静芸. 基于语料分析的工程地质类科技论文英文摘要范式研究[J]. 编辑学报, 2018, 30(S1):34-38.
- [7] 胡新, 黄燕. 中外科技论文英文摘要中外壳名词人际功能的语步差异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1(03):56-63.
- [8] Filyasova Y A. A linguistic analysis of petroleum-related English research article titles[J]. *RUDN Journal of Language Studies, Semiotics and Semantics*, 2020, 11(1):120-134.
- [9] Boginskaya O. Metadiscourse patterns in academic prose by non-native English writers: A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J]. *Discourse and Interaction*, 2022, 15(2):5-27.
- [10] 彭芹, 张海峰. 中外岩土类期刊英文摘要的语态与第一人称代词分析[J]. 编辑学报, 2017, 29(6):538-540.
- [11] 赵娟. 中外通信类摘要中语态及第一人称代词使用的比较分析[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1, 22(4):634-636.
- [12] 李洋, 韩跃杰, 孙守增. 中外交通类科技期刊英文摘要对比分析[J]. 科技与出版, 2015(2):91-95.
- [13] Li Z. Is academic writing less passivized? Corpus-based evidence from research article abstract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1990–2019) [J]. *Scientometrics*, 2022, 127(10):5773-5792.
- [14] 张玫. 《科学》杂志摘要语态及第一人称代词使用的实证研究[J]. 上海翻译, 2009(3):32-35.
- [15] 张巧芸. 国内外航空航天类科技期刊英文摘要比较与分析[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4, 25(1):96-99.
- [16] 钱尔凡, 王先寅. 科技论文中英文摘要的人称与语态问题[J]. 编辑学报, 2010, 22(4):319-321.
- [17] Baker M.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 overview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5, 7(2):223-243.
- [18] Baker M.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J].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000, 12(2):241-266.
- [19] Hyland K. Self-citation and self-reference: Credibility and promotion in academic publication[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3, 54(3):251-259.
- [20] 刘应亮, 邓婷, 陈洋. 中国英语学习者学术语篇中的立场标记语和身份建构研究[J]. 外语学刊, 2023(05):58-65.
- [21] 李明喆, 都立澜, 刘艾娟. 中外医学期刊中药主题结构式英文摘要结果部分的语言特点研究[J]. 中医药导报, 2022, 28(01):200-204.
- [22] Jiang F, Hyland K. Changes in research abstracts: Past tense, third person, passive, and negatives[J]. *Written Communication*, 2023, 40(1):210-237.

汉语母语者西班牙语冠词习得的偏误分析 和迁移机制研究

周 怡, 李 杨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

摘 要: 本文基于对比分析假说、偏误分析理论与语言迁移理论, 系统考察汉语母语者在习得西班牙语冠词过程中的偏误特征与迁移机制。通过问卷调查、文献分析等混合研究方法, 对西班牙语专业的中国学生的书面语料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结果表明: 冠词省略是最主要的偏误类型, 其后依次为误选、冠词冗余、性一致偏误和数一致偏误。偏误根源主要来自母语负迁移以及目标语规则的过度泛化。研究验证了结构迁移、语义—语用迁移和一致性习得迁移的多源性, 并据此提出五项教学原则。本研究深化了对汉西类型距离较远语言间冠词习得困难结构的理解, 为面向汉语母语者的西班牙语冠词教学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键词: 二语习得; 偏误分析; 冠词

Análisis de errores y mecanismos de transferencia en la adquisición de los artículos españoles por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ZHOU Yi, LI Yang

(Facultad de Lenguas y Culturas Extranjeras, Universidad de Ciencia y Tecnología del Suroeste,
Mianyang 621010, Sichuan, China)

Resumen: Este trabajo, basado en la hipótesis del análisis contrastivo, la teoría del análisis de errores y la teoría de la transferencia lingüística, examina sistemáticamente las características de los errores y los mecanismos de transferencia en el proceso de adquisición de los artículos del español por parte de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Mediante una metodología mixta que incluye cuestionarios y análisis documental, se realiza un análisis cuantitativo y cualitativo de las producciones escritas de estudiantes chinos de español como especialidad. Los resultados muestran que la omisión del artículo es el tipo de error más frecuente, seguida por la selección incorrecta, la redundancia del artículo, los errores de concordancia de género y los errores de concordancia de número. El origen de los errores radica principalmente en la transferencia negativa de la lengua

作者简介: 周怡, 2004—, 女, 汉族, 四川绵竹人, 本科, 研究方向: 国际中文教育;
李杨, 1991—, 女, 汉族, 重庆人, 讲师,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对外西班牙语。

materna y la sobregeneralización de las reglas de la lengua meta. La investigación valida el carácter múltiple de la transferencia estructural, la transferencia semántico-pragmática y la transferencia en la adquisición de la concordancia, y a partir de ello propone cinco principios didácticos. Este estudio profundiza en la comprensión de la estructura de dificultades en la adquisición de los artículos entre lenguas tipológicamente distantes como el chino y el español, y proporciona una base empírica para la enseñanza de los artículos del español dirigida a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Palabras clave: adquisición de segundas lenguas; análisis de errores; artículos

1. INTRODUCCIÓN

Debido a las profundas diferencias tipológicas entre el chino y el español, la adquisición del sistema de artículos constituye una de las dificultades más notables para los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que aprenden español. El español posee un sistema de artículos definidos e indefinidos con flexión de género y número; el chino mandarín carece de esta categoría gramatical y recurre a mecanismos como el orden de palabras, el contexto pragmático y los clasificadores para expresar la determinación del sintagma nominal. Esta asimetría estructural convierte los artículos del español en un foco persistente de errores para los aprendientes, constituyendo un fenómeno de interlengua^[1] que merece un análisis sistemático desde la perspectiva de la transferencia lingüística.

La presente investigación tiene como objetivo explorar las características de los errores y los mecanismos de

transferencia en la adquisición de los artículos del español por parte de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Apoyándose en la Hipótesis del Análisis Contrastivo^[2], la teoría del Análisis de Errores^[3] y los modelos actuales de investigación sobre transferencia morfosintáctica, este trabajo se propone identificar los tipos de error más frecuentes, clasificarlos según su naturaleza y explicar sus causas profundas desde la interacción entre la influencia de la lengua materna y los procesos internos de desarrollo de la interlengua.

Para alcanzar dichos objetivos, se ha diseñado una metodología de investigación mixta. Por un lado, se realizó un análisis contrastivo de los sintagmas nominales del chino y del español con el fin de dilucidar las bases estructurales del efecto de transferencia; por otro lado, se recopilaron corpus escritos de aprendientes chinos de español de diferentes niveles de competencia para constituir una base de datos y llevar a cabo un análisis cuantitativo y cualitativo

de los errores. El análisis se centrará en fenómenos clave como la omisión del artículo, la sobregeneralización, la confusión entre artículo definido e indefinido y los errores de concordancia de género y número.

La relevancia de este estudio se manifiesta en dos planos: en el plano teórico, se pretende profundizar en la comprensión de los mecanismos de transferencia durante la adquisición de lenguas tipológicamente distantes; en el plano aplicado, se busca proporcionar una base empírica para el diseño de estrategias didácticas más eficaces en la enseñanza de los artículos del español a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Para situar adecuadamente el alcance de la investigación, es necesario precisar que este trabajo se centra exclusivamente en los artículos definidos e indefinidos en su función canónica de determinantes del nombre, excluyendo el artículo neutro “lo”, cuyo comportamiento sintáctico y semántico difiere sustancialmente y plantea dificultades cualitativamente diferentes para los aprendientes chinos.

El trabajo presenta un análisis contrastivo de las estructuras nominales de español y chino, expone los resultados del estudio empírico y su discusión. Además, se proponen implicaciones didácticas y recomendaciones estratégicas.

2. ANÁLISIS CONTRASTIVO DE LA ESTRUCTURA DEL SINTAGMA NOMINAL Y DEL SISTEMA DE ARTÍCULOS EN CHINO Y ESPAÑOL

Este capítulo tiene como objetivo realizar un análisis contrastivo sistemático de los sintagmas nominales en chino y español, centrándose en los mecanismos que ambas lenguas emplean para expresar la determinación/indeterminación. Dicho análisis constituye la base necesaria para comprender la naturaleza de los errores producidos por los aprendientes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ya que permite identificar con precisión los puntos de divergencia estructural susceptibles de generar transferencia negativa. El capítulo se divide en tres partes: en primer lugar, se describe la estructura del sintagma nominal chino, con especial atención a los clasificadores y a los mecanismos de expresión de la definitud; en segundo lugar, se analiza el sistema de artículos del español dentro del marco de la Hipótesis del Sintagma Determinante; por último, se realiza una comparación sistemática para predecir las dificultades de adquisición.

2.1. La estructura del sintagma nominal en chino

El chino, como lengua aislante,

carece de flexión morfológica y no dispone de un sistema gramatical obligatorio de artículos. La expresión de la definitud y la referencialidad se realiza fundamentalmente a través de mecanismos sintácticos, pragmáticos y léxicos. Entre estos mecanismos, los clasificadores nominales constituyen una de las características más destacadas del sintagma nominal chino. La estructura típica del sintagma nominal que contiene un numeral es: Numeral + Clasificador + Nombre. Por ejemplo:

- (1) 一本书 → un - CLAS - libro
- (2) 三只猫 → tres - CLAS - gatos

Los clasificadores categorizan los nombres según atributos semánticos como la forma, el tamaño o la función, e incluyen clasificadores individuales, de medida y colectivos. Cabe señalar que, en ausencia de un numeral, el sintagma nominal puede aparecer sin clasificador, como en “书” (libro), en cuyo caso carece de marcas explícitas de número y definitud, y su ambigüedad semántica debe resolverse mediante el contexto.

Por otra parte, el chino recurre a múltiples mecanismos para expresar la definitud o indefinitud sin disponer de un sistema gramaticalizado de artículos^[4]. La posición sintáctica es uno de los factores más relevantes: los sintagmas

nominales en posición preverbal tienden a interpretarse como definidos o genéricos, mientras que los que aparecen en posición posverbal suelen interpretarse como indefinidos. Compárense los siguientes ejemplos:

- (1) 客人来了 → El invitado llegó. (Preverbal → definido)
- (2) 来了客人 → Llegó un invitado. (Posverbal → indefinido)

Además, el orden de palabras y el tópico desempeñan un papel crucial: el chino es una lengua de tópico prominente; el tópico aparece al inicio de la oración y suele ser definido, con independencia de su función gramatical. Los demostrativos “这” (este/esta) y “那” (ese/esa/aquel/aquella) actúan como especificadores que marcan la definitud, pero su uso no es obligatorio. En muchos casos, la pragmática y el contexto permiten inferir la definitud a través del contexto compartido o la información presupuesta, sin ninguna marca morfosintáctica explícita. Finalmente, la partícula aspectual “了” puede, en determinadas estructuras, asociarse con la interpretación definida o indefinida del sintagma nominal. En conjunto, estos mecanismos muestran que el chino expresa la determinación mediante estrategias flexibles y contextuales, muy alejadas de la obligatoriedad gramatical del español.

2.2. La estructura del sintagma determinante en español

En contraste con el chino, el español posee un sistema gramatical de determinantes altamente desarrollado, que incluye artículos definidos, artículos indefinidos, demostrativos, posesivos, entre otros. Este apartado, basado en la Hipótesis del Sintagma Determinante propuesta por Stephen Abney, se centra exclusivamente en la descripción de dicho sintagma. Según esta hipótesis, la proyección funcional máxima dentro del dominio nominal es el Sintagma Determinante, y el nombre funciona como su complemento^[5].

El español cuenta con dos tipos de artículos: definidos e indefinidos, ambos con flexión de género y número, como se muestra en la Tabla 1. Además, existen las formas contractas “al” y “del”, lo que evidencia aún más el grado de integración de los artículos en la sintaxis del español.

Tabla 1. Sistema de artículos del español

	Definido	Indefinido
Masculino singular	el	un
Femenino singular	la	una
Masculino plural	los	unos
Femenino plural	las	unas

En cuanto a las funciones semánticas y discursivas, la oposición entre artículo definido e indefinido codifica distinciones fundamentales en múltiples

dimensiones, incluyendo la referencialidad, la identificabilidad y el estado de activación en el discurso^[6]. Por lo general, el artículo definido señala que el referente es identificable para el hablante y el oyente por ser conocido, único en el contexto o previamente mencionado, mientras que el artículo indefinido introduce referentes nuevos o inespecíficos. Asimismo, los artículos participan en diversas construcciones como las genéricas, las partitivas y la sustantivación de adjetivos.

Por último, la concordancia constituye un mecanismo estructural central en español. El artículo, como núcleo del sintagma determinante, mantiene concordancia de género y número con el nombre al que determina. Esta concordancia representa un mecanismo de redundancia morfológica que facilita el procesamiento sintáctico, pero, al mismo tiempo, supone una fuente significativa de dificultad para los aprendientes cuya lengua materna carece de este rasgo. La obligatoriedad de esta concordancia es uno de los aspectos que más contrasta con la estructura nominal del chino.

2.3. Análisis contrastivo y predicciones de transferencia

La comparación entre ambas lenguas revela profundas diferencias tipológicas^[7], lo que permite formular

predicciones sobre las dificultades que enfrentarán los aprendientes chinos en la adquisición del sistema de artículos

del español. En la Tabla 2 se resume la comparación de las estructuras del sintagma nominal en chino y español.

Tabla 2. Resumen del análisis contrastivo

Dimensión	Chino	Español
Presencia de artículos	No existe la categoría gramatical de artículo	Sistema de determinantes obligatorio
Expresión de la definitud	Sintaxis (posición preverbal/ posverbal), pragmática, léxico (demostrativos)	Morfosintaxis (artículo definido/indefinido)
Morfología flexiva	Carencia de flexión de género y número en el sintagma nominal	Flexión obligatoria de género y número en el sintagma nominal: determinantes y nombres
Clasificadores	Sistema desarrollado de clasificadores	Ausencia de clasificadores; uso de nombres de medida
Estructura del sintagma	[Numeral+Clasificador+Nombre] o simplemente [Nombre]	[Determinante+ (Adjetivo)+Nombre]

A partir de este análisis contrastivo, es posible predecir los errores más probables de los aprendientes chinos. En primer lugar, la omisión del artículo se perfila como el tipo de error más frecuente. Dado que el chino carece de artículos, los aprendientes tenderán a transferir directamente la estructura del sintagma nominal chino al español, omitiendo el artículo en contextos donde es obligatorio. En segundo lugar, se anticipa una dificultad notable con la oposición definido/indefinido. La distinción entre artículo definido e indefinido constituirá un obstáculo, ya que en chino la definitud se expresa mediante mecanismos diferentes y no siempre a través de una oposición

binaria. Se prevé la aparición de confusiones, especialmente en contextos donde ambas opciones son pragmáticamente posibles. En tercer lugar, en cuanto a los errores de concordancia, aunque el chino carece de marcas de género y número, este tipo de errores no serán necesariamente los más frecuentes, debido a que la concordancia conforma un sistema altamente redundante y consistente en el input. No obstante, se anticipan errores en nombres con género no transparente (p. ej., “el problema”, “la mano”) o en contextos de baja prominencia fonética de las marcas de plural. En cuarto lugar, se espera transferencia de los mecanismos chinos de definitud: los aprendientes recurrirán a

estrategias procedentes de su lengua materna, como el uso de demostrativos en lugar del artículo definido, o la influencia del orden de palabras en la interpretación de la definitud.

Es preciso señalar, sin embargo, que no todos los errores predichos se originan exclusivamente en la transferencia de la lengua materna. Factores intralingüísticos como la sobregeneralización de reglas, por ejemplo, extender el uso del artículo indefinido a contextos donde no corresponde, o la complejidad intrínseca del sistema del español también influirán en los patrones de error observados. Por tanto, cualquier explicación de los errores en la adquisición de los artículos debe integrar tanto la influencia interlingüística como los procesos internos de desarrollo de la interlengua.

3. Recopilación del corpus y análisis de resultados

3.1. Diseño de la investigación

El presente estudio tiene como objetivo examinar sistemáticamente los tipos de error y los mecanismos de transferencia en la adquisición de los artículos del español por parte de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Para ello, basándose en el marco del análisis de errores de Corder y Ellis, así como en la

teoría del efecto de la tarea en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la adquisición de artículos^[8], se diseñaron tres tareas escritas de producción diferentes, dirigidas a distintos contextos de uso del artículo. Estas tres tareas no son una simple repetición, sino que se centran respectivamente en diferentes niveles cognitivos y condiciones de procesamiento del uso del artículo, con el objetivo de complementarse mutuamente y captar de manera integral los errores sistemáticos de los aprendientes.

La primera tarea es un ejercicio de huecos en un texto cohesionado. En esta tarea, se presentan 22 huecos dentro de un texto breve y coherente, y los participantes deben elegir el artículo adecuado (definido, indefinido o artículo cero) según el contexto. Esta tarea se caracteriza por proporcionar información contextual suficiente y por imponer restricciones gramaticales y semánticas claras. Este tipo de tarea permite evaluar la capacidad del aprendiente para seleccionar el artículo apropiado en un discurso coherente, especialmente en lo que respecta a reglas discursivas como “artículo indefinido para la primera mención y definido para la mención subsiguiente”. Al eliminar la posible interferencia de la traducción desde la lengua materna, la tarea de

huecos mide preferentemente el grado de interiorización de las reglas de los artículos del español y la capacidad de tomar decisiones rápidas en contextos locales.

La segunda tarea es una tarea de traducción en contexto y construcción de oraciones. Consta de 5 oraciones que deben traducirse del chino al español. A diferencia de la tarea de huecos, la tarea de traducción requiere que los aprendientes partan de su lengua materna y activen activamente las reglas de los artículos de la lengua meta, por lo que resulta especialmente adecuada para revelar los efectos de la transferencia de la lengua materna. Además, al exigir la producción de oraciones completas, esta tarea refleja el uso real de la concordancia de género y número entre el artículo y el nombre, complementando así las posibles respuestas de azar en la tarea de huecos.

La tercera tarea es una tarea de corrección gramatical. En esta tarea se presentan 10 oraciones que contienen errores relacionados con el artículo, y los participantes deben identificar y corregir dichos errores. La tarea de corrección mide la conciencia metalingüística y el conocimiento explícito de los aprendientes, es decir, su capacidad para reflexionar y juzgar

conscientemente si el uso del artículo es correcto o no. Esto contrasta con el procesamiento implícito y automatizado que requieren las tareas de huecos y traducción. Si un aprendiente usa correctamente los artículos en las tareas de producción, pero no logra identificar errores en la tarea de corrección, ello sugiere que su conocimiento de los artículos puede encontrarse todavía en una fase de imitación o de memoria superficial. Por el contrario, si puede corregir errores, pero sigue teniendo problemas en la producción, es probable que ello refleje limitaciones en la carga de procesamiento o en la distribución de la atención. Mediante la comparación de los resultados obtenidos en las tres tareas, este estudio puede diferenciar de manera más fina entre “posesión del conocimiento” y “capacidad para aplicarlo en línea”.

En resumen, las tres tareas se centran respectivamente en: la selección del artículo dependiente del contexto discursivo, la producción impulsada por la transferencia de la lengua materna, y el juicio metalingüístico y el conocimiento explícito. En conjunto, cubren las dimensiones fundamentales del uso del artículo, permitiendo así identificar desde múltiples ángulos el origen de los errores. Las tres tareas

suman un total de 37 puntos de control relacionados con el artículo (22 huecos + 5 traducciones + 10 correcciones), lo que garantiza una riqueza de datos suficiente y una fiabilidad analítica adecuada.

Los sujetos del estudio fueron 50 estudiantes de la carrera de Filología Hispánica, con edades comprendidas entre los 19 y los 25 años, procedentes de 12 universidades de China y del extranjero, principalmente de la Universidad de Ciencia y Tecnología del Suroeste. Todos los participantes eran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y, en su mayoría, no tenían experiencias de estancias prolongadas en países hispanohablantes.

La selección de esta muestra de 50 estudiantes responde a criterios de pertinencia teórica y viabilidad empírica. En primer lugar, el nivel de competencia de los participantes —todos ellos estudiantes de español con al menos un año pleno de formación universitaria, situados mayoritariamente en un nivel intermedio o intermedioalto— es el más adecuado para el análisis de errores, pues permite observar errores sistemáticos y predecibles. En segundo lugar, la homogeneidad lingüística de la muestra, todos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mandarín sin estancias prolongadas en

países hispanohablantes, aísla razonablemente la variable de la lengua materna, atribuyendo con mayor seguridad los errores a la transferencia negativa del chino o a procesos intralingüísticos. Por otra parte, el tamaño muestral de 50 sujetos supera el umbral habitual en los estudios de análisis de errores de tipo cualitativo y cuantitativo moderado (generalmente entre 20 y 50 participantes)^[9]. Los 274 errores obtenidos permiten un análisis de frecuencias significativo y la identificación de patrones cualitativos recurrentes. Además, la procedencia diversa pero controlada confiere cierta generalidad a los resultados dentro del contexto universitario chino sin incurrir en una heterogeneidad excesiva.

El marco de clasificación de errores se basa en los modelos de Análisis de Errores de Corder y Ellis y, considerando las características de los artículos del español, clasifica los errores en cinco categorías: omisión del artículo, adición redundante del artículo, selección errónea, error de concordancia de género y error de concordancia de número. El análisis de los mecanismos de transferencia se fundamenta en la teoría de la transferencia lingüística de Odlin y realiza una atribución causal desde dos dimensiones —la transferencia

negativa de la lengua materna y la sobregeneralización interna de la lengua meta—, desarrollándose en tres planos: transferencia estructural, transferencia semántico-pragmática y transferencia en la adquisición de la concordancia.

3.2. Análisis de errores

Tras el recuento, se identificaron 274 errores en los 50 cuestionarios. La frecuencia y proporción de cada tipo de error se muestran en la Tabla 3.

Tabla 3. Distribución general de los tipos de error

Tipos de errores	Frecuencia	Porcentaje	Ejemplos de errores típicos
Omisión del artículo	115	41.97%	Voy a biblioteca.
Adición redundante del artículo	51	18.6%	Quiere ser un piloto.
Selección errónea	63	23.0%	vimos el cartel. (mención inicial)
Error de concordancia de género	30	10.9%	el taza
Error de concordancia de número	15	5.5%	las piscina
En total	274	100%	

Los datos muestran que la omisión del artículo es el tipo de error predominante, con más del 40% de los casos. Esto indica que la dificultad más frecuente en la producción escrita de los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no es “usar mal el artículo”, sino “olvidar usar el artículo”. La selección errónea y la adición redundante del artículo ocupan el segundo y tercer lugar respectivamente, sumando en conjunto más del 41%, lo que evidencia que, si bien los estudiantes son conscientes de la necesidad del artículo, tienen dificultades para discernir en contextos específicos si usar el definido o el indefinido, o añaden artículos donde no corresponde. Los errores de concordancia de género y número suman alrededor del 16%,

reflejando dificultades de memorización de las marcas de género y número del nombre; los errores de concordancia de género duplican aproximadamente a los de número, lo que indica que el género gramatical es una categoría más difícil de adquirir que el número.

En cuanto a las distintas tareas, la omisión del artículo fue más prominente en la tarea de traducción (52% de los errores de dicha tarea). En el ejercicio de huecos, la proporción de selección errónea y errores de concordancia de género aumentó notablemente (más del 40% en conjunto). En la tarea de corrección, la adición redundante del artículo presentó el porcentaje más alto (30%). Esta distribución indica que el tipo de tarea

influye significativamente en el tipo de error: la producción más libre tiende a provocar omisiones, las tareas dependientes del contexto favorecen la aparición de errores de selección y concordancia de género, y las tareas de juicio metalingüístico revelan la tendencia al uso excesivo del artículo.

Mediante el análisis de numerosos errores recurrentes, esta investigación ha identificado los siguientes patrones de error, que reflejan características sistemáticas en la adquisición del artículo por parte de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A continuación, se describen según su naturaleza.

a) Omisión del artículo

La omisión del artículo consiste en la ausencia de cualquier artículo en un contexto donde es obligatorio. Constituye el tipo de error más importante de este estudio. En la tarea de traducción, este error se manifiesta como una omisión sistemática del artículo definido ante nombres en contextos genéricos. Para la oración “猫是独立的动物” (Los gatos son animales independientes.), numerosos estudiantes la tradujeron como “Gatos son animales independientes”, omitiendo el artículo definido plural “los”, obligatorio en el contexto genérico; otros la tradujeron como “Gato es animal independiente”,

omitiendo tanto el artículo definido como el indefinido. Esto demuestra que los estudiantes aún no dominan la regla de obligatoriedad gramatical del artículo en los sintagmas nominales genéricos del español.

La tarea de corrección confirmó la persistencia de la omisión. La oración original incorrecta era “Ella es la arquitecta que diseñó un nuevo parque en ciudad”, donde “en ciudad” carece de artículo. Sin embargo, más del 40% de los estudiantes no identificó este error y mantuvo “en ciudad” en su corrección o lo modificó por otra forma incorrecta (como “en una ciudad”). En otra oración, “Voy a biblioteca a devolver unos libros prestados”, faltaba el artículo en “a biblioteca”. El 38% de los participantes no lo corrigió. Estos ejemplos ilustran que la omisión del artículo no solo aparece en tareas de producción libre, sino que también se refleja en la capacidad de juicio y corrección gramatical de los estudiantes, mostrando una alta resistencia.

b) Adición redundante del artículo

La adición redundante del artículo se refiere al uso incorrecto de un artículo en una posición donde no debe aparecer. Este tipo de error mostró el porcentaje más alto en la tarea de corrección (30%) y también presentó

manifestaciones típicas en la traducción y el ejercicio de huecos.

En primer lugar, adición redundante de artículo indefinido ante nombres abstractos. La oración original del ejercicio de corrección era “Tener un paciencia es fundamental para aprender un idioma”, donde “un paciencia” es erróneo porque “paciencia” es un nombre abstracto e incontable que no debe llevar artículo indefinido; la forma correcta es “Tener paciencia”. No obstante, más de la mitad de los estudiantes no detectó el error e incluso lo corrigió como “una paciencia”. En la tarea de traducción, ante la frase “生活需要耐心和希望” (La vida necesita paciencia y esperanza.), algunos estudiantes colocaron un artículo indefinido “una” ante los nombres abstractos “paciencia y esperanza”, sobregeneralizando la función “individualizadora” del artículo indefinido a nombres abstractos no contables y generando un uso redundante.

En segundo lugar, uso redundante del artículo indefinido ante nombres de profesión. Después del verbo “ser”, los nombres de profesión en función de atributo generalmente no llevan artículo; el uso del artículo indefinido, aunque aceptable en algunos contextos, resulta redundante cuando no hay modificadores o no se enfatiza el individuo.

En la oración del ejercicio de corrección “Mi hermano mayor quiere ser un piloto de avión”, el artículo indefinido “un” es redundante, pero cerca del 50% de los estudiantes no identificó el error.

Los ejemplos anteriores muestran que los estudiantes carecen de un juicio claro sobre las reglas del artículo en nombres abstractos, la presencia o ausencia del artículo en expresiones fijas y la selección del artículo ante nombres de profesión.

c) Selección errónea

La selección errónea implica que el estudiante elige incorrectamente entre el artículo definido y el indefinido. Este patrón destacó especialmente en el ejercicio de huecos, con la manifestación típica del uso del artículo definido en la primera mención de un nombre. Por ejemplo, en el texto del ejercicio se presentaba “vimos ____ cartel que anunciaba una exposición”; al tratarse de una primera mención, la respuesta correcta era el artículo indefinido “un”, pero muchos estudiantes escribieron el definido. A la inversa, al volver a mencionar el mismo cartel más adelante, algunos estudiantes utilizaron nuevamente el artículo indefinido “un”. Esto evidencia que los estudiantes no son suficientemente sensibles a la distinción discursiva entre información

conocida y nueva, y aún no han interiorizado la función pragmática de los artículos del español.

Otro tipo de selección errónea se produjo en contextos genéricos. En el ejercicio de huecos, en la frase “interés enorme por ____ cultura española”, ante “cultura” correspondía usar el artículo definido “la” para denotar la categoría en general; algunos estudiantes escribieron erróneamente el artículo indefinido “una”, particularizando una categoría abstracta y provocando una desviación semántica.

Estos casos de selección errónea demuestran que los estudiantes no logran elegir el artículo apropiado según el principio discursivo de primera/mención subsiguiente ni según la distinción semántica genérico/específico. La raíz de esta dificultad reside en la ausencia en chino de una marcación gramaticalizada equivalente, lo que causa problemas de transferencia semántico-pragmática.

d) Error de concordancia de género

El error de concordancia de género se produce cuando el género gramatical del artículo no coincide con el del nombre al que determina. Este error tuvo manifestaciones típicas en las tres tareas: huecos, traducción y corrección.

En el ejercicio de huecos, en la

frase “una ____ estudiante de intercambio”, “estudiante” es un nombre común en cuanto al género, pero dado que anteriormente se mencionaba a una “amiga extranjera”, el contexto sugería el femenino, por lo que la respuesta correcta era “una”. Sin embargo, algunos estudiantes no lograron seleccionar el género adecuado según el contexto. En otro ejemplo, en “hay ____ biblioteca grande”, “biblioteca” es un nombre femenino, pero unos pocos estudiantes escribieron “un”, cometiendo un error de concordancia de género al confundir la regla de que los nombres terminados en “-a” suelen ser femeninos con sus excepciones.

En la tarea de traducción, los estudiantes confundían con frecuencia el género de nombres inanimados. Por ejemplo, al traducir “Pásame esa taza, por favor”, “taza” es femenino y varios estudiantes utilizaron erróneamente el artículo masculino. Es significativo que un mismo estudiante pudiera usar géneros diferentes para el mismo nombre en distintas partes del cuestionario — escribiendo tanto “el taza” como “la taza” —, lo que demuestra que la memoria del género nominal es inestable y aún no se ha establecido una conexión morfosemántica sólida.

e) Error de concordancia de número

El error de concordancia de número consiste en la falta de correspondencia entre la forma singular o plural del artículo y el número del nombre. Aunque la proporción de este tipo es relativamente baja, se observaron patrones de error estables.

En la tarea de traducción, ante la frase “Nuestra escuela tiene una biblioteca muy grande y dos piscinas”, algunos estudiantes tradujeron “dos piscinas” como “dos piscina”, o bien utilizaron un artículo plural con un nombre singular: “las piscina”. Otros, al traducir, emplearon incorrectamente el artículo en plural con nombre en singular: “hay unas piscina”. Estos errores revelan que los estudiantes no dominan con seguridad la regla de concordancia entre la morfología de plural del nombre y la forma plural del artículo.

3.3. Mecanismos de transferencia

En esta sección se analizan las causas de los errores en el uso del artículo español por parte de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desde tres dimensiones: transferencia estructural, transferencia semántico-pragmática y transferencia en la adquisición de la concordancia. Dichas dimensiones se derivan del marco teórico de la transferencia lingüística y permiten explicar la naturaleza multifactorial de los errores

observados.

La transferencia estructural se refiere a los errores del aprendiente ocasionados por las diferencias en la estructura sintáctica entre la lengua de origen y la lengua meta. El chino y el español presentan una diferencia estructural fundamental en el sistema de artículos: el chino carece por completo de la categoría gramatical del artículo, mientras que en español el artículo es un componente obligatorio del sintagma nominal. En chino, el nombre puede funcionar de manera independiente como sujeto, complemento directo o atributo sin necesidad de ningún determinante. Esta laguna estructural provoca que, al producir en español, los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no posean la representación sintáctica de que “debe haber un determinante delante del nombre”, lo que tiende a desencadenar la omisión del artículo. Las manifestaciones típicas son la ausencia del artículo ante nombres contables en singular y la omisión del artículo definido en contextos genéricos.

La sobregeneralización en el plano estructural se manifiesta en la aplicación mecánica de la regla de “debe aparecer el artículo”, extendiendo el artículo a estructuras que originalmente no lo requieren, como en frases hechas

—“a casa” → “a la casa”— o ante nombres abstractos —“Tener paciencia” → “Tener una paciencia”—, lo que resulta en una adición redundante del artículo.

La transferencia semántico-pragmática se refiere a los errores que los aprendientes cometen en relación con el significado referencial y las condiciones contextuales de uso de los artículos. El chino transmite la información referencial a través del orden de palabras, los clasificadores y el contexto, sin disponer de medios gramaticales específicos para marcar la oposición definido/indefinido. Por ejemplo, “一本书” puede referirse a cualquier libro de manera indefinida o, tras haber sido mencionado previamente, convertirse en definido, pero el chino no utiliza cambios morfológicos en el artículo para distinguirlo. El español, en cambio, sí establece una oposición obligatoria entre el artículo definido y el indefinido. Esta carencia de la categoría semántico-pragmática provoca que los estudiantes, cuando necesitan tomar la decisión entre definitud e indefinitud, cometan con frecuencia una selección errónea, o que sigan usando el artículo indefinido al volver a mencionar información ya conocida.

En la expresión de la genericidad,

el chino emplea estructuras de nombre escueto como “猫是独立的动物”, sin ningún artículo. El español, en cambio, requiere el artículo. Los estudiantes, influidos por la genericidad de nombre escueto del chino, tienden, por un lado, a omitir el artículo y, por otro, cuando deben usarlo, a no saber qué forma elegir, incurriendo en una selección errónea. Además, en chino los nombres abstractos como “耐心” o “希望” no llevan ningún determinante, mientras que en español los nombres abstractos en posición de sujeto o en ciertas estructuras necesitan el artículo definido, como en “La paciencia es importante”, mientras que en posición de complemento verbal a veces pueden omitirlo, como en “Tener paciencia”. A los estudiantes les resulta difícil captar estas complejas condiciones contextuales, por lo que pueden tanto omitir el artículo definido como añadir erróneamente el artículo indefinido.

La transferencia en la adquisición de la concordancia se refiere a los errores que los aprendientes cometen en la correspondencia de género y número entre el artículo y el nombre. El chino es una lengua típicamente aislante, que carece por completo de género gramatical y de relaciones de concordancia entre artículo y nombre. En español, cada

nombre posee un género gramatical inherente, y el artículo debe concordar con él en género y número. Esta característica supone una carga cognitiva completamente nueva para los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En el presente estudio, los errores de concordancia de género fueron muy superiores a los de número, lo que indica que la adquisición de la categoría de género es más desafiante que la de número. La razón estriba en que, aunque el chino no tiene marcas morfológicas de plural, puede expresar el concepto de pluralidad mediante numerales, clasificadores, el contexto o la reduplicación, por lo que los estudiantes poseen una base cognitiva innata para la distinción semántica entre “uno” y “varios”. En cambio, el género gramatical no existe en absoluto en chino; los estudiantes no pueden recibir ninguna transferencia positiva de su lengua materna y deben memorizar el género de cada nombre de forma individual. Además, el género de muchos nombres no es completamente transparente (p. ej., “el problema”, terminado en “-a” pero masculino, o “la mano”, terminado en “-o” pero femenino), lo que incrementa aún más la dificultad de memorización.

La sobregeneralización en la

adquisición de la concordancia se manifiesta cuando los estudiantes infieren erróneamente el género de un nombre a partir de reglas limitadas. Por ejemplo, una vez que aprenden que los nombres terminados en “-a” suelen ser femeninos, sobregeneralizan esta regla a excepciones como “el problema” o “el día”, provocando errores de concordancia de género; o habiendo aprendido que los nombres terminados en “-o” suelen ser masculinos, consideran erróneamente “la mano” como masculino. Asimismo, algunos estudiantes, al no estar seguros del género de un nombre, adoptan la estrategia del “masculino por defecto”, usando sistemáticamente “el” o “un”, lo que también constituye una estrategia de transferencia de concordancia de simplificación.

3.4. Discusión de resultado

Antes de la recopilación del corpus y el análisis de errores, esta investigación formuló, a partir del marco del análisis contrastivo chino-español, cuatro predicciones teóricas sobre los posibles errores de los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en el aprendizaje del artículo español. Mediante el análisis sistemático de los 274 errores contenidos en los 50 cuestionarios válidos, dichas predicciones se han visto verificadas y matizadas en diferente grado.

En primer lugar, se predijo que la omisión del artículo sería el tipo de error más frecuente, debido a la ausencia de esta categoría gramatical en chino. Los datos lo confirman plenamente: la omisión representa el 41,97 % de los errores totales, y se manifiesta de manera sistemática en todos los tipos de tarea.

En segundo lugar, se anticipó una dificultad significativa en la oposición definido/indefinido, derivada de los diferentes mecanismos de expresión de la definitud en chino. Los resultados avalan esta predicción: la selección errónea (23,0 %) y la adición redundante (18,6 %) reflejan la inestabilidad en el dominio de esta oposición semántico-pragmática.

En tercer lugar, respecto a los errores de concordancia, el análisis contrastivo predijo que no serían los más numerosos, dada la alta regularidad y redundancia del input en español. Ello se confirma (género: 10,9 %; número: 5,5 %). No obstante, los datos matizan la predicción: los errores de género no se limitan a nombres de género opaco (p. ej., el problema, la mano), sino que también aparecen con frecuencia en nombres regulares, lo que indica una debilidad general en la memorización del género nominal, más allá de las excepciones.

En cuarto lugar, la predicción sobre la transferencia de los mecanismos de expresión de la definitud del chino. Se predijo que los aprendientes transferirían las estrategias de expresión de la definitud propias de su lengua materna al procesar los artículos del español. Los resultados empíricos confirman parcialmente esta predicción: en el corpus se observó, efectivamente, una ligera tendencia a utilizar demostrativos en lugar del artículo definido, así como ciertas estrategias de variación del orden sintáctico para simular la definitud; sin embargo, tales fenómenos presentaron una frecuencia baja, representando aproximadamente el 5% del total de errores. Esto indica que la transferencia de los mecanismos de expresión de la definitud del chino se manifiesta más como una estrategia de procesamiento conceptual implícita que como un error gramatical explícito, y su impacto general es inferior al de los dos primeros tipos de error.

Estos resultados comparativos revelan con mayor precisión la jerarquía real de dificultades en la adquisición del artículo español por parte de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la obligatoriedad estructural del artículo y la distinción semántico-pragmática definido/indefinido constituyen los

obstáculos centrales, mientras que las dificultades en el plano de la concordancia morfológica son relativamente secundarias, aunque requieren un tratamiento específico.

4. Implicaciones didácticas y estrategias

A partir del análisis de los tipos de errores y de la discusión de los mecanismos de transferencia en la adquisición del artículo español por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presentados en el capítulo anterior, este capítulo sintetiza los principios fundamentales orientados a la práctica docente.

Los resultados del análisis de errores indican que los errores en el uso del artículo por parte de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son sistemáticos y tienen su origen principalmente en la transferencia negativa de la lengua materna y en la sobregeneralización de las reglas de la lengua meta. Los distintos tipos de error reflejan diferentes niveles de dificultad en el aprendizaje. A partir de ello, pueden formularse los siguientes cinco principios didácticos interrelacionados:

a) Comenzar por el desarrollo de la conciencia sobre la categoría del determinante. El chino carece por completo de la categoría gramatical del artículo y los nombres chinos pueden funcionar libremente como constituyentes oracionales

en forma escueta. Por consiguiente, la tarea prioritaria de la enseñanza es ayudar a los estudiantes a construir, en el plano metalingüístico, la conciencia nuclear de que “el determinante es obligatorio en el sintagma nominal del español”. Esta conciencia debe fomentarse desde las etapas iniciales del aprendizaje y, mediante la explicación explícita y la contrastividad reiterada, hacer comprender al estudiante que un nombre contable en singular no puede aparecer como nombre escueto. Solo consolidando firmemente esta conciencia de la categoría puede evitarse la fosilización temprana de los errores de omisión del artículo.

b) Abordar sistemáticamente el problema de la transferencia de la lengua materna. La transferencia negativa de la lengua materna no constituye un error casual ni aislado, sino un fenómeno lingüístico sistemático y predecible. La enseñanza debe incorporar como contenido explícito las diferencias en la expresión de la definitud entre el chino y el español, en lugar de tratar los errores como problemas puntuales. En concreto, el profesor debe mostrar al estudiante de forma sistemática cómo el chino expresa la referencialidad a través del orden de palabras, los demostrativos y la inferencia contextual,

contrastándolo claramente con la oposición obligatoria entre artículo definido e indefinido del español. Mediante un análisis contrastivo sistemático, los aprendientes pueden tomar mayor conciencia de las estrategias implícitas de su lengua materna y ajustarlas de forma deliberada.

c) Diferenciar los distintos tipos de contenidos de aprendizaje. Los resultados de la investigación muestran que los diferentes tipos de conocimiento sobre el artículo implican dificultades de distinta naturaleza: la omisión del artículo refleja fundamentalmente problemas en el plano estructural; la selección errónea involucra conocimientos semántico-pragmáticos; y los errores de concordancia de género y número requieren un aprendizaje implícito orientado a la automatización morfológica. Dado que las causas y el grado de dificultad de estos tres tipos de error son diferentes, las estrategias didácticas también deben diferenciarse. Los problemas estructurales requieren ejercicios que enfatizan la obligatoriedad de la aparición del artículo; las cuestiones semánticopragmáticas se prestan mejor al desarrollo de la sensibilidad mediante el juicio contextual en entornos discursivos auténticos; y los problemas de concordancia necesitan una práctica altamente repetitiva y un refuerzo

fonético para automatizar las marcas de género y número.

d) Integrar la enseñanza de la forma y la enseñanza del significado. El artículo no puede enseñarse únicamente como una forma gramatical aislada. Dado que la oposición entre el artículo definido y el indefinido codifica, en esencia, distinciones pragmáticas como la información conocida versus nueva en el discurso, lo específico versus lo general, y lo genérico versus lo individual, la mera práctica mecánica de huecos o ejercicios formales no permite a los estudiantes interiorizar realmente su uso. La enseñanza debe combinar la atención a la forma con actividades contextualizadas, impulsando a los estudiantes a elegir el artículo en función de la intención comunicativa y del conocimiento compartido. En otras palabras, la didáctica del artículo no solo debe responder a “qué forma usar”, sino también a “por qué usar esta forma en este contexto”.

e) Respetar la ley del desarrollo progresivo desde la conciencia hasta la automatización. A partir de la tendencia evolutiva de los errores observada en este estudio, los aprendientes primero establecen la conciencia de que “se necesita un artículo delante del nombre”, y solo después logran dominar paulatinamente la compleja distribución

en diferentes contextos. Los aprendientes de nivel inicial muestran principalmente errores de omisión del artículo, mientras que los de nivel avanzado se enfrentan en mayor medida al problema de la elección precisa entre el artículo definido y el indefinido. Por lo tanto, la enseñanza no debe precipitarse. En la etapa inicial conviene concentrar los esfuerzos en consolidar la obligatoriedad del artículo; una vez que los estudiantes hayan formado un hábito estable de producción, se introducirán gradualmente la oposición pragmática definido/indefinido, los nombres abstractos y las excepciones en frases hechas. Una enseñanza progresiva ayuda a evitar la sobrecarga cognitiva y, al mismo tiempo, puede prevenir los errores de adición redundante del artículo por sobregeneralización que surgen al exponer prematuramente al estudiante a reglas complejas.

Los cinco principios anteriores se apoyan mutuamente y conforman en conjunto un marco teórico orientativo para la enseñanza del artículo español a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En la práctica docente real, los profesores pueden ajustar con flexibilidad el énfasis y el ritmo de aplicación de cada principio en función del nivel concreto de los aprendientes y de los tipos de error que presenten.

5. Conclusiones

A partir del análisis de los errores y de los mecanismos de transferencia observados en la adquisición de los artículos del español por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es posible extraer varias conclusiones relevantes.

En primer lugar, la distribución de frecuencias de los tipos de error revela una clara jerarquía de dificultad. La omisión del artículo es el tipo de error predominante; la selección errónea ocupa el segundo lugar; la adición redundante del artículo, el tercero; y los errores de concordancia de género y número suman aproximadamente el 16% del total. Esta distribución pone de manifiesto la estructura de dificultades en la adquisición del artículo español por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la falta de conciencia de la obligatoriedad estructural del artículo constituye el obstáculo principal; la oposición semántico-pragmática definido/indefinido se sitúa en segundo lugar; y la concordancia morfológica de género y número resulta relativamente más asequible. Cabe destacar que los errores de concordancia de género casi duplican a los de número, lo que indica que la adquisición del género gramatical es más desafiante que la de la marcación de número.

Asimismo, los distintos tipos de tarea empleados en el estudio (huecos,

traducción y corrección) ejercen un efecto modulador sobre la manifestación de los errores, lo que evidencia que el análisis de errores debe basarse en una triangulación de instrumentos para reflejar de manera integral la competencia del aprendiente. Los patrones cualitativos de error presentan un carácter sistemático: la omisión se concentra en nombres contables en singular y en contextos genéricos; la selección errónea afecta especialmente a la distinción entre primera mención e información ya conocida; la adición redundante se vincula con el uso del artículo indefinido ante nombres abstractos y con frases hechas; y los errores de concordancia, tanto en género como en número, revelan una debilidad general en la memorización de las propiedades morfológicas de los nombres, más allá de los casos irregulares. En cuanto a los mecanismos de transferencia, se confirma su origen múltiple: la transferencia negativa de la lengua materna es el factor fundamental, especialmente en la omisión del artículo, la selección errónea y los errores de concordancia de género, mientras que la sobregeneralización de las reglas de la lengua meta explica buena parte de las adiciones redundantes y de ciertas selecciones erróneas. Ambas fuerzas interactúan y configuran el sistema de artículos de la

interlengua.

Al contrastar estos resultados con las predicciones derivadas del análisis contrastivo inicial, se verifica plenamente que la omisión del artículo es el error más frecuente y que la oposición definido/indefinido constituye un núcleo de dificultad; sin embargo, se matiza la predicción sobre los errores de concordancia, pues estos no se limitan a nombres de género opaco, sino que también aparecen abundantemente en nombres regulares, lo que apunta a una debilidad general en la memoria del género nominal. Por otra parte, la transferencia de los mecanismos chinos de expresar la definitud (como el uso de demostrativos o el orden de palabras) tuvo un impacto menor de lo esperado, lo que precisa la jerarquía real de las dificultades.

No obstante, el presente estudio presenta limitaciones que deben tenerse en cuenta. La muestra es reducida y procede mayoritariamente de una misma universidad, lo que limita la generalización de los hallazgos. El corpus se circunscribe a tareas escritas, por lo que no refleja las particularidades del uso oral del artículo, donde la presión temporal y los fenómenos fonéticos podrían generar otros patrones de error. El diseño transversal impide observar la trayectoria evolutiva individual de los

aprendientes, y la exclusión del artículo neutro “lo” deja incompleta la cobertura del sistema de artículos. Asimismo, no se controlaron sistemáticamente todas las variables de los antecedentes de los participantes, lo que podría afectar la atribución causal de los errores.

A pesar de estas limitaciones, la investigación supone una contribución empírica relevante para la comprensión de la adquisición de los artículos del español por parte de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Este proceso dista de ser una mera interferencia formal: implica una reestructuración profunda de la gramática mental en los planos estructural, semántico pragmático y morfológico. Los resultados obtenidos no solo profundizan en la jerarquía de dificultades propia de esta combinación lingüística tipológicamente distante, sino que ofrecen una base empírica para el diseño de estrategias didácticas diferenciadas. Se espera que este trabajo estimule futuras investigaciones con muestras más amplias, diseños longitudinales y una mayor atención a la modalidad oral y al artículo neutro, contribuyendo así al avance tanto de la teoría de la transferencia como de la enseñanza del español como lengua extranjera a sinohablantes.

Bibliografía

- [1] Selinker, L. Interlanguage[J]. *IRAL: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1972, 10: 209-231.
- [2] Lado, Robert.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teacher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 50-67.
- [3] Corder, S. P. 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1967, 5, 161-170.
- [4] Li, C. N., Thompson, S. A.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M]. Oakland: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481-487.
- [5] Abney, S. P. *The English noun phrase in its sentential aspect*[D]. Cambridge, Ma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87: 54-81.
- [6] Leonetti, M. *El artículo*[C]//Gramática descriptiva de la lengua española. Espasa Calpe España, 1999, 1: 787-890.
- [7] Odlin, T. *Language Transfer: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5-68.
- [8] Ionin, T., Ko, H., Wexler, K. Article semantics in L2 acquisition: The role of specificity[J].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4, 12(1): 3-69.
- [9] Ellis, Rod.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89-102.